

# 炎黄春秋

第 **3** 期  
2006年

**建国初对《武训传》的批判**

一代学人傅斯年

**我了解的杜润生**

周佛海死刑改无期内幕

不只是“落后就要挨打”



## 目 录

<b>亲历记</b>	
1 《武训传》讨论——建国后第一场大批判	袁 鹰
6 我了解的杜润生	张根生
11 我与李雪峰的交往	吴 象
18 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委、人委、政协	梁志远
<b>春秋笔</b>	
22 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李维民
<b>人物志</b>	
27 一代学人傅斯年	纪秩尚
<b>往事录</b>	
31 任白戈文革蒙难记	何 蜀
37 进步青年在国统区的组织形式	穆广仁
43 文革初期的空军 ——访空军原副司令员何廷一将军	钟兆云
<b>一家言</b>	
51 走改良之路	高伟梧
<b>怀人篇</b>	
53 欧远方之死	邹人煜
56 怀念千峰	安子贞
<b>品书斋</b>	
59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序	金冲及
61 读资中筠《斗室中的天下》	朱尚同
<b>轶闻录</b>	
66 周佛海死刑改无期内幕	王贤才
<b>古今谈</b>	
69 郡县制与美国政体	尹振环
73 不只是“落后就要挨打”	官伟勋
<b>文荟苑</b>	
76 清朝四部尚书戴联奎的绝世藏品	鞠九江 周晓燕
<b>编读窗</b>	
80 也谈山西新军领导权	杨剑龙

本期执行主编 李 晨

###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李耀文

###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庄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袁 鹰 凌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5.80元



# 《武训传》讨论

## ——建国后第一场大批判

袁 鹰

五十五年前的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室上夜班，编第一版要闻。那天是星期日，没有什么要事，也不开每天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我就处理新华社白天发来的电讯稿，挑选晚上要发的新闻稿。忽然从一堆稿件中发现一份用电讯发来的当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应当重视电影 武训传 的讨论》，厚厚一叠，字数很多。

我编一版要闻一年多以来，常收到新华社播发有关国内国际大事的《人民日报》社论，地方报纸必须转载，但是《人民日报》为一部电影发社论却是破天荒头一回，不禁有点惊讶，赶紧细读社论全文：

在发表扬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一文时，我们说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的讨论。为什么应当重视这个讨论呢？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

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试看下面自从电影《武训传》放映以来，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中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录：

（以下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列有四十三篇文章、四十七位作者、发表报刊和日期，另有三本已出版的关于武训的书，此处从略。）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

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我连读了两遍,一面读,一面止不住心惊肉跳:这篇社论同以前在《人民日报》上读到或者新华社作为电讯稿发出来的社论完全不同。那些关于抗美援朝、国际形势的社论,可以使你情绪激昂,充满自豪感;那些关于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法治安方面的社论,政策性指导性很强。但是这一篇社论,说的是一部电影,却提得那么高,那么严厉,“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些非常严峻的责问,哪里是社论的口气?点了那么多作者的名字,那么多文章的题目,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是不是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就可以用这样的口气写社论?我越读越糊涂,也越读越紧张,不管懂不懂,理解不理解,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论,也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

社论一开始提到的扬耳文章,使我忽然想起前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当时只看题目,未看正文,就从报架上取下来看了一遍,这篇文章是转载《文艺报》的,“编者按”明确而严厉地指出:“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们写的评论)全都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

这个“编者按”措词很厉害,上海话就是“很结棍”。但是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前两天读了都还没有引起重视,认为大概要批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了,没有想到其他。不料才过几天,社论就出来了,而且更加严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正想着,管夜班的副总编辑魏克明同志来上班了。没等他坐下,我就告诉他新华社发来一篇《人民日报》重

要社论,说着,赶紧将那一叠电讯稿送到他桌上,他坐下来,茶也来不及喝,烟也来不及抽,先仔细地读了一遍。看完,对我微笑一下说:“这篇社论非同小可。我估计有几段很可能是毛主席写的。”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毛主席修改过《人民日报》社论,在战争时候用新华社名义写过评论和通讯,但是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电影的社论,却是从未想到的。听老魏的口气,似乎很肯定。果然,他的估计很准确,不久,就听说是毛主席亲自写了社论中除了一大批名单以外的段落。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种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都有这篇社论,1977年4月,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就收入此文,注为“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节录”。

问题提得如此严重,如此尖锐:“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同一天《人民日报》第三版“党的生活”专栏还发表了一篇专文,号召“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已将“讨论”改为“批判”了),口气同样很严厉。报社编前会上,有人问报纸应该怎么办,要不要组织稿件,魏克明同志很沉着,说《人民日报》怎么宣传我们就跟着办,《武训传》是上海拍的电影,更要看市委的态度,不必忙。现在上海正忙着“三反”、“五反”运动,增产节约运动,捐献抗美援朝的飞机大炮,要宣传报道的东西很多,不要又开辟一个宣传战场。然而《武训传》这部电影毕竟出在上海,上海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立刻受到重大的冲击,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文化局长夏衍,正参加一个由林伯渠、沈钧儒率领的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民主德国,远在欧洲。上海文艺界的事主要由文化局副局长于伶负责,他又兼电影厂厂长,自然首当其冲。5月21日上海各报一律转载社论,当天晚上,组织了二百多位文化教育界人士开会,重新放映《武训传》。放映之前,有关负责人黄源(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于伶(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和戴伯韞(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三人先后发言,检讨自己过去对这部影片的错误态度。据于伶同志四十年后对我追叙,那一天他从早到晚处于紧张状态中,连饭都顾不上吃,准备组织大家看电影,作检讨性发言,市委更决定要他以上海电影厂厂长身份写一篇文章,第二天同《武训传》讨论会

消息同时见报。一天之内赶一篇文章怎么来得及？但又非写不可。于是，那天晚上，就在他同文化教育界人士在文化局电影处放映室看电影并且作自我批评的同时，在放映室楼上一间办公室里，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冯定和原《解放日报》总编辑恽逸群两位大手笔正伏案挥毫，赶写一篇《展开对武训传的批评和讨论》文章，署名于伶，当晚送到《解放日报》，同新闻一起在第二天见报，算是上海市文化界领导机关向中央表一个态。

作为华东和上海文艺方面的主要领导人的夏衍，到6月下旬才从东欧访问结束回国，自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卷进狂飚的中心。据他四十年后所作《武训传事件始末》一文（见《夏衍全集》第十五卷《懒寻旧梦录》附录二）回忆：一回到北京，他的老战友，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就要他立刻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夏衍不满地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一、昆仑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对孙瑜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剧本是后来中宣部通过的；二、对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没有资助，贷款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的，因此，不必由我来作检讨。周扬却提醒他：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章是他写的，为此我作了检讨。周总理也因为事先没有考虑到这部片子的反动性而一再表示过他有责任。加上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你再想想除了《武训传》外，也还有一些问题，中央领导是有意见的，这样一说，问题就清楚了，检讨文章是非写不可的。

夏衍还说到他回上海前向周恩来总理辞行，周总理在电话中就《武训传》的问题作了指示：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

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要对事不对人，孙瑜、赵丹能作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最后还说你方便时可以把他的意见告诉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宣传部长舒同。回上海后，夏衍先在上海文化局召开的约一百多人的文化界集会上对《武训传》问题作了检讨，又把这次发言整理成文，寄给周扬，这就是《人民日报》1951年8月26日发表的《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发表前夕，周扬打来电话，说这篇文章送请毛主席看了，毛还亲笔修改，有一段就是毛写的。并说毛主席看了之后对他（周扬）说“检讨了就好”，要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不久以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从南京回到上海，他向夏衍、戴

伯韬等文化教育界负责人明确表示：“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你们不要紧张。本来有不同意见各自写文章商讨就可以了。现在《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文化部发了通知，这对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种压力，特别是对留用人员，所以你们要掌握分寸，开一些小型座谈会，不要开大会，更不要搞群众运动。”他甚至强调：“你们可以公开说，这是陈毅的意见，也就是市委的意见。”他的表态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是一致的，是正确的态度，夏衍等同志根据他们的指示行动，就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上海只开了两次一百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随后全国有组织地开展了对《武训传》的批判



人左右的会，没有搞什么“运动”，《武训传》电影主要摄制人员孙瑜、赵丹等，只在会上作了些自我批评，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

1951年上半年，全国上下正处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各项政治运动的高潮中，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热火朝天。这场突然从天而降的狂飚，虽然没有搅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但是规模还是不小，《人民日报》从5月20日至7月下旬的七十天里，就连续发表批判文章、有关人士检讨、集会消息和读者来信一百二十余篇，声势宏大，炮火猛烈，版面集中，显得非常突出，也树立了一个模式，



电影《武训传》剧照

以后一二十年中历次政治运动，报纸如何贯彻和宣传，大抵都照章行事，如法炮制。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不说别的，只以上海的电影为例，1950年到1951年生产故事片二十五部，1952年骤减为两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开拍，文化界形成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这还只是电影生产这一个方面，在文化和教育方面影响要大得多。

批判《武训传》开始两个月以后，《人民日报》从7月23日起连续六天每天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全文四万五千多字的调查，兴师动众，访问了武训家乡一带三个县许多人，搜集了许多县志、账册等文字资料，但是实际上是先有结论再找材料，目的是证明《人民日报》社论完全正确，被调查的人只能顺着调查者的话说，要什么就说什么的主观主义的调查。毛泽东亲笔作了多处修改才定稿见报。《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袁晞著有《武训传批判纪事》一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揭露，叙述了事实真相，此处不赘。调查记表明，调查组主要成员和执笔者为人民日报社袁水拍、中宣部钟惦棐、文化部李进等三人。那第三位“文化部李进”最容易为读者忽略，其实却是最重

要的人物江青的化名。江青当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不知何故要冒称文化部的人。中宣部那时在文艺处之外，有一个电影处（并无戏剧处、音乐处、文学处……），不久以后江青不当电影处长了，这个处也就撤销。就如夏衍在文章中所说：“《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30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个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

这一次事件孙瑜、赵丹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是不会甘心的。”这是江青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尽管“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此后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问题就立即严重而且变质。她苦心经营十多年后，羽毛渐丰，野心渐露，有恃无恐，取得最高领导人的绝对信任，居然攫得操纵文化大革命的大权，于是兴风作浪，舞剑挥刀，排演出长达十年之久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旷世大悲剧。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当时已有九十高龄的夏衍老人，针对《武训传》问题对此后中国文化教育界以至整个知识分子界产生深远的负面作用，发了长长的、深深的感慨：

“从上海解放到1955年7月我调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在华东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传、文教。所以我接触最多的是知识分子，最使我感动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我被攻击得最厉害的也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我青年时代到过日本，解放后访问过印度、缅甸、东南亚、东欧各国和古巴，就我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还以为世界上最爱国、最拥护共产党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这在全

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这就很不寻常了。十月革命之后，大批俄罗斯作家、艺术家跑到欧洲和美国。我记得很清楚，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所以许多作家、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他们的祖国。我五十年代两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况大概和德国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会或单独会见的时候，很少谈到政治，几乎没有人敢谈到当时的执政党。在东欧，各国都有党领导的文化部门，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关心政治。在罗马尼亚，有一位曾在中国读过大学的文艺评论家公开对我说，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不写作而去当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这一切都和中国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还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么？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钟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他在文章结束处说：“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的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这场民族悲剧从50年代初一直追续二三十年！那句“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的结论性语句，从此几乎成为某些领导人的基本思想定式，也成为文化界人士头上的紧箍咒，时时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谁也不敢预测什么时

候又会突然来一场风暴。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一条消息，标题是《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全文如下：

本报讯 记者毕全忠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9月5日在谈到武训这个有争议历史人物时说，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要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胡乔木是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谈这个问题的。

胡乔木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同一天，新华社以同样内容向全国发了通稿。电影《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话虽然说得平和委婉，字斟句酌，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搞错了，是一场大冤案！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凡是歪曲事实、不得人心的任何批判、任何决定，迟早总是要平反昭雪、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鲁迅早就说过：“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延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自《武训传》批判起，从九天落下的狂飚，从此在中国知识界、文化人头上，时松时紧，时高时低，时密时疏，连绵不断，落了多少年，伤了多少人，谁能忘记？谁又能知道？

走笔至此，我不禁又一次想起198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作长篇讲话的最后场面，他又一次强调要爱护文艺队伍，忽然激动地站起来，举起攥紧的拳头，高声说：“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艺术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会场上顿时响起长时间的春雷，人们忘情地不停鼓掌，一任从内心涌出来的热泪淌满双颊。二十多年过去，斯人斯语，此景此情，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怆然于怀。

2006年新春雪夜

（责任编辑 李 晨）

# 我了解的杜润生

张根生

我与杜润生同志从南下时相识、相知到结成友谊，已有 50 多年的时间了。他一生从事我国的农村工作，为我国的农村体制改革、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体系和发展农村城镇化做出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2005 年 8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杜润生的一部重要著作《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出版社推介说：“杜老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是公认并具有深刻影响的 80 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杜润生同志生肖属牛，他的一生恰似探索农村改革的孺子牛，一生历经坎坷，始终默默耕耘。

## 土地改革开新篇

杜润生是 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山西省积极参加反抗日寇的武装斗争，并从事地方党政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批跟随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实施战略大反攻，任中原局秘书长，以后又到皖西北地区开辟新的解放区。

我是 1949 年 4 月在河南省开封认识杜润生同志的。当时我们是中央大批抽调南下干部的最后一批，由晋中区党委为主抽调三个地委班子，察哈尔、冀中各抽调一个班子。目的地是湖南省。因为那时大军还未渡过长江，中央便将我们送到河南巩县待命。碰巧这时中原局（后改为中南局）扩充机关力量，要求从分配到各省市的南下干部队伍中各挑选一些人去机关工作。这样我便和任雷远到了中南局研究室农村组任研究员。中南局为了加强农村工作，又先后调来陈洪新、周

宇博、薛经纶、杜瑞芝、李友九、刘因等一批地专级干部。当时接见和安排我们工作的领导就是杜润生同志。那时他是中南局的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他首先安排我们参加学习，并告诉我们准备进驻武汉。

那时全党及解放区正在学习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根据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已告全胜，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我军各路大军正在作渡江准备，要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解放全中国。故此，二中全会决议提出了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以城市带动农村。从当时全国的局势来看，党中央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当时中南局所辖的六个省（两广、两湖及河南、江西）的情况来看，除河南省有一部分是老解放区外，其余都是新区。有些省虽有一批游击队武装和地下党组织，但绝大多数农村没有党组织，虽然占领和成立了县、区政权，而农村广大基层政权仍为地主恶霸所掌控。针对这种情势，首先是林彪与杜润生商谈共同认为：根据北方的经验，在刚解放的新区必须先进行土改工作，才能建设成巩固的解放区。然后正式提到中南局讨论，林彪、罗荣桓、邓子恢、李雪峰等一致同意新解放区的工作重点仍应首先放在农村的主张。杜润生起草，以中南局名义正式报告给中央，主张将工作重点首先在搞好有三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上，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农村基层政权。中央很快就批准了中南局的这一报告，并且批转到了各大区参照执行。1950 年 7 月 1 日，中南局召开纪念大会，林彪代表中南局所作的报告主要内容，也就是经党中央批准的中南局决定将工作重点首先放在农村的方针。我曾参加了这次会议，



深感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是至关重要的。

1949年11月,中央政策研究室召集华东局、中南局的同志开座谈会,研究新区土改政策问题,中南有杜润生、我和任爱生(湖北省农工部长),华东是刘瑞龙参加,少奇和朱德同志亲自到会听取意见。当时中央的意见是:重点打击地主阶级当权派,保存富农阶级,以利于缩小打击面,尽快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在开展讨论时,总的指导精神大家都是同意的。华东局刘瑞龙主张完全不动富农的土地,包括出租部分。但中南局根据本地区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由杜润生在会议上发言,他说:

“邓子恢同志主张,因为据调查南方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比率较低,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四十多,为了使贫雇下中农能多分到一点土地,所以主张征收富农出租的部分土地,分给贫雇农民,这样更有利于农业生产。”根据这两种不同的意见,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规定了原则上不动富农的土地,但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规定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分给贫雇农民。过后,从中南各省实际执行的结果来看,这样一方面使富农保存了富裕中农的土地数量,另一方面又满足了广大贫雇农的要求,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紧接着,中央又召开了有一些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研究如何加快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由于杜润生参加过1946、1947年华北老区的土改工作,南下后到阜阳任地委书记时又参加过新区当时称之为“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过左土改,有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因此,他在会议上提出新区土改应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首先重点打击地主恶霸,消灭土匪;同时减租退押,适当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经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初步



杜润生近照

组建农会或贫农小组,为下一阶段的土改打下基础。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征收富农出租土地,并建立农会和贫农团组织,发展党员,使农村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贫雇农骨干手中。后来也有的提出三阶段,把组织建设也作一阶段。当时毛泽东同志对此主张曾给予充分肯定。杜润生同志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分阶段抓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得到了与会中央领导和各新区负责同志的高度认可。中央领导曾明确指

示各新区均应按照杜润生所提意见执行。事后回想起来,杜润生同志的工作富有创造性,为新解放区胜利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 历经坎坷学新知

杜润生同志并不反对中国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在1953年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后,以邓子恢为部长,杜润生为秘书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便发动农民搞互助组并试办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初级合作社,探索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新路子。为了保证这次农村体制改革既稳步发展,又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制定了巩固合作社的标准是:使入社人员的收入逐步达到富裕中农的收入水平。但这个正确的主张却被毛泽东同志错误地批评为像“小脚女人走路”,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受到点名批判,随后免去了杜润生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和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

杜润生开始是准备下放到海南岛工作的,在1962年中央在广州召开科学会议时,我去东方宾馆看他,他曾说及本来要去海南岛了,后来毛泽东念其在土地改革工作中提出过好的意见,有



杜润生(前排中)在农村考察

才能,而且作出过贡献,才改派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组副书记和秘书长。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杜润生同志虽处逆境,仍不忘报效国家,他十分关注世界先进国家科技发展的新动向,总结他国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呕心沥血地参与规划我国科学发展的蓝图。张劲夫(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同志说:杜润生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期间,为起草和制定我国科学长期发展规划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在这一段时期,正如杜自己所说:“虽然离开了农村工作,但情不自禁,依旧关怀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参见《杜润生自述》第75页)

在杜润生一生中,这是一段重要的时期。除了对科学工作的贡献外,他读了许多书,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有了新的飞跃。知识的积累为他复出领导农村工作,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预计农民要在摆脱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共同体中各自孤立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逐步摆脱对物的依附和对人的依附,从而拥有一定个人财产权利,在此基础上进行自由交换,最后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他在思考,如果靠将农民的土地财产充公去形成“联合体”,则难以生长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难以摆脱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另一方面,被依附的队长、社长也容易变成特殊于群众利益的权力垄断者,出现像前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所发生的消极现象。因而要

另找出路。

杜润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打成叛徒、刘少奇的忠实追随者、极右倾的机会主义分子、大批解散农业合作社的罪魁祸首,开除党籍,撤销公职,而且扫地出门,被赶在一个破旧的小屋中暂住。1977年我调国家计委工作时,曾去家中看他,见他精神仍然很好,虽然又遭受到严重折磨,但是他经过的考验多了,因而他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充分的信心,决不悲观失望。

## 农村改革立新功

杜润生同志直到1978年才被落实政策、平反复出。刚开始调到国家农委任副主任,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直接协助党中央、国务院主持农村改革开放工作。在人们称之为中国农民第二次解放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当中又为国为民立了新功。

我在1977年底调到国家农林部任第一副部长,又在国家农委和杜润生领导下工作;1979年我去吉林工作,五年多主要是参加农村包产到户改革;1986年又回到国务院农研中心给杜老做助手当副主任。这几十年中我受到杜老的教益很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指引下,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一场改革开放的大潮,而农业战线的改革又走在全国的最前头。全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首先是在安徽、四川等省拉开的。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政研室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积极支持和引导这一改革向全国铺开。

杜润生由于长期从事我国的农村工作,有深厚的“三农”工作底蕴。他反复强调农研室的工作一定要代表最广大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要推动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农研室逐步形成



了“三个一”的工作方法：一是组织大批工作人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每年用半年时间下乡），了解农民在想什么，干什么，他们有些什么要求；二是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根据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提出当年的农村改革方针政策；三是每年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文件。真正做到鼓励发表不同意见，真实反映农村情况。在经过反复修改，甚至推翻重写的基础上，再报党中央、国务院，经中央批准之后作为第一号文件正式发出。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村改革向前发展，使全国农村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为全国各条战线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奠定了基础，而且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誉。当然这一殊荣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但是杜润生在农村这一改革过程当中作为党中央领导的得力助手，其功劳亦是非常突出的。现在杜润生已是全国农村干部群众有口皆碑的大改革家。

## “三农”问题创新论

杜润生同志在“三农问题”上积累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论述：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是要把农村走过了头的生产关系调整过来。

杜润生认为：我国自1953年全面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之后，就把旧社会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转变成了农民所有制，实现了几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热血青年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目标。由于广大贫雇农有了自己的土地，便有了空前高涨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大解放。1949年至1953年的4年间，人民群众的生活明显提高，社会秩序极其稳定。大家都热爱新社会、拥护共产党，形势发展非常好。但是，由于我们党当时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1957年掀起了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热潮。在农村普遍实行高级社，到了1958年全面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从而将分给农民的土地又夺了回来，实行所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违背了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规律。这种改造不仅没有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相反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这是在这之后20多年，我国国民经济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根本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的农村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纠正1957年所犯的错误的，把土地的经营权归还农民，顺应了多少年来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当时中央五个一号文件中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文件中明确说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的管理形式，从而消除了人们的思想顾虑，推动了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统计，1984年粮食生产就从1978年的6000亿斤增产到8000亿斤，基本上解决了1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二、放开农副产品市场是保障农产品供应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杜润生认为，过去我国商品物资匮乏主要是实行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后果。什么都按计划生产、凭票供应，堵塞了市场流通渠道，阻碍了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他极力主张全面放开农村市场，将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全国的市场改革首先是从放开水产品和水果市场开始的。当时我们党内有些同志顾虑重重，一怕放开后物价上涨，影响社会稳定；二怕物资紧张，商品供不应求；三怕滋生资本主义等等。但放开后的实际效果非常好，不仅水产品供需两旺，而且物价稳中有降，人民群众非常欢迎。这样就进而放开了肉禽、水果、蔬菜、粮食等农副产品市场，废除了实行30多年的统购、统销体制，为全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

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施城镇化战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杜润生认为：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小农经济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我国唯有实施城镇化战略，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才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为此，杜润生首先提出了农村城镇化这一个大的战略问题，他极力主张大办乡镇企业。中央1984年的四号文件和五个一号文件中的第3个

一号文件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自1982年起全国各地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批农村农民青年离土不离乡到乡镇企业里务工。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另一方面又为农业的规模、产业化经营创造了条件。据统计：全国最高时有1.3亿农民转移到了乡镇企业就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非常突出。

随着乡镇企业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在90年代初全国的乡镇企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造、改组。一批大型集体乡镇企业转变成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则转变为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少数企业改变成了股份合作制企业。乡镇企业的这一改造重组，给这些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工业企业的实力。近十几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转移就业，数量已在一亿至一亿一千万人左右。这些农民工为我国的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了主体部分。杜润生十分关心农民工的工作、生活问题，反复强调要给予农民工以国民待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现在已经有许多农民工在大、中、小城市里扎了根、落了户，加快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杜润生关于加快我国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思路、指导实践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发展国民经济起了卓越的作用。

四、解放思想是实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

杜润生一贯重视学习，获得新知，一贯重视解放思想。他反复强调说：只有一个一个问题分清了是非，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向前迈进。过去我们长期受到的教育是：土地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私有就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农民在家种田是搞社会主义，外出务工、经商是搞资本主义；农民种养的产品卖给国家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拿到市场上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僵化的思想教育铸就了僵化的行为方式。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改革开放的步伐是难以迈进的。杜润生认为人类社会与世间万物一样，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伴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由低级走向高级。如果我们违背其发展规律

的要求，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国在1956年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在这种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是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前20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中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一定要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推动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向前发展。我国从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一大批思想解放、勇于创新的杰出人才，这与杜润生的带动和影响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五、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才能更好地解放自己。

在杜润生九十寿辰的座谈会上，他深情地说，自己还有两个心愿：一是再转移2亿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去；一是要让农民组织起来。他说也许自己来不及看到了，有些任务要交给下一代。这是他的夙愿。

其实，关于农民组织的问题，他在1980年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农村工作时就提到了。那时邓说：“看三年，那时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办。”（参见《杜润生自述》第116页）

1986年，杜又一次向邓提出农民协会的事，邓说再看三年吧。后来发生了80年代末的风波，这件事也就一直搁置到今天，还没解决。以至外国不少农业专家都不理解，为什么拥有最大农民群体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代表农民的组织。这就使农民处于分散状态，缺乏话语权和谈判权，农民的呼声不易上达，而党和政府也就缺乏与农民对话的桥梁和纽带，从而阻滞了信息的畅通。

除了理论上的贡献以外，在杜润生同志倡导和带领下，当时“农口”有一个好的传统，有一个好的团队，有老年、青年，一大批战斗力较强的人才，大家都愿意为农民服务，做农民的代言人。

近几年来有许多青年同志已崭露头角，他们在不同岗位上出色地工作，这与“农口”那一段熏陶不无联系，或者说是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综上所述，杜老是我国乃至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对国家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经济理论家。他的杰出贡献，党和国家特别是广大农民永远不会忘记。

（吴镛整理）

（责任编辑 吴思）



# 我与李雪峰的交往

吴 象

2003年3月15日，李雪峰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堪称世纪老人。

我是晚辈，比雪峰同志小整整16岁，对这位革命前辈十分敬仰，知之甚少，只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深深留在我的心中，不时引起我的怀念与沉思。

## 随雪峰同志视察山西农村

李雪峰的大名，抗战初期我在太行山抗大一分校学习时就听说了。当时雪峰同志任晋冀豫边区党委书记，配合八路军一二九师创建根据地，是太行山妇孺皆知的领导人之一，但因种种原因，我一直无缘面识。

第一次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领导人，已是新中国成立14年之后的1963年了。

建国后，李雪峰任中南局副书记，1954年调回党中央，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60年9月，中央决定重新在各大区建立中央局，李雪峰出任华北局第一书记。

1963年秋，他到山西视察农村工作，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笱全程陪同。当时我任《山西日报》总编辑。陶鲁笱让我随行，告诉我这是个学习、提高的机会，同时可留意搜集线索，组织报道。

从1963年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我们一行从晋东南专区的长治、平顺南下高平、陵川、晋城折向西经阳城、沁水到晋南专区的翼城、曲沃和汾河边的临汾，先后跑了15个县，其中只在三四个县停留了较长时间，但也没有作专题调查研究，主要是观察农村情况、议论农村形势。我们共

十多个人，三四辆车，虽说不上轻车简从，但是确实没有后来首长外出的那种阵势。华北局陪同来的主要是办公厅主任张铁夫，我和他是1947年在新华总社认识的。张铁夫曾任《长江日报》总编辑，以他为主主持过一个杂文专栏，署名“马铁丁”，笔锋犀利，颇有影响。

雪峰同志的秘书杨枫和黄道霞比我小几岁，我们几个人很快就搞熟了。当时雪峰同志年近花甲，一看就是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他身躯颀长，面容清癯，精神矍铄，动作矫健，一点没有老态。他对熟人和生人都很和蔼，并不难接近，但话也不多，无形之中使人觉得一种威严和睿智。

过去在敌后根据地，人们均以同志相称，入城后风气渐变，称官道衔的越来越多了。党的系统比政府系统好一些，《山西日报》还是老传统没变，社长、总编辑史纪言、毛联珏调回省委任职后，大家仍称呼老史、老毛。对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笱，我们也只称鲁笱同志，非特殊必要的场合不称陶书记。没有想到，这次大家对这位年长得多的高级领导也都叫雪峰同志，不称书记或首长。有时散步，雪峰、鲁笱要找地、县领导询问情况，边走边谈。铁夫、杨枫、道霞和我就随意闲聊，也是边走边谈。这种亲切融洽的气氛，使我很快便消除了最初的拘谨。

1963年是左倾错误逐步升级又不断碰壁，不得不暂时收敛的一年。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接着是连续三年困难饿死人。到底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终于讲了真话，作了检讨，并开始调整政策。李雪峰参与制订和修改的“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陆续出台，农村形势有了好转。大概这次李雪峰来是要

亲自观察、印证和判断政策调整的效果，所以选了这么条路线。他是山西永济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写的便是他的故乡。解放后似乎没有听说他回过山西。这次到了临汾，离永济不算远了。但他只到了临汾，时间更多地花在他太行10年中熟悉的老地方。

沿途所得的印象，农民的积极性正逐渐从挫折和伤害中恢复过来。深秋季节的太行山区，洋溢着丰收的欢乐，打谷场上满是忙碌的人群，田野里又紧张地展开了争取明年丰收的活动。秋耕比上一年进度快、质量高，农田基本建设的规模也大大超过上一年。这些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是比较能说明问题的。

李顺达、申纪兰、郭玉恩、武侯梨这些老劳模所在的大队，在刮浮夸风、并大社的那一阵就比较实事求是，不跟风跑，甚至有所抵制，政策调整以后更显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成为粮食亩产“过黄河”的高产红旗了。

在这些地方参观的时候，雪峰同志多次提醒，要接受片面追求粮食高产的教训，正确理解“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太行山高、土薄、石头多，应该特别重视多种经营，鼓励养蚕、养蜂、畜牧。羊井底大队1953年在老劳模武侯梨的倡议下，订了个“千亩果园、万亩林，百头牲口、千只羊”的远景规划，10年来奋斗不息，已全部实现。雪峰同志和大家一起在槐树沟、杨树沟、核桃凹、花椒凹，爬上爬下，看得非常高兴，腿脚不亚于年轻人，几次劝他休息都劝不住。长治县林移大队，40年前是个渺无人烟的荒草滩。后来从河南林县逃荒来的难民多了，成了村庄，所以叫“林移”。这里地处平川，却凭四旁绿化建成了一个林茂粮丰的新农村。15年来植树16万株，人均330株，用自己的木材变工互助盖新房，全村面目一新。村子的东、北、西三面，都是密密层层的风林。当时虽然已是秋风落叶，看不到浓绿



李雪峰

夹道的旖旎风光，但还是使人心旷神怡，留连忘返。雪峰同志东看看，西走走，太阳落山了还不愿回去。

少数先进典型不能代替整个的面，农村形势是否真正好转，关键要看落后面有什么变化。所谓落后面，当时估计约为农村核算单位的35%到20%，其实恐怕远远不止此数。“左”的错误和基层干部的不正之风相互影响，这一部分农村农民积极性没有得到恢复，可是其中也有些开始出现好的变化。雪峰同志对这种变化特别重视。他说话不多，略有口吃，一般是多听少说，甚至只听不说，只偶尔作几句不失幽默的插话；有

时有所感悟，在小纸条写几行字，便洋洋洒洒发挥一大篇，往往很精彩。我赶紧记，前前后后记得不算少，可惜文革抄家时都遗失了。有次在晋城，县委汇报时讲到一个基层干部，名叫司象林，是公社党委的组织委员。两三年来他一直蹲在最困难的后进队做工作，不搞好不离开，已经先后改造了三个后进队，又到第四个去了。他是真正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一个一个地交朋友，一户一户地作调查，摸落后的原因，找改造的办法。懒惰往往是队干部脱离群众逐步变质的开始。针对这一点，他每天天刚麻麻亮就起床，挨门挨户叫村干部下地，有的人嫌他讨厌，说怪话，耍脸色，使他碰了不少钉子。但他始终任劳任怨，照旧每天起早催人下地，硬把懒干部叫勤了。队干部作风变了，社员干劲就高了。接着，针对经营管理混乱的缺点，他又带领干部试验劳动定额，实行小段安排，组织检查验收，最后总结评比，一项一项把着手教。雪峰同志对这位埋头苦干的基层干部非常赞赏。他说，司象林同志体现了真正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作风。他强调指出，改造后进队，关键在于发现和发挥积极因素的作用。越是落后，社员出于自身的利益，更加迫切地



要求改变现状,追赶先进,这就是最大的积极因素。雪峰同志整个讲话不说辩证法而辩证法自明,大家凝神静听,无不折服。

此行所见,政策调整已经见效,农村形势开始好转,雪峰同志在视察的整个过程中都显得心情愉快、潇洒从容。他在关注农村形势的同时,似乎对古庙、历史文物也饶有兴趣。晋城有座玉皇庙,就是他主动提出要去看的。原来其中二十八宿的泥塑,是很重要的文物,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可与太原晋祠圣母殿宋代宫女塑像相媲美。参观时他不时讲解,使人茅塞顿开。他特别告诉县委同志,要十分珍惜、保护这些重要文物,要组织人整理历史资料。在襄汾时,看到了一些古字画,他兴趣盎然地发表了不少议论,还说到邓拓在这方面的鉴别能力很高,不亚于党外一些老专家。尽管邓拓当时已被斥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而贬到北京市委工作,但在他心目中,邓拓依然是邓拓。这位太行山区的老领导,十几年阔别后,重来故地,一定会引起不少回忆和感慨吧,我真想听他讲点这方面的事情,可惜没有,一点也没有。为什么呢?也许因为不愿轻易袒露内心感情,也许因为没有适当场合,也许什么也不因为,过去的早过去了,何必再多说呢?

回到太原,雪峰同志住在晋祠招待所,同省委其他同志见面,处理了些事情,接着又召集劳动模范,整整座谈了三天。我把路上见闻整理成三篇通讯,总题为《从太行山到汾河湾》,分三天在《山西日报》刊出。雪峰同志认为还不错,对我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合成一个版集中刊出,这在当时可以算是对地方报纸的很大重视了。

但是,1963年秋冬农村形势的好转只能是暂时的,不巩固的,潜藏着危机。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逐步普及,四清运动逐步展开,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又面临一场新的磨难。雪峰同志身居庙堂之高,十分清楚八大的决议对主要矛盾是怎么论断的,后来又怎么消失了,变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矛盾。这些年决策的过程及政策的调整,他更是亲身参与,内心深处到底对形势有什么更深的看法,我不敢妄加猜测。他和鲁筋同志是否个别交

换过意见,也不得而知。但他回到太原后,召集劳模座谈,方式比较特别,只选定了三个人:朱文华、陈永贵、周明山。一个一个谈,看似随便却很仔细,与其说是总结经验,无宁说更像考察干部。三个人事迹都很突出,陈永贵不必说了,朱文华是童养媳出身,不识几个字,却把一个村治理得无可挑剔。周明山高小毕业回村后任党支部书记,毛泽东思想学得好,用得活。雪峰同志这次亲自选定周明山来参加座谈。会后不久,他又让秘书黄道霞起草,请铁夫修改,他亲自定稿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让千百个周明山成长起来》,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各报都刊登了。这在当时是很鲜见的,影响相当大。看来,雪峰同志当时对形势发展持乐观态度,并积极采取措施促其进一步好转。对那一场日益逼近的“文革”灾难,似乎也没有什么警觉和忧虑。

整整近一个月,天天和雪峰同志在一起,怎么说也同他熟了。我认为这位年长的领导是值得尊敬的,他的人品和水平都令人钦佩。这种尊敬和我对毛主席更深的尊敬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他是毛主席倚重的、独当一面的大员,他对工作的指导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他不眷恋更不炫耀过去的辉煌,他认真对待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充满信心地为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在我的心目中,这些都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

## 文革中的两次接触

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这期间,我同雪峰同志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1966年夏初到秋末,一次是1970年6月下旬。

1966年5月19日,我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被借调到《北京日报》工作组、新编委工作。当时雪峰同志正担任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我多次听到他在各种小会、大会上讲话。但除了偶尔在北京市委大楼走廊里碰面打个招呼外,没有谈过一次话。

文化革命狂飙骤起,惊涛骇浪排山倒海而来。北京被认为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日报》自我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阵地”。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出任北京新市委第

一书记。他仓促上阵，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从华北各报派人接管《北京日报》。接着，他又主持召开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当时，从各省市的领导人中揪出一个又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消息不断传来，令人心惊肉跳。谁也不知道究竟谁是革命的动力，谁是革命的对象。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学生们最先起来响应“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号召，造学校党委的反，停课上街“破四旧”，“造反有理”成了狂热时代的时尚。新市委匆匆忙忙奉命向各大学派出工作组，矛盾加剧，局势复杂，造反派、保皇派、工作组，你斗我，我斗你，文革小组背后煽风点火，全国一片混乱。

7月28日，我接到市委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却不知道是什么会，有很多学生代表也来参加。帷幕拉开，李雪峰主持，主席台上有许多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我第一次听到刘少奇、邓小平自称“中央负责工作人员”。刘少奇说“要服从多数，保护少数”，邓小平检讨自己“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派工作组是犯了错误。接着，毛主席由周恩来总理陪同，从后台缓步出场，全场掌声雷动，欢呼万岁。毛主席畅游长江归来，红光满面，显得神采奕奕，非常健壮。毛主席没有说话，只是

在主席台从左边走到右边，又从右边走到左边，微笑向台下挥手，引起更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周总理走到台前中央，亲自带领并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嘹亮的歌声使热烈的气氛达到了沸点。主持会议的李雪峰宣布散会，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从此他就因执行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被停职检查。我的角色也不断变换，由工作组而报社负责人，由靠边站、受围攻而被打倒，一年后又被揪回山西，关进牛棚，接受批斗、审查。

4年之后，即1970年6月下旬，我在石家庄又一次见到雪峰同志。

山西夺权后派性闹得很凶，中央在1968年发布“7·23”布告，制止了武斗，对以刘格平为首的山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进行了改组，69军军长谢振华、政委曹中南成为山西掌权的一、二把手，全省局势渐趋稳定。当时采取了一条大措施，就是把省直机关各单位全部“一锅端”到北京办学习班。9月1日，林彪第一号令把许多老师都赶出了北京，我们也奉命转移到石家庄，住在师范学院继续办学习班，规定了“不准上街，不准会客，不准和家属通信”。到了1970年6月，我的检讨总算通过了，调到校部帮助写总结，处于一种半解放的状态。雪峰同志离开北京后调

到天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黄道霞同志仍在他身边任秘书，不知他怎么了解到我的情况，派了部车去接我来革委会见面。几年不见，恍如隔世，重逢欢聚，话几乎说不完，但有句话谁也没敢说出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成这样，治得了吗？”后来雪峰同志开会回来了，黄道霞又领我去见雪峰同志。他见到我非常高兴，亲切地询问我的情况，一种长



邓小平和李雪峰



者的关怀和爱护使我心中涌起温暖,但我们毕竟距离远,不可能像对道霞那样互相倾谈。谈后雪峰同志又留我共进晚餐,告辞时特别嘱咐我:“要经得起委屈。一定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如果说这次见到雪峰同志出乎我的意料,更出乎意料的是听到他当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出事的消息。雪峰同志在庐山会议上担任华北地区大组组长,陈伯达和汪东兴由中央安排到华北组参加讨论。陈伯达的发言主要是讲“天才论”,汪东兴主要是表明坚决拥护设立国家主席的态度。他们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他们的影响下,会上有十几个人表示支持,对他们的发言,雪峰同志感到突然,一直没有讲话。散会时,记录的同志向陈伯达要发言稿出简报,陈说待他改完后单独出他的简报。当晚12时左右,简报组仍在打电话向陈伯达要稿子,陈仍说没有改好。李雪峰、解学恭、吴德三人便在简报上签了字(华北组2号、全会6号简报)。不知道什么缘故,也不知什么人安排,压下了已编号的4号、5号不排,午夜提前印了这6号简报,并在25日一清早就发到一些人手里。毛主席为此批评李雪峰:“你这个当组长的怎么当的,怎么不把关?”其实,简报从编号、排印到分发都是中办的同志负责,李雪峰根本无权干预,也不了解内情,只能无言以对。

1970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批陈整风”的华北会议上,江青恶狠狠地对李雪峰吼叫:“那你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辩论聂元梓大字报,你不是要和我们奉陪到底吗?好了,今天我们就跟你奉陪到底!看你低头不低头!”于是李雪峰被解除职务,后被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秘密押送安徽审查达八年之久。1973年党的十大又被定为林彪集团的“大将”,受到“四人帮”的进一步迫害,永远开除出党。但此时他正远离北京,被单独隔离审查,对自己被开除出党毫不知情。不过他离家时早就嘱咐过:“我是绝对不会自杀的,如果宣布我自杀了,必是我被谋害了。”

文化大革命是空前的民族灾难,受迫害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迫害人的手段之卑劣,都远非过去历次运动可比。1970年6月我见到李雪峰时,全国各大区书记、各省省委书记,地委、县委、

公社书记,还没有被打倒的已寥寥可数。李雪峰在文革之初受命接替彭真,应当是毛主席特别倚重的。但我回忆当时的感受,他好像想紧跟而跟不上,对文革仍然“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一开始就显得心力交瘁,摇摇晃晃,既受到来自上面的沉重压力,又引起了下面各种各样的误解。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他所处的位置,常常使他措手不及,左右为难。我看到,他脸上惯常的微笑不见了,沉静、从容的风度消失了,很快就被停职检查,靠边站了。1966年秋末,毛主席同意并批发了他的检讨,才算没有倒下去。没有想到4年之后,终于还是没有逃过这一劫。挨整是痛苦的,等待挨整更痛苦,奉命被迫去整人,尤其是去整自己熟悉并明知不该整的人,则是更大的痛苦。我经历过、感受过这两种不同的痛苦。我相信雪峰同志在这两方面的经历和感受,更不知比我要深刻多少倍。

## 遭受迫害后的再次重逢

岁月易逝,又一个10年过去了。1980年夏天,我从山西转到安徽工作了一年之后,被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刚来没有宿舍,便在厂桥中直招待所(即现金台饭店)暂住,恰巧雪峰、翟英同志一家也在这里。他们已经住了一段时间,等待中央对他的问题重新审查。更使我高兴的是雪峰同志的老部下、我的老战友霍泛同志也在这里。他在广西被整得很惨,粉碎“四人帮”几年后还不许他离开南宁一步。他悄悄跑到北京,向中组部申诉。中组部见他身体垮了,送他去医院治疗,通知广西他不回去了,就在北京等待做结论,因此出院后也在这里住下了。霍泛是山西黎城人,抗战期间任黎城县委书记,喜爱读书、研究问题,同我是老相识。全国解放后,我们仍有交往。有机会和这两位老同志成为邻居,我内心十分高兴。他们俩都是瘦形的人,但当时的身体状况却大不一样。霍泛个子并不矮,他当时60多岁,腰背稍弯,比我记忆中英姿焕发的霍泛老多了,而且可以说是瘦骨羸躯,弱不禁风。雪峰同志已七十五六,依然身板硬朗,腿脚灵便,精神更不像古稀老人。霍泛同志受了太多的折磨,留下一身病,劫后余生,可谓幸存之人。雪

峰同志单独监禁，身体受过多大的伤害我没有细问，但精神上的折磨不用问也知道是严重的。相当长时间，不许他与任何人见面，不知外界任何消息，直到5年后怀疑他患了胃癌，才许家里人去探望，他才知道自己被永远地开除了党籍。对于一位毕生为革命奋斗的老人来说，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但是，他没有不明不白地死去，而是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健康，活得精神，活得充满信心。

他们两位都有起早的习惯，天刚亮就在院里打拳、做操了。雪峰同志舞太极剑，腿脚轻快，姿势优美，有时舞罢收剑，纵身一跳，竟能折下树枝高处的绿叶，使我不禁感到羡慕和惭愧。我们有时随意闲谈。霍泛讲过一些广西文革的情况，我讲得也比较多，雪峰同志也讲，但不多。他的问题没有解决，还在等待中，一定有很多郁闷，但在他的言谈神情中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的。出于尊重，我们也不问他的事。

1982年4月党中央正式发下文件，对李雪峰的问题作了审查结论：平反党的十大时期所做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但是没有像许多老同志那样补发全部工资，官复原职。据说是有人反对。1983年4月，他被选为政协六届常委会委员，1985年9月，在全国党代会期间被补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据说原拟选中顾委常委，有人反对，是什么原因呢？我没有也不便去探究。

每年我去他家里看望几次，礼节性地随意谈话，他平静地笑咪咪地听着，有时也问几句，不多。他成为政协常委后曾到外省视察过，有次我去看望他，他刚从外地回来，说了一些见闻，表情比较兴奋。他曾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祖国大地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的变化，显然使他感到新的喜悦。

他逝世后，我去参加追悼会，读到他女儿悼念父亲的文章，才对这位世纪老人内心世界有所理解。文章说，她们为父亲整理遗物时，发现了许多材料，笔迹各异，几乎全家老少每个人都有。细一看，都是父亲刚刚到北京治病之初，母亲带领她们为父亲写的申诉材料。这些都被他压在箱底了。有一次雪峰同志几位老部下曾来征求他的意见，说他们想联名为他写申诉信，他也没有同意。女儿李丹林说：“曾经一度，我与父亲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很大分歧。我总认为，真理越辩越

明，而他则坚持真理就是真理，不辩自明。他坚持认为，一个党员所做的一切，党组织最后总是会明白的。所以他从不辩解，受了多大冤枉，多大委屈，遭到多少人误会，也不辩解。”

但是他不断反思，还写过一些笔记、心得，其中一段是：“在我倒霉的日子里，自我沉思修养时，我曾反复思索毛主席的一个告诫，以求自慰，即：我作为来自群众的一个共产党员，既是党的一员，也是群众的一员，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宗就是群众，自己没有理由不相信群众。但矛盾的是，自己（群众）还不能相信自己，还必须相信自己（群众）。这两者的对立如何统一？只能服从，归于相信党，相信群众而约束相信自己。这还是毛主席讲过的道理：当迷路的时候，你和大家商量，共同决定问题，即使犯了错误，也容易纠正。这就是说，即使自己明明白白知道路错了，也要从众，跟着错，尽管自己有时感到冤枉、内疚，也要顾全大局，要经得必要的冤枉。”

对于争议颇多的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他也作过反思和剖析。那次会议于1966年5月23日至7月20日举行，传达“5·16”通知后，按地区分省（市、区）开会，在当时大环境下就都闹起来了。会议期间，华北局不断向中央汇报，中央两位主要负责同志也同一些同志谈了话，指出了“问题”，批评了“错误”。他写道：“会后，以华北局名义，由各省起草，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中对一些省市区负责同志的‘错误’，难以实事求是，对他们的批评过了头。当时，我对一些问题也看得重了一些，伤了一些同志，我深感歉意。会议后来开得有些失控。说到底，这次会议的错误是华北局领导的失误，我要负责。但说我夺了华北地区五省市区的权，没有什么道理。我作为中央任命的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央已给了我这个领导权，还夺什么？我们处在‘皇城脚下’，我也很难办。可是最后同志们都不谅解，我也只好自省、自责、深表遗憾了。而我自己呢？被整的程度在一些方面比这些同志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又能怨谁呢？”

李雪峰同志是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共产党员，从不对儿女们议论自己问题的处理，儿女们问到时他总是三缄其口，但并不是没有话要说，只是不对他们说，要对组织上说。1981年4月，



面对中纪委派来的调查人员，李雪峰申诉、批驳、反诘，一连说了八天，问了无数个为什么？为什么说我夺了华北局的权？为什么6号简报的责任要强加在我的头上？出简报是中办直接领导，具体掌握，我李雪峰有什么权利抢先发？简报上写的是小组会上大家的发言，我自始至终没有发言。为什么把我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为什么把我划进林彪反党集团？为什么开除我的党籍？为什么剥夺我工作的权利？这一个一个“为什么”，把压在心头多年的冤屈悉数倾吐，从



工作中的李雪峰

中不难体会到他内心曾经如何地翻江倒海，也不难体会到一个共产党人必要时那种破釜沉舟、决裂一切的气概。

见到李丹林的文章，我才知道1982年的平反结论，还留着一个尾巴，即“在两个反革命集团夺权中犯有严重错误”（追悼会上经中央批准的《李雪峰同志生平》未写）。我默默在想，这公平吗？他能接受吗？但他女儿在文章中说，他认为“这是组织做的结论，看到结论后，他立即又把嘴闭上了。”

1983年和1985年他被选为政协常委和补选为中顾委委员后，有些老太行为他鸣不平，劝他去找邓小平谈谈，他没有去。也没有找对他有严重误会的同志作什么交谈或解释，他一直保持沉默。后来儿女们同他谈起这一段时，他很感慨地说：“人呐，该担当时担当，该负责时负责。我已经这么大年岁了，不可能再去工作了，既然不能工作了，还找他们干什么？要房子吗？我的房子够住就行，能遮风避雨就行；为加工资吗？我的钱够用就行……”

他得不到一些人的谅解，却能理解进而谅解这种不谅解，使自己胸襟日益广阔。在他心目中，平了反，恢复了党籍，这是最主要的。有些人含冤而死，没有活着等到为自己平反的结论，那又该怎样呢？文革是历史上空前的大悲剧，党接受了教训，纠正了错误，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

这是大局。他亲历了扑朔迷离和尔虞我诈而大彻大悟，思想升华到一个革命者更高的精神境界，再回头来看那些说不清也不必要纠缠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真正可谓是视名利如敝屣、置毁誉于无物了。越是到最后的岁月，他越显得安详、自在、平静，超脱于一切之上。

我仍然每年去看望他几次。90年代中期以后，地点往往不在他家里，而在协和医院的一间病房。他患多种老年性疾病，特别是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的疾病较重，后来已不能进食，完全靠鼻饲维持生命，老伴先他而去，儿女们常来看望，但上着班，也不能常在。终日陪伴他的是值班的女护士。她曾告诉我，老人虽然生活已不能自理，但自己能完成的动作总是挣扎着要自己完成，特别头脑清晰，说话清楚，耳也不太聋，声音稍大一些，就可以同平素一样交谈。每次去看望他，他都显得很高兴，很亲切，从床上坐起来，或坐到那一单人沙发上去，问话也多了些，显然他对形势的发展很关心。但我怕影响他养病，总是半个小时左右就告辞。有几次他还挣扎着站起来，让护士扶着他，迈步要送我，我连忙阻拦。他说“正好也要在走廊里走几步”，坚持送我到电梯门口。

后来，我因事外出，有一段较长时间没能去看望他，等到再一次想去，护士在电话中说李老病已转重，不便让人去探视了。

（责任编辑 林 耀）

# “大跃进”中的亳县人 人大、人委、政协

梁志远

1958年春夏之交，安徽省亳县反右派运动进入处理和深挖阶段，党委书记一人说了算的形势已经形成。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三年困难时期到来，民主与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县人大、县人委（政府）和县政协遭到严重冲击。当时我在县人委任办公室副主任，亲身经历了这场遭遇。现在时间已过近半个世纪，为使人们知道这些快要湮没的历史，特作一简短的回顾。

## 县人大停止一切活动

根据当时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县人大没有常设机构，大会闭幕以后，由县人民委员会执行大会决议，向人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县人代会最少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1958年5月26—28日，举行了亳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这次大会上县人委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均以县委指示“大跃进”精神，对各项任务提出过高的标准，同时作出了《掀起全面工作大跃进》等决议。随着“大跃进”的发展，以后被视为不能紧跟形势的右倾会议。从此县人民代表大会停止了一切活动，一停就是三年零五个月之久。

在三年的时间里，亳县发生了一系列世人罕见的重大惨痛事件。1958年秋大刮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在农业上，亩产4万多斤水稻和数以千计的农业高产“卫星”上天。同时县党代大会作出了

“1958年实现粮食亩产千斤县，1959年实现粮食亩产万斤县”的决议，并要全县人民讨论粮食多了怎么办？在区乡体制上，由区乡制改变为政社合一体制，由270多个尚不巩固的高级社七天内撮合成13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大到高级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粮、牧，小到社员的锅、碗、瓢、盆，一律收归公社所有。社员生老病死、男婚女嫁都由公社统包下来。全面消灭农民的家庭小伙，一律参加农村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的“共产主义生活”，并实行全面搬家并庄，按军事化组织，男女分开、集体住宿。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致使出现秋收粗放，到处丢粮，秋种有误农时等等严重问题。

由于粮食高估产，引发了连年粮食高征购，致使购粮年年过头，季季过头，样样品种过头。加之1959年夏秋旱灾，致使粮食征购连年完不成征购任务，采取了年年季季户户搜粮，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普遍发生，从而出现了全县性的荒、逃、饿、病、死，更严重的出现了人吃人。

有关资料表明，全县270多万亩耕地，有近百万亩抛荒。由于农民连年饥饿，全县成千上万人口外流，因饿而引发的多种疾病达50万人次以上。全县农村71万人口，据多点调查推算，死亡人口达20万人以上，人吃人多处发生。耕畜减少50%以上，鸡鸭大减，许多村庄猫狗绝迹。农民房扒拆和倒塌近10余万间。80%以上的林木被砍伐，全县农村面貌全非，一片凄凉。

根据中央指示，于1960年底至1961年上半年，开展了整风、整社，基本上刹住了“五风”，同



时设区分社，缩小了社队规模。在上级的再三督促下，于1961年10月7—10日，举行了亳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但对人民代表大会停止活动三年多的时间里，亳县发生一系列悲惨的重大事件，仍然是报喜不报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颠倒的历史。

在县人委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按照先成绩再问题后任务的常规模式，除农业按照整风整社中落实的产量外，工业、手工业、交通、邮电、水利、文教、卫生等各项工作，有不少仍是以“大跃进”的成绩指标，向大会报告。在取得成绩的原因上，仍然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结果。肯定了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摆脱贫困的愿望。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三面红旗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报告中讲到问题时，也不得不接触一点事实。如口粮标准低、副食品少、布票不足(笔者注：1961年每人发布票1.7市尺)、群众家底薄、国库空虚等。关于造成问题的原因，说法是这样的：

首先大讲了“连年自然灾害”、“1959年百日不雨”和“1960年的风、霜、虫、涝等灾害”。亳县的实际是：正常年份降水量820毫米左右，而1959年降水量634.1毫米，属于雨水偏少。但旱

39.5%，农民大部分口粮被购走，从而出现了1959年冬和1960年春夏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1960年的征购办法依旧，所以农民秋冬死亡继续发生。为了夸大灾情，1960年基本无灾，但把全县发生的0.42万亩虫灾，也置于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其次，人们很难想像的理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反坏分子占据领导权。同时也有蜕化变质分子为非作歹，破坏政策，危害群众，打人扣粮，不发社员工资等，造成人畜伤亡。这个问题，从整风整社揭露的情况看，全县干部中五六类分子仅占5.3%，补划地主、富农约不足百户。而造成全县28000多户农民家庭毁灭，30%左右农民死亡，难道说这少数坏人会有这样大的能量吗？明显的是政策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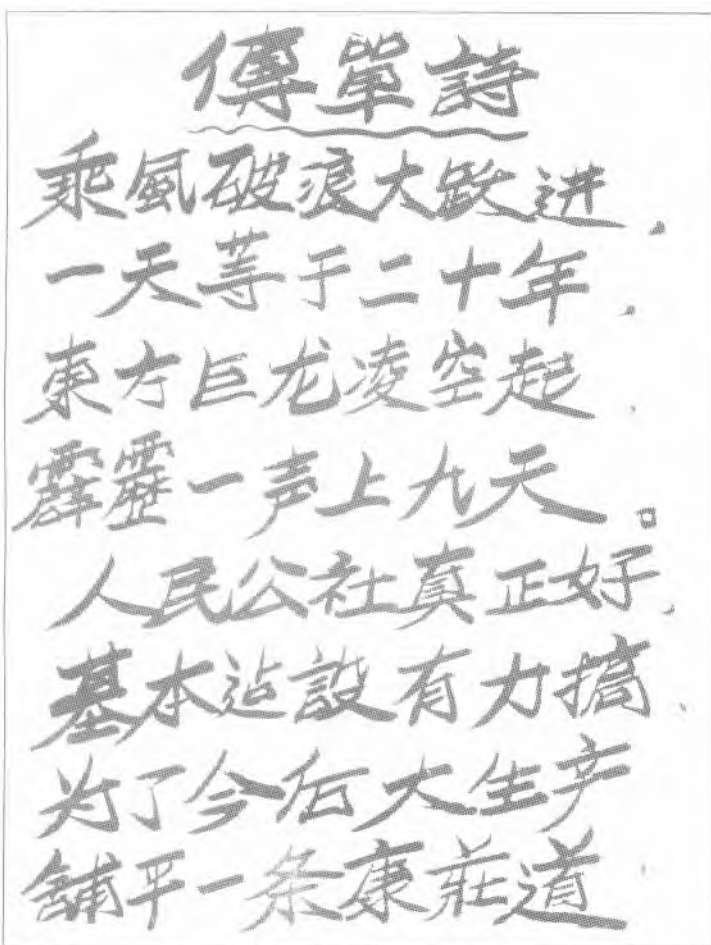
第三是“我们的步子大，工作没有经验及‘五风’危害”。这一条虽接触了问题的实质，可惜仅用一句话一带而过，把悲惨的历史掩盖起来，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县人代会再也没有提及这方面的问题。

从“大跃进”中亳县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来看，人祸超过七分。然而在县人代会上长达万字左右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发生的问题和原因仅有200多字。由于当时代表们历经两次反右，心有余悸，对重大人畜伤亡没有一个人提出

情出现在7—10月的关键时期，从而形成了旱灾。由于抗旱中实行大兵团作战，死保少量水稻，放松大田等，从而加重了灾害。到秋收季节又大吹抗旱取得大丰收，粮食产量超过“大跃进”的1958年。按照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强迫进行粮食高征购，商品率达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第一次公开提出“大跃进”口号



大跃进中出现的传单诗

尖锐的批评，顺利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并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换届选举任务。正如人们所说：“这次人大大会是顺顺利利作报告，高高兴兴当县长。”以后，还有顺口溜说“饿死人不要怕，骗过政协骗人大”。

## 县人委与县委合署

为适应“大跃进”和“全民皆兵”的形势需要，1958年10月8日县委第一书记宣布，亳县为民兵第九师。县委为民兵师党委，县人委为民兵师司令部。县委、县人委合署办公，两委办公室合在一起。宣布当时县长、副县长都不在机关，宣布后向他们打个招呼，即完成了合署任务。名为合署实为合并。从此，县委、县人委党政不分，工作都步入了不正常状态。合署后县长、副县长的工作安排：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带民工去地委凤台钢厂炼钢；县委常委、副县长兼第一中校长

并驻校兼搞教育系统肃反；另两位副县长，一人调人民大学学习工业，一人因右倾未安排工作。

随着县委、县人委合署办公，县委书记处会议和县委常委会议及全委会议不能正常召开。县人委党组会议、县人民委员会议、县长办公会议、科局长例会等均停止召开。作为县人民代表大会执行机构，县人委主要活动停止了，当然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也随之停止。之后虽然在党内决定调整了县长、副县长，但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也经常无人主持人委工作。小事由县委各部包揽，大事由第一书记决定。县人委所属各科局的工作和干部管理均由各部分包。党、团组织大部分归口组编。县人委人事科合入县委组织部，县委政法部驻公安局，县农林局长搬进县委农工部办公等等。县人委办公室干部既属县委政法部管理，又在县委办公室领导下进行工作。

由于上级政府机构没有停止运转，县人委总会有些行政任务，如原规定党管干部，需要政府任命的科局长，都是由县人委会通过任命。而合署后只要由县委或县委组织部通知执行，县人委不再履行任何手续。

各科局需要由县人委出面下达的文件，有不少由县委各部批发。如县人委文教、卫生方面的文件，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高某不断签发；人委财粮科必须由县人委下达的文件，有一次县委财贸部工作人员田某某说“干部由我管，业务由我抓”，接过文件草稿在领导批示栏内代县长划上个“行”字；县水上运输人民公社成立，本应由县人委下文，而县委工交办公室发文宣布执行，如此等等，至此可以说县人委只有一块牌子，一颗印章。

我作为县人委办公室唯一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对合署后发生的问题，不得不作为业务研究，曾小心谨慎地向县委和县长们提过几次。万万没有想到，1959年冬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网织成“不服从县委领导”、“分裂党政活动”、“破坏党政关系”、“把科局与部办平衡看待”等等罪名，加之我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问题越



发严重,经过反复批评,于1960年3月免去我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县以下的区、社(人民公社)乡党委,从反右派以后,区乡社长不仅配置数少,而且多长期下去包点或兼职,对县人委部署的工作,不能很好地完成,有的甚至公开对抗。如1958年5月中旬,县人委发出通知,5月26日召开县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信寄张集区以后,竟被县委书记、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兼张集区第一书记张某某,在信封上签署了“区公所无人退回”等字样,邮局把信原封退回县人委办公室。由于县人委管不住下级党委,县长们没有敢说什么,只是要办公室请示县委,后由县委出面与张谈妥后,才勉强接受按此通知办理。

自1958年10月,县委与县人委合署,到1961年10月县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完成县人委换届选举后,县委、县人委才始得分开,县人委工作逐步恢复正常。“大跃进”造成的违反《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严重事件,长达三年的时间才得到纠正。县人委一位负责同志说:“这叫违法不犯罪,没有什么大问题。”

## 县政协活动受限

县政协委员的委员,由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艺术等知识界和工商界所占比例较大,当时很多属于改造对象,在反右派和“大跃进”运动中,几乎被领导视为右的范畴。这样一来,政协的各种活动就受到限制。

三年中,每年一次政协全委会都按时举行,虽听取审议政协常委的工作报告,而委员们多种形式的考察活动,大大减少。特别是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对农村生产生活方面的考察全被停止。各工作组对农村也无工作可做。

在参政、议政方面,对国家公开发表的重大方针政策,如1959年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国庆十周年前夕国家发布千名战犯特赦令,干部下放劳动等问题组织座谈活动外,对本县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全属禁区。不要说组织考察活动,就是谁说句实话,也会大祸临头。由于县人大停止一切活动,县委与县人委合署,对政协委员列

席人代大会,参与政府领导人选的协商等政治和民主权利,也不复存在。

根据政协章程,1960年12月6—11日,县第四届政协举行全委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共亳县县委负责同志“关于政治形势”和“人民公社政策”两个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大讲了“东风压倒西风”、“大跃进取得的伟大成就”、“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即规模大,公字程度高),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社员生活集体化,实行食堂制,吃饭不要钱等。也讲到了公社初期的浮夸风、“共产”风及严重自然灾害给公社造成的一些损失。同时为加强县委对政协工作的领导,这次会议完成了换届选举,原由县委副书记兼任县政协主席,改选为县委书记兼政协主席。

人们都知道,1960年是亳县农村饿死人最多、对农村生产力破坏最大的一年,召开四届政协全会时,饿死人还在继续,而两个报告中对发生的严重问题,实行了全面封锁。据一位常驻会专职委员张某某曾经反映:“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听取了县委的多次报告,对农村饿死人等严重问题是滴水不漏,对我们这些人是严守秘密的,只有表决通过报告。”

三年中,县政协常驻会专职委员和工作人员除了搞点文史资料和协助编《县志》以外,没有多大的任务,正像顺口溜所说:“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参政议政少沾边。”

“大跃进”中,亳县发生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及民主监督的权利被剥夺,县人民委员会的职权不能全面行使,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等重大事件,使国家法律变成一纸空文。这充分说明了这是权大于法、人大于法所致。这段颠倒的历史过去已近半个世纪,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政协、人大按照党中央的倡导和建议,提出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方针,同时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和亲民措施。特别是将“国家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首次写入宪法,使人民的权利有了根本的法律保障。按照这条路子走下去,政通人和,前景大好。感奋之余,回顾往事,写此短文,抢救历史,以鉴往知来。

(责任编辑 李 晨)

# 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李维民

共产国际作为全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在1943年5月决定解散以前，在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上，虽然有过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但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也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根据共产国际特别是共产国际七大的新精神制定的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阐述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经过。他在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形势的变化后指出：

“根据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根据新的国内国际关系，沿着远在一九三三年就已开始采取的新的政治立场（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内任何愿意同我们合作的成分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道路，把它提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因而发表了一九三五年八月的宣言，十二月的决议，一九三六年八月的致国民党书，九月的民主共和国决议，并且根据了这些，使得我们能够在当年十二月间发生的西安事变，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送致国民党三中全会一个团结抗日的具体建议。去年五月，召集了一次临时性的代表大会（名曰苏区代表大会，有当时苏区非苏区及红军代表参加），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批准了红军实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实行改为民主制。这样，就在事实上由国内战争的状态转到了开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

《论新阶段》这个曾在全党普遍学习的重要文件，虽然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但是，毛泽东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与发展的叙述，比之后来某些有关的叙述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

从1933年开始采取的新的立场，是指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起草的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四人的名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宣言提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与这个宣言成为姊妹篇的，也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也提出了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实现“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

这时，共产国际和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虽然尚未克服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念已开始





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季米特洛夫、陶里亚蒂、弗洛安、王明；后排左二起：哥特瓦尔德、皮克、马努尔斯基

转变。当时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还是“下层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季米特洛夫出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共产国际的政策才有了重大的转变。季米特洛夫因在希特勒炮制的“国会纵火案”审讯中所表现的非凡勇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象征。1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正式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王明、康生、张浩、吴玉章等20多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七大前夕，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精神，和1935年日军继续向华北入侵的严重局势，在王明主持下，代表团全体成员反复讨论了七天，最后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于8月1日形成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郑重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在8月7日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第23次会议上，王明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的长篇讲演，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指出：“中国共

产党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  
是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全体  
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的政党。”“在目前的中国，反日  
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问  
题，不仅具有头等意义，而且具  
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季米特洛  
夫充分肯定了《八一宣言》和王  
明的讲演。

### 共产国际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错误的

《八一宣言》在巴黎《救国报》发表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长征中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已

经中断。为了及时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七大尚未结束，中共代表团便派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的张浩（林育英），带着密电码，不畏艰险，长途跋涉，于1935年11月中旬到达陕北瓦窑堡，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不久又会见了从前方回来的毛泽东、周恩来。在12月17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对统一战线的根本策略方针，和工农苏维埃改变为人民苏维埃及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会议根据张浩的传达，结合当时国内形势，经过反复深入的讨论，12月25日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毛泽东所说的十二月决议。决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并指出：“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这个决议基本上体现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

神,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但是决议仍然认为“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把反日与反蒋相提并论。1936年2月21日,张、毛、彭签署的关于与张学良谈判的训令中,估计张学良“同意抗日,但不同意打蒋”,我们的策略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4月9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从东征前线致电张闻天,虽然提出“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但同时提出“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

1936年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批评中国共产党对南京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治方针是错误的。8月9日,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潘汉年,在保安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以及他回国后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联络的情况。中央从而得到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是蒋介石首肯并由陈立夫主持的信息。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做报告。会议一致认为,应该承认南京政府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明确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要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为此,必须“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订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

共产国际的指示,对推动中共中央确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对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起了重要作用。8月24日,以“洛、恩、博、稼、泽”署名的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

提到:“九个月来统一战线工作,虽原则上执行了国际七次大会路线,但在对南京及西南等问题上,我们是犯了错误的,现正遵照国际指示迅速纠正。”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8月31日,周恩来回复国民党方面参与国共谈判的曾养甫,请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同日,周恩来又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再次表示中共方面早已准备随时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作具体谈判。9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9月24日,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带着中共致国民党书和周恩来再致陈果夫、陈立夫函,去上海与国民党谈判。

## 《八一宣言》推动了国共两党的接触与谈判

国共两党的接触,是从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后开始的。1936年1月,蒋介石派驻苏联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并提出三项初步建议,王明答复说,国共两党中央都在国内,谈判在国内进行为好。与此同时,蒋介石要陈立夫设法与中共建立联系。陈让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办理,曾养甫派早年曾与周恩来同学的交通部劳工科长谌小岑寻找共产党。谌小岑通过左派教授翦伯赞找到时为民族反帝大同盟负责人的历史学家吕振羽,1935年11月底,中共北方局派北平市委负责人周小舟和吕振羽去南京和曾养甫接触。谌小岑还在上海多次会见了中共代表张子华。1936年1月,宋



庆龄在上海的寓所把一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交给曾是中共党员的董健吾（即王牧师），要他去陕北，转达国民党愿与共产党直接谈判的意向，并给董健吾一张由孔祥熙签署的“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上海地下党派张子华装扮成董的仆人，两人一同到了西安。这时，陕北根据地处于张学良部队的包围中，要去陕北必须得到张学良同意。在此之前，张学良和杨虎城与中共方面已有了联系，但接触是秘密的，怕被南京发现。张学良看到南京方面也派人来了，便更放心与中共联络。2月19日，他派飞机将董健吾和张子华送到延安，再由当地驻军用骑兵护送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见到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董健吾回到上海后，在宋庆龄寓所向宋子文、孔祥熙作了汇报。张子华后又多次往来于南京与陕北之间。

中共在与南京方面接洽谈判的同时，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络，取得了更显著的成果。从1936年1月开始，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先后同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举行谈判。4月9日，周恩来又亲赴延安与张学良进行秘密会谈，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协议。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人，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问题，也达成了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互派代表等协议。中共中央领导人还在保安接待了李宗仁、李济深等派来的代表钱寿康，并与之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中共还与北平的宋哲元、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新疆的盛世才等有了联系。

1936年12月上旬，中共代表潘汉年再度同国民党陈立夫谈判。12月8日，中共中央从潘汉年来电中得知，国民党方面继续坚持苏区和红军必须先改制改名，统一行政和军事组织于南京政府领导之下，限制红军改编后的人数不超过3万人，并否认谈判的平等地位。中央当即回电潘汉年，认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表示：“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不作无原则让步。”12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通报中共与蒋方谈判情况时，也重申了这一原则。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 共产国际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杨反复劝蒋均遭斥责。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没有告知中共，突然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提出八项主张。消息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时已是夜晚，欢欣鼓舞的人们聚集在广场上庆祝。谢觉哉登高一呼：蒋介石怎么办？台下齐呼：杀！（1980年4月15日访问冯文彬谈话记录）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首先发言，认为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主张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影响全国。提出在人民面前揭露蒋的罪恶，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二辑135页）。虽然，张闻天在会上主张“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毛泽东在最后总结

时,也说了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批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但会议的基调还是“审蒋”、“除蒋”。毛泽东、朱德等15位红军将领发表的《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要南京当局“自别于蒋氏”,“自别于亲日派”,“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罢免蒋氏的主张是与共产国际的意见不同的。共产国际8月指示中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是指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联合抗日,即举国一致的抗日统一战线,而不仅仅是与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很快表明了不支持的态度。12月14日,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认为西安事变“事实上促进国家之分裂,沦中国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发表社论,认为“自蒋氏长行政院以来,已逐渐集中力量,显示领导国家之准备与能力。张学良之发动,足以破坏中国御侮力量之团结。”(见1936年12月16日《中央日报》)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开始对西安事变的认识不同,主要是由于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判断有区别。在12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曾提出“要争取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孤立何应钦,联合阎锡山,联合刘湘,再进一步联合桂系”。12月14日,中央致刘少奇并转上海的电报,提出活动“阎(锡山)傅(作义)等起来响应张杨等的抗日主张”。但事与愿违,西安事变发生后,上述各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均未对张杨表示支持,甚至谴责张杨的做法。连不久前发动两广事变反蒋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也未支持张、杨。南京、上海的主流媒体更是一片谴责声。共产国际和苏联基于原来的主张,又看到事变后的形势,所以对张学良之举采取不支持的态度。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共产国际的电报,要求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表态,对于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说,根据从1933年开始,特别是1935年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使得我们能够在当年十二月间发生的西安

事变,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这无疑肯定了共产国际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所起的作用。但还不仅如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表态起了更直接的作用。通常的说法是,12月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但因电码错乱不能译出,直到20日才收到(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563页)。但是,12月16日的《中央日报》已经报道了《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接着又报道了苏联驻中国代办向南京政府外长张群表明苏联政府立场的消息。周恩来17日到达西安后,18日向中央发电,汇报了国内外各方包括苏联的反应。在1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在发言中也谈到了苏联的反应,说明这时中央已得知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在此之后,中央才最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于19日向党内发出通知,并公开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将原来提议召开的救国会议改为和平会议,将会址由西安改为南京,改变了原来以西安为抗日中心的设想,承认南京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正式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契机,并有了后来一系列的成果。如1937年2月10日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团结抗日的五项要求和中共方面的四项保证。并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去西安、杭州、庐山等地,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子文等进行了多次会谈。193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批准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一系列决策。1937年6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了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对于蒋介石企图削弱和控制共产党,限制人民民主的无理要求进行了斗争,使国共谈判取得了进展,使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得以实现。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指出:“历史的车轮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责任编辑 李晨)



# 一代学人傅斯年

纪秩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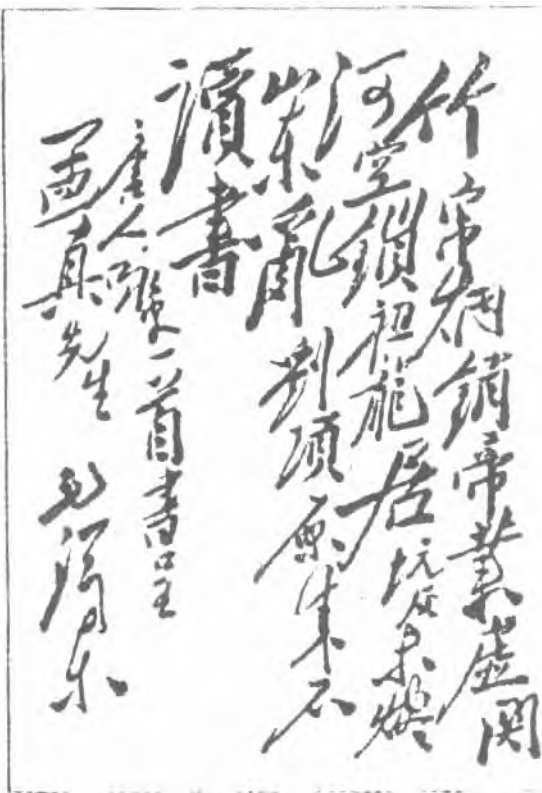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1896年3月26日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市北门里祖宅(俗称相府)。傅氏为当地名门望族,教育世家。其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开国第一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太子太保,是康熙的启蒙老师。他对清初满汉文化融合和康熙从政后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康熙南巡途经聊城时,曾为其祖宅题词“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横批“圣朝元老”。其曾祖傅继勋曾任安徽布政使,是清朝名臣李鸿章、丁宝桢的老师。其父傅旭安曾任东平龙山书院院长。

傅斯年从小敏而好学,十二岁读毕十三经,初步奠定了国学基础。因为其父早逝,他十三岁随其父亲的学生侯延爽到天津,考入府立中学,接受新式教育。后入北大预科社会科学部学习,以病弱之躯,名列第一。他20岁升入北大本科国文门,23岁投身文学革命,创办《新潮》期刊,参加“五四”运动,任总指挥。25岁考取官费留学生,到英、德等国留学,重点攻读数理化和心理学等现代科学,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

普朗克的“量学论”,以及实验科学,比较研究法等。七年留学生涯中,他广泛涉猎西方科学教育、文化典籍,孜孜以求。“为学好造金字塔,既要博大又要高”,不断攀登科学创新的制高点。

1926年10月,傅斯年结束了长达七年的英、德留学生涯,满载回国。12月应朱家骅、戴季陶之聘,到广州任中山大学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并亲自开课讲授《尚书》、《古代文学史》、《陶渊明诗》、《心理学》等课程。他广泛网罗知名学者如顾颉刚、杨振声、丁山等来校任教。1927年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发表论文多篇。不久,该所扩建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兼任所长。建所之初,傅斯年提出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的目标。该所组建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四个组,分别聘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定良为各组组长。在此期间,傅斯年抢救整理了明清大内档案,出版了《明清史料》30册。同时领导发掘了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和河南殷遗址。傅斯年还发表了许多学术论著,如《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略东北三省,傅斯年忧心如焚,频频发表言



毛泽东书赠傅斯年的条幅



傅斯年与周恩来在延安

论,鼓吹抗日,在百忙中组织编写了《东北史纲》一书,用大量史籍资料证明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该书出版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联调查团”作为参考,成为1932年“李顿国联调查团”调查“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政府提供的确凿历史证据。在北平沦陷在即之时,为保护文化教育事业,傅斯年提出将北大、清华、南开合并南迁的建议,后在昆明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为我国保护和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

1945年7月1日,受国民党参政会推选,傅斯年、黄炎培、褚辅成、左舜生、章伯钧、王云五等,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赴延安访问,傅斯年一行六人于当天下午抵达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从7月2日起,傅斯年等人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等进行了三次会谈。他们会谈的事项特别多,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即《延安会谈记录》。五日后傅斯年一行返回重庆。握别时,毛泽东将一帧亲笔墨迹面赠傅斯年,上书“竹帛烟销帝业

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泯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傅斯年等人的延安之行,促进了国共和谈。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开始国共两党和谈。1947年聊城解放时,为保护文化古物,颁布三项命令,其中第三项“保护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聊城北街的住宅”等等,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颁布的。但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场灾难深重的“文革”浩劫,波及聊城。傅斯年家族许多人惨遭迫害,历史上的“相府”、“傅氏祠堂”被强占,1976年傅氏祖茔三百多人的坟墓被挖掘,暴尸荒野。傅以渐茔地所有地上文物石刻、牌坊、碑文和近千棵古树全部被摧毁……幸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春风吹散乌云。20年来,在党中央、省、市委领导下,拨乱反正,被尘封了五十多年的历史逐渐被世人所了解。聊城修建了傅斯年纪念馆,2004年在聊城召开了“傅斯年先生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此前1991年至1996聊城共召开三次)。现在正在筹备纪念傅斯年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会。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长。他上任后,面临的第一难题是北大复员问题,以及数以千计的师生员工和庞大的校产转移搬运;另一棘手的问题是处理伪教人员。傅斯年克服重重困难,在短短的半年内,不仅北大顺利迁平复课,还延揽了一批实力强的教授,并坚决地辞退了敌伪时期北大的教职员。他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仪廉耻”四字下给学生作榜样,维护了北大的爱国主义传统。

1948年11月,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第四任校长。面对前几任留下的困难局面,傅斯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首先废除了日本教科书,在一、二年级开设通习科目,提高基础课程的水平。傅斯年亲自担任国文大一、大二的教学工作,广聘教授,建章立制,跑经费,建校舍,在不长时间内,台大招生人数一增再增,教学水平直线上升,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他为台大提出八字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这八字校训也是傅斯年一生的真实写照。几十年来,台湾大学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一流水平的名牌大学,这其中凝聚了傅斯年的许多心血。



可以说，傅斯年是台湾大学迈向现代化的奠基人之一。

公元 1950 年 12 月 19 日，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傅斯年和夫人俞大彩女士，在他的小书室中生炭盆取暖，傅斯年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为《大陆杂志》赶写文章，夫人坐在他对面缝补他的旧袜子，傅斯年急于拿到这笔稿费做一条棉裤。他搁下笔对夫人说：“稿费到手后，你赶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次日，傅斯年穿着他单薄的西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答复关于台湾大学的有关问题。他在台上高声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对有才能有智力的穷学生，绝对要扶植他们！”讲完后走下台来，突然倒在地上，猝然而逝。

台湾大学停课一天，下半旗致哀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各界前往致祭者 5000 余人，送挽联 270 余副，挽诗 60 首，中西文悼言函 90 余封。

1994 年春，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为傅斯年陈列馆题词“傅公高风亮节，足为后世楷模”。2005 年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高度赞扬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健将，任北大代校长和台湾校长，多有建树，贡献很大。台大幽静的校园里，至今还回响着“傅钟”的嘹亮钟声。连战以“一代学人”题词，为傅斯年纪念馆落成志庆。

## 二

傅斯年先生 1926 年(31 岁)从西欧留学回国，先任中山大学教授，并创建语言、历史研究所。后兼任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曾代理北大校长，最后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 年(55 岁)英年早逝。短短 24 年的教育生命，他始终站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而奋斗的岗位上，呕心沥血，进行开拓性的教育改革实践，卓有成效地谱写出一系列教育新诗篇。如同马卡连柯、陶行知和苏霍姆林斯基等现代教育家一样，以光辉的教育革新业绩，永载教育史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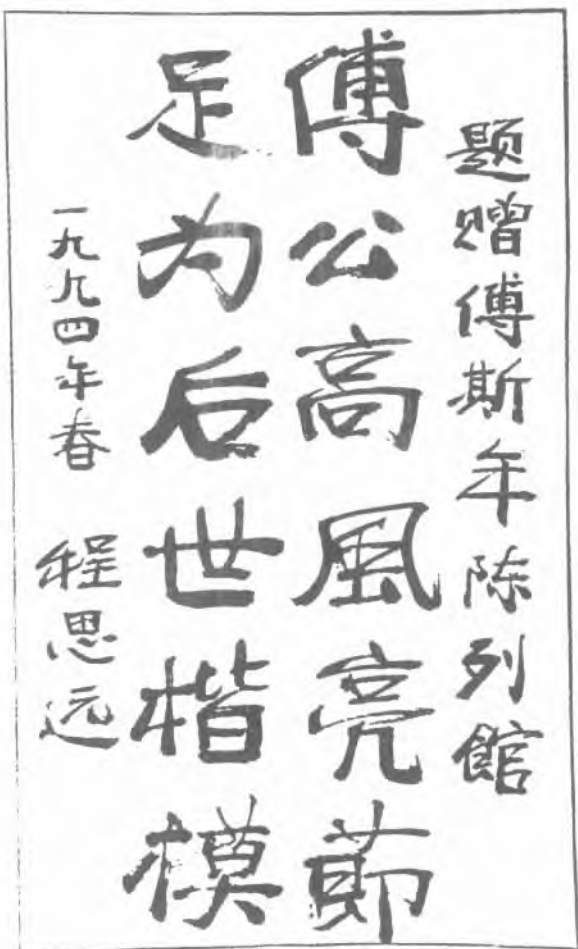
傅先生不仅是最受欢迎的一流教授，同时是最受师生爱戴的院长、校长、所长；他不仅是学校教育实践的事业家、管理专家，同时是教育革新

的理论家；他不仅是承前启后的知识传授者，同时是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的开拓者……傅先生是纵贯古今、横联中外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现代综合教育家。

### (一) 亲自授课与科学管理相结合

傅斯年身兼教授和行政领导双重职务，而且满负荷运转，长年如此，这是非常了不起最令人敬佩的。从开始在中山大学任教直到任台湾大学校长，他都坚持为学生亲自授课，始终未离开讲台，还经常深入课堂听老师讲课，和教师同甘共苦，与学生打成一片。他既懂多科专业课的教学，又懂行政领导的科学管理；既关怀学生的成长，又体贴教师的甘苦；既是师生的领导，又是师生的朋友。学校形成教学相长、团结奋斗的人和亲情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学风、校风，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创造力，全面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

傅先生身兼数职，一个人做三四个人的工



程思远为傅斯年陈列馆题词

作,都是自愿选择的。一方面体现了他博学多识的睿智和拼搏奉献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科学与民主相结合的综合管理体制的成功:形成一套完备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岗位分工负责制和民主管理制度(如建立校务委员会制和学生自治会等)。人人都是学校的主人,群策群力,自主自立,自尊自律,学校工作可以自动运转,大大提高了工作和学习效率。

## (二) 学校教育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傅先生的教育实践和理论,不是脱离实际的、坐而论道的、封闭式的经院教育,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知行合一的、开放式科学教育。他创办的语言、历史研究所是这一教育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可操作性的有效途径。他为什么选择语言、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呢?因为任何学科专业都有其产生、发展、成熟、消亡的历史,任何学科的成果和历史都是用语言文字记载、表述和传播的,历史规律在许多学科领域都具有相通性,可以收到举一反三、一通百通的效果。因此,创建和坚持“语言历史研究所”的事业,是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从广州到南京,从西南联大到北大,最后到台湾大学,他从未间断过,而且傅先生始终亲任所长,可见其重视的程度。他的学生中虽然有不是学语言、历史专业的,但是科学研究的创造意识、基础能力和良好习惯都是相通的。心理学的“学习迁移”原理是傅先生最欣赏并运用自如的。

对这种学校教育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实践和理论,持之以恒,身体力行,是傅先生的创举,有利于建设科研型教师队伍(不做教书匠),有利于培养研究型的、学以致用(不做书呆子)的学生。长期坚持逐渐形成了“一、二、三、四、五、六”的教学与科研互依互促、良性循环的有效机制:即教学与科研一体化;取得育人实践成果和理论升华双成果(如创办期刊出版文集);三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领导、专家与师生结合(如开展社会调查,古文化遗址发掘,不同民族语言和历史资料的采访、搜集都是三结合的成果);四层次是师生科研队伍的初、中、高、专的四个层(不用一个标准要求),也是每个科研型师生成长的四个阶段(不要求一步到位);五方法是以行动研究法为主,结合调

法、文献法、比较研究法和古今中外法等综合运用;六字箴言是:教、学、做(合一)、思、辩、写(结合)。

傅先生创办的院、校、系、所都是师生成人成才的摇篮,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手脑并用、德才兼备的现代创业者和科技文化的建设者。

## (三) 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和择优借鉴相结合

傅斯年所以能成为前无古人的现代综合教育家,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主客观多种条件的综合。其中最主要的是他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热爱学习:勤学、善学、乐学三位一体,始终处于“三学”合一的最佳学习境界,并终身学习,一以贯之。因此,成为学贯中西、文理并举,承传优秀文化与择优借鉴、综合创新相结合的历史学家、教育家。

傅斯年以亲历其境的切身感受,对比中西文化、教育的优劣长短及其不同特点。有比较才有鉴别,有继承才有发展,有择优借鉴才有综合创新,逐渐形成了他的科学教育文化观:既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他坚持亲自开设国学课),又要吸收借鉴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方法(他坚持创办语、史研究所,并亲自教授“心理学”)。二者结合,相得益彰。他既反对盲目地排外,又反对僵化地复古;他既重视博采众长,汲取西方科学与民主的精华以为己用,又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崇洋媚外。

他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凝聚贯彻于一生的教育事业中,他把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所以选择了教育。正像陶行知所说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许身孺子甘为牛,学海指航巧作舟,愿化春蚕丝吐尽,织成锦绣饰神州”。他实践了孙中山所倡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八方友,创千秋业”,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终身学习,自强不息。“历尽磨难成铁骨,养就浩气育英贤”。他不仅善于言教,更重身教,他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光辉榜样获得了学生、亲友和世人的衷心爱戴和永久的敬仰。

我们纪念傅斯年先生,学习他的思想、精神和事业,既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有借鉴创新的理论价值和可操作性的实践应用价值,值得进一步系统地总结弘扬。

(责任编辑 李 晨)



# 任白戈文革蒙难记

何 蜀

任白戈(1906—1986),四川南充人,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左联”执行委员、秘书长。1935年夏因国内政治形势恶劣而避居日本,团结在东京的中国左翼文化人,建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1937年回国,“七七事变”后到延安。先后担任过抗大总校政治主任教员、抗大附属陆军中学校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建国后先后任重庆军事接管委员会委员兼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主席等,文革爆发时,他正担任着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是重庆这个当时西南最大工业城市的“首席执行官”。

## 被一条注释打倒

文革开始以后,中共重庆市委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即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们,虽然与全国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却并非“很不认真”,而是像领导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积极认真行动起来。任白戈亲自“挂帅”担任了重庆市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

一开始,重庆市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仿效北京的做法,掀起了揪“三家村”、打“黑帮”的高潮,由市委部署,首先批判了原《重庆日报》副刊《巴山漫话》杂文专栏,“揪出”了《重庆日报》以副刊部成员为主的“三家村”,并将1963年已受到批判处理的所谓“萧、李、廖(市委前组织部长萧泽宽、前副秘书长李止舟、前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反党集团”定为《重庆日报》

“三家村”的“黑后台”,重新抛出来加以公开批判。同时,在《人民日报》6月2日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大学“陆平黑帮”、6月16日公开点名批判南京大学“匡亚明黑帮”之后,重庆市委也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批准,于6月21日将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定性为“黑帮”,责令其“停职检查”,并在22日《重庆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市委还派出200多人的强大工作组进驻重庆大学领导“抓郑思群黑帮”,将校、系两级领导干部90%以上“靠边站”,发动师生员工进行全面开花的揭发批判。

不料,当重庆市正在按照以往政治运动的经验开展这场运动时,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却挨了意外的一闷棍: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不征求有关组织意见,也不向有关组织打招呼,突然袭击地采用在文章的注释里点名这种“史无前例”的手法,批判了重庆市的党政最高领导人任白戈。在这期《红旗》杂志上,以当时中央文革成员穆欣不久穆欣本人也受到打击迫害)署名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中,批判“周扬的一些追随者”“围剿鲁迅”,在说到“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在注释中点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

在此前的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到严厉批判的所谓“彭罗陆陆反党集团”中,为首的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随后,彭真遭到不点名的公开批判。任白戈是继彭真之后第二个被批判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不同的是,任白戈是在尚未被撤销职务并且其所在地

区党组织及上级领导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中央权威刊物公开点名的，而这时彭真虽已遭到批判但尚未在报刊上公开点名，同一期《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没有点彭真的名。

虽然这次任白戈被点名不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而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注释里出现，但是当时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有严格的政策规定，决非可以任意而为。而且，当时作为中央舆论喉舌的传媒，都被视为传达的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因此，《红旗》杂志此举必然被视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那篇文章在各地党报转载（《重庆日报》于7月6日转载）、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后，重庆立即引起震动，许多干部纷纷打电话询问市委：被中央点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庆的领导人任白戈。市委无法回答。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后来在一次向群众所作的公开检查中回忆了当时西南局和四川省领导人处理任白戈问题的一些情况：“在穆欣同志的文章点了任白戈名的第二天，我和大章（注：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志高（注：廖志高，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商量如何处理的问题，先用电话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他当时答复是罢官。同时又用电话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答复，下午中央书记处要开会，等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再复。我们当时商量下决心一步走（即罢官），由志高到重庆了解情况，等中央书记处会议答复后再宣布处理。晚上接陶铸电话说，邓小平意见，任白戈过去是周扬的追随者，这十几年在重庆市工作还不错，要不要罢官还要看一看，你们写个报告来，中央再正式批（大意是这样）。我当晚即按原电话转告了廖志高照办，不久就写了报告到中央，以后中央正式批复也是这样批的。”李井泉当时自我批判说：“这件事是我们直接执行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没有执行伯达同志指示的一个证明。”（李井泉《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1967年2月8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传组1967年2月10日印）

7月8日，廖志高专程赶到重庆，召开市委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

错误是30年代的问题，60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随即，任被迫以“请假检查”名义停止工作。

在重庆这个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党政一把手突然之间被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打入另册”，威信扫地，在市民中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这是重庆局势陷入大动乱的一个重要起因。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锻炼”的不少干部、群众，已经学会紧跟风向行事，“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在任白戈被公开点名之后，马上就有人写了批判任白戈的文章、大字报或揭发批判材料寄给重庆市委及有关部门。比如，重庆大学电机系六个二年级学生就于7月9日写了批判任白戈1959年1月7日发表在《重庆日报》上的《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作品》（给重庆市文艺干部和文艺活动积极分子的报告）的文章寄给《重庆日报》。

## “一个奇怪的华侨”

被安排“请假检查”的任白戈，对要求他承认的“鼓吹‘国防文学’”、“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攻击鲁迅”等罪名都不愿承认，怎么也想不通，无法写出让上级满意的检查。跟他一样想不通的省、市委领导只好从市委办公厅、宣传部和报社抽调了几位干部和“笔杆子”，同任白戈一起住进重庆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帮助他查阅资料，上纲上线“提高认识”，以便写出像样的检查“过关”。但用了近一个月时间，他的认识仍然未能“提高”，他始终认为，自己当年在日本得知国内文艺界发生“两个口号”之争后，写文章宣传“国防文学”，是因为那是党提出的口号，他那时年轻，在日本看不到毛主席的书，不知道党内有毛主席这条路线。那时周扬是代表党的，是领导人，而鲁迅是党外的，听周扬的，在组织上没有错。他还坚决否认自己有“攻击鲁迅”的错误，认为自己对鲁迅从来就很尊重、崇敬，鲁迅逝世时，自己在东京组织了追悼会，还写了诗进行悼念……他的认识无法“提高”，最后只好由“笔杆子”们按照当时报纸批判的调子帮他拼凑了一个检查上报中央。

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全面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成为全党共识和中共中央正式决定。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显然已意识到形势的



严峻,明白任白戈的下台命运已无可挽回,大约是为了下一步处理方便,遂通知将任白戈转移到成都,安排住进了锦江宾馆。实际上这时任白戈已等于是被软禁起来听候发落。

然而形势骤变,8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东方红礼堂(即锦江礼堂)召开驻四川大学工作组的检讨大会,一些首都赴蓉红卫兵及川大学生认为这是“假检讨”,冲击大会造反,进而与省委形成对立,千余人在省委大门口静坐绝食……省委不愿让任白戈被造反派学生发现抓走,便又将他于8月28日深夜转移,给他改换姓名,以“某省厅长”身份住到成都近郊一处招待所。

8月31日深夜,省委又派专车,将任白戈化名“省农业厅视察室主任张新”,转移到简阳县偏僻山沟——三合坝。并对负责保护(也可说是监视)的公安人员交待,如有农民问起,就说“张主任”是归国华侨。

后来,有造反派文章写到任白戈的这一段经历,用了“一个奇怪的华侨”这样的标题。许多人都还记得,文革前的50年代,曾有一个隐藏于乡间的国民党特务杨进兴被抓到了,报道这件事的文章就以“一个奇怪的贫农”为标题,一时间很吸引了不少读者。深受革命教育的青少年们对“一个奇怪的……”这样的标题自然是耳熟能详,运用自如。可叹的是,昔日的革命领导人任白戈,如今竟也落到了与革命的敌人国民党特务一样以“奇怪的……”为伪装东躲西藏的地步。

就在这期间,8月27日,中共重庆市委为争取主动,召开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代表会议,号召革命左派“集中火力炮轰市委”。李井泉到会讲话,不得不宣布将任白戈罢官。任白戈成了在在职的领导人们力图用来吸引群众批判火力的靶子。

## 住宅成了“展览馆”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毛泽东在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概念的时候,并未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怎样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作出明确的界定,因此,无论中央领导人还是普通百姓,谁都说不清楚怎样才算是“走资派”,在长期受到的左倾思想教育影

响下,一般人就把那些经济上或生活作风上有点毛病的干部,或政治高调唱得少一点,生产抓得多一点,对群众的生活福利关心多一点,对城乡集市贸易搞得活一点,对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表现得开明一点……的领导干部,统统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任白戈既已被西南局和省委宣布正式罢官,那就等于成了可以千人批万人斗的对象。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有了一个合法宣泄口。但群众很难了解任白戈有些什么政治上或工作上的问题,更容易引起兴趣的是其生活上与市民有什么不同。这时,位于重庆市委大门对面的第六中学的学生(该校学生中干部子弟较多),在首都南下红卫兵的鼓动下,率先翻墙闯入市委大院,到任白戈住宅“造反”,并将其作为任白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对外展出。

以往在市民心目中十分神秘的市长住宅变成了公开的“展览馆”,自然轰动一时,当时传单、大字报上对任白戈住宅的称呼是“六十年代的地主庄园”。红卫兵给任白戈住宅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文革前大搞阶级教育期间,四川搞了个有名的刘文彩“地主庄园”展览,一时间报刊发表文章,舞台演出节目,纪录电影全国组织观看,“罪恶的地主庄园”家喻户晓,青少年们记忆犹新,就如法炮制,套用了这个提法。其实任白戈住宅并不是什么“庄园”,只是市委院内一幢旧式小楼及其附属建筑。只因为他是重庆市“一把手”,按照当时已经形成的体制等级和“工作需要”,住得比一般干部宽一些,显得特殊一些。

因为在文革之前已经深入进行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深入进行了“反修防修”教育(特别是批判了苏联有一个“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四清”运动中又反复强调了领导干部的“懒、馋、占、贪、变”的蜕化变质“规律”,文革前夕还大量宣传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廉洁简朴的生活作风,所以,人们对干部生活上的任何一点特殊化都十分敏感。这时去“参观”了任白戈住宅的群众,看到他一家人能拥有楼上楼下那么多房间,大多会感到震惊、愤慨,必然将此住宅看作是“修了”(“堕落为修正主义了”的简略说法)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标志。一些当年去“参观”过的人士至今记忆犹新的,除去房间多以外,还有

这样几点，一是房间里的灯多（当年城市居民通常一家只有一盏灯）；一是那些房间中有专门的“钢琴室”——而这是当时许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几代人同住一间房）的平民不敢想象的；还有就是住宅中有好几个厕所——而在当年，城市居民往往一个大杂院甚至一条街才有一个公共厕所；以及书柜中摆放着不少属于“封、资、修”禁书的文学名著……于是，有参观者出来一传，加上传单、大字报一炒作，自然就引起观者如潮了。

不过，这个“展览”并没有热多长时间，群众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在任白戈之后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现任领导干部身上去了。任白戈毕竟下台早，缺少这方面的“现行”。

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都作了检查，各级领导干部被迫“转弯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大势所趋。李井泉开完会回到成都，立即与省委和重庆市委研究，决定把任白戈送回重庆（大约是准备随时交给群众批判了），随后，主持重庆工作的重庆市委代理第一书记鲁大东把任白戈接回重庆。回来后，任白戈被安排住在市人委旁边的农场管理局招待所。直到群众造反运动兴起后，市委领导瘫痪，任白戈才落到了造反派组织手中。

## 揪来斗去的“死老虎”

1967年1月，全国到处掀起了“一月夺权”风暴，《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欢呼：“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重庆造反派和奉命“支左”的驻军部队也在这“伟大号召下”行动起来，于1月下旬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

1月29日上午，阴云密布，寒气袭人，重庆造反派群众和解放军驻渝部队指战员30多万人在市体育场举行“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已在解放军支持下夺取了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并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等揪到会场批

斗。次日重庆《新闻报道》（《重庆日报》因被造反派夺权，从1967年元旦起停刊，改出《新闻报道》）发表了题为《山城革命造反派掌权黑市委完蛋》的报道及大会照片，其中一张是任白戈被戴上一米多长的纸糊高帽子，由红卫兵反扭双手作“喷气式”状示众，照片的说明文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的一副狼狈像”。不过，天公不作美，会议进行中下起了小雨，批斗者与被批斗者都被雨淋成了“一副狼狈像”。

“一月夺权”引起了造反派的大分裂，重庆市的造反派组织分成了两大派，以重庆大学八一五为首的一派，在驻军支持下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联会，另一派则称革联会是“假夺权”，重大八一五是被“黑市委”收买了的“叛徒”。他们在互相攻击的时候，都竞相比赛谁对以任白戈为首的“黑市委”更仇恨，都认定对方与任白戈为首的“黑市委”有勾结。

在1月29日的誓师大会之后，任白戈作为一个“活靶子”被一些群众组织揪来揪去批斗，不知什么时候被弄到了工人造反军总部。而工人造反军很快成为反革联会一派的主力，与八一五派矛盾冲突加剧。2月23日晚上，八一五派组织人马抄砸了设于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军总部，当他们查抄到一个没开灯的小房间时，找到了被关在那里的任白戈，当时任白戈头上戴了个大草帽，脸上被一个大口罩遮住。于是，又有谣言传出，说任白戈被工人造反军总部“化装隐藏”，造反军总部头头与任白戈有见不得人的交易……

任白戈落到革联会一派群众组织手中后，1967年3月31日，这一派的重庆市委、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在人民大礼堂召开了批斗任白戈的大会。除去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发言批判外，原市委书记处的一个书记，原市监委的一个副书记，原任白戈的一个秘书，都被迫上台按照当时的“主旋律”口径作了“揭发批判”发言，以表明自己愿意“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任白戈被关押在革联会期间，行动还比较自由，每天自己到市委机关食堂吃饭。云南作家周孜仁当年作为重大学生曾被调到革联会编辑《山城战报》，他的长篇回忆录《红卫兵小报和我》对在市机关食堂吃饭的任白戈有一段记叙：“他和我们在同一个机关食堂搭伙，凭票吃饭。食堂大，



至少有二三十张桌子，条凳多已损毁，后来者打好饭菜往往只能站着吃。任白戈任何时候都是站着吃饭的，而且听炊事员说，领导早有交代，任是走资派，只能卖给他低价位的菜。我曾有意识靠近他的饭桌吃饭，有时干脆就把菜端过去和他放在同一张桌子站着吃。他的碗里果然每次都是些清水菜肴。不过他吃得极认真，满嘴咂咂有声。我猜想他的心态绝对正常，因此虽陷逆境而身体依旧十分硕壮，只是胡须常不剃刮，如秋草之零乱，便显出了许多落魄来，很像造反派漫画上的形象。”

当时造反派的漫画上，通常把任白戈画作一只人面虎身的趴着的老虎，既寓示其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表明其已是一只被打倒的“死老虎”。

## “红五条”作出政治定性

因为掌权的一派要“捍卫一月革命伟大成果”，而对攻击革联会的另一派进行了镇压，另一派则上北京告状，控诉革联会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中共中央不得不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5月16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时称“红五条”），在五条意见的第一条中即提出：“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这样，任白戈被中共中央正式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公开宣布撤销了职务。从此，以他为首的前重庆市委领导班子，有了一

个钦定的新名字“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

任白戈在听到传达这个“红五条”之后有什么想法？没有见到他事后的回忆。不过，另一位领导干部的回忆可资参照。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在《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一书中写下了他在听到中央通过“两报一刊”社论将他点名定性为“中国赫鲁晓夫在新疆的代理人”时的绝望心情：“第一次听到广播那天，我正在厕所洗衣服……我怎能经受得住这样晴天霹雳式的致命的打击呢？当时，我只觉得一阵昏眩，差一点跌倒在地，我挣扎着扶住墙，才慢慢地走向囚室，然后一头栽倒在床上。”他称这一天是“一个足以让人绝望的日子”。武光的这段回忆，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体会任白戈在那时的心情吧？

## 在武斗中历险

“红五条”的公布并未使重庆的局势得到稳定，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混乱。

1967年6月，重庆造反派的两大派已经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开始以棍棒、石头进行武斗。6月5日至8日，在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发生了武斗，两大派纷纷前往增援，形成大规模武斗。就在这期间的6月7日，八一五派江北区“捍卫红色政权指挥部”为显示自己“掌握斗



文革中的批斗场面

争大方向”，在江北城街道办事处门前召开了批斗任白戈的大会。

任白戈是从重庆大学押来的，批斗完后，下午3点多钟，八一五派将任白戈用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装上，准备送回重大。开车后不久，看到路边有一个自来水站（当时自来水还没有接入每户人家，居民都得从水站买水后挑回家中使用），任白戈提出想喝点水，押送的造反派也想喝水，便停下车到水站取水，不料，正在此时，江北十六中学的反到底派红卫兵突然冲来，将任白戈抢夺到自己手中，呼啸而去。

十六中的反到底派将任白戈抢到手后，迅速将其转移到三钢厂。三钢厂的反到底派又将其转移出去，辗转经江北县、北碚区、巴县青木关等地，绕了一个大圈子，然后秘密送到市中区观音岩下方的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以后，又转移到了重庆医学院。当时重庆医学院是反到底派势力较强的据点，不仅在该校占大多数的反到底派重医兵团控制了学校局势，而且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和国防工业系统的反到底派组织军工井冈山总部也都设在那里。

然而，重庆医学院很快便成为两大派武斗的一个焦点。

6月23日，八一五派武斗指挥部决定拔除反到底派设于重庆医学院附属小学内的武斗据点，两派在重医附小展开武斗，小学被烧毁，武斗中死4人，伤百余人，财产损失3万余元。

7月1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武斗，使用钢钎、刺刀、自制燃烧瓶等，死2人，伤数十人，附一院门诊部全天停诊。重庆医学院66级毕业生、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

在这样的形势下，反到底派不得不考虑任白戈在这里的安全问题。一天，反到底派重医兵团的一个负责人去查看任白戈住处情况，看到他房间的窗台上放了几个干馒头，问他为什么不吃，任回答，因为担心武斗起来顾不上给他送饭，自己早做准备，省下来作备用粮。

重医兵团发现继续关押任白戈已经是个大麻烦，便找了附近的驻军部队，提出要吧任白戈交给他们管理。部队指挥员一听，马上回绝。为什么？因为文革初期中央就有指示，部队不能作“走资

派”的“防空洞”，有的部队就是因为文革初期收留了去躲避群众批斗的领导干部，而遭到了群众组织的冲击，有的还受到了中央的批评。加上反到底派与重庆的支左部队素有矛盾，部队指挥员不得不防反到底派的这一提议是否“别有用心”。

重医兵团负责人无计可施。一天，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一位负责人来到重医，重医兵团负责人向他说起任白戈不好安置一事，那位军工井冈山负责人开玩笑说：“那有啥子难的？随便找两个人把他拉出去枪毙了算了。”

好在任白戈没有听到这几句对话，否则他一定会好几天睡不安稳觉。

玩笑归玩笑，问题还得想法解决。最后还是由军工井冈山总部派出江陵机器厂的一个职工，在重庆城里找了间僻静房子，把任白戈转移到那里去住下，并由那个职工专门对他进行“监护”。

从7月底到8月底，整个山城炮火连天，两大派深陷于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狂潮之中，没有谁再顾得上去斗“走资派”，任白戈也就乐得当了几天被“监护”的“逍遥派”。

没有抓到“走资派”时，觉得缺少了批判的“靶子”。“走资派”在手里交不出去，又成了烫手的炭圆。反到底派从抢到任白戈并将他“隐藏”起来，到急于想把他交出去而不得，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终于，不知是哪个高人想出了办法，反到底派组织了一次批斗会，请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市革筹）派人参加。市革筹派来的是重庆军分区的干部。任白戈被押到会上批斗一番之后，反到底派就一本正经地当众把他交给了军分区来的代表。

从此，任白戈就由官方“监护”起来，1968年6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中将任白戈与其他几位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一起并称“中国赫鲁晓夫……在西南及四川地区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之流”，进一步明确了对任的政治定性。

这时，这位“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已经被送到北京关押，交到了冷酷无情的中央专案组手里……直到以后得到“解放”。

（责任编辑 吴思）



# 进步青年在国统区的组织形式

穆广仁

60年前，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指导下，建立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秘密组织：“民协”、“民青”、“新青”。此前，则是没有组织形式的组织“据点”。这些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及其衍生的进步青年团体，成为国统区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的重要力量，是推翻国民党专制政权的第二条战线的主力，并发展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地下党的主要构成部分。

## “据点”

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发动多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处处笼罩着白色恐怖。在重庆红岩村，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不得不令各地的党组织进行疏散，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暂不恢复，也暂不吸收新党员。

抗战初期爱国青年们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被迫偃旗息鼓了，许多进步学生被公开或秘密逮捕、杀害，他们建立的读书会之类的社团被封杀。但是，他们仍然怀念前些年上街游行、喊口号那种活动方式，希望建立色彩鲜明的青年组织。在绵阳的国立六中一些流亡学生到了重庆，就想组织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全国性的读书会；复旦大学一些同学计议建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南开中学有个“号角社”，引起反动当局注意；重庆联中一些毕业学生成立的“中国青年民主社”遭到镇压。南方局青年组建议他们暂停组织活动，劝说这些爱国青年转变“救亡作风”，埋下头来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勤学、勤业、勤交友。青年组负责人刘光多次秘密约见从国立六中流亡到重庆的刘晴波、许鲁野、王振华等人，向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

刘晴波等人终于想通了，可是刘光内心仍不平静。他完全理解这些青年人的迫切愿望，需要尽心保护他们，可是没有任何组织，只是个别活动，行吗？他向周恩来汇报遇到的难题。

“这个情况我知道”，周恩来说，现在的大环境不许可，“我也考虑了这个问题。可以不要组织名称，不制定章程，不规定纲领，在志同道合的友谊的基础上形成不拘形式的小组。只要小组的人数不多，就无妨。这种没有固定组织形式的组织叫什么？干脆叫‘据点’吧。我们在沦陷区敌后开辟了一些据点，在这里（国统区）也应该安插一些‘据点’。”

刘光把周恩来的决定告诉了青年组的朱语今，他俩具体讨论了建立据点的方案。

## 重庆地区的“据点”

中央大学从南京迁至重庆的沙坪坝。皖南事变后，这里的共产党组织被撤离、党员被疏散，校内反动力量占统治地位。

1942年春，刘光找中大政治系学生刘明章谈话。刘光谈起建立“据点”的想法，刘明章立即写信通知疏散到某中学教书的黎连汉（黎力）

“回学校来吧，有事情可做”。黎连汉办理了复学手续，第二天就和刘明章到红岩村，刘光和朱语今接待了他们。

黎连汉回忆他第二次去红岩村的情况时说，接待他和另外两位中大同学的是一位朴实可亲的长者，就是声名显赫的老革命家董必武。董老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特务统治，大铁钳一般镇压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过去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曾经采取过几种形式，有了组织就不能不是比较严密的，而越是严密就越要秘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允许这种组织合法存在。你越严密、越秘密，反动派也越是要千方百计钻进来破坏。一旦被发现，损失就很惨重。我们的革命组织和他们的特务组织都是铁的严密组织，这就是铁对铁，硬碰硬。他们当权，强悍，肆无忌惮；我们无权，弱小，必然受伤。现在我们可以采取没有固定组织形式的个人友谊联系方式，好像棉花一样，反动派摸不到我们成形的组织，要打我们，就好像铁打棉花，打也打不伤。而我们却可以像孙悟空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一样，能够自由活动。每个进步青年身边联系、团结三五个人，这三五个人再各自联系、团结三五个人……这样便能逐渐形成一支巨大的力量。”

董老的一席话使黎连汉茅塞顿开。回到学校后，他和刘明章开始筹划建立中大“据点”。刘光把疏散到重庆附近当教师的白显富、在中大化工系就读的吴佩纶介绍给刘明章，他们四个人就组成了中大第一个“据点”的核心组。这是南方局青年组在重庆建立的第一个“据点”。

中大“据点”成立后，又把沙磁区其他院校（如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的进步学生联系起来。

1942年，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也开始了建立据点的活动。只是由于始创人王晶尧转学到成都的燕京大学，事实上创立据点是在次年。据点还单线联系另两名成员王效仁、田歌。在据点建立前后，复旦校内就存在着若干进步学生的小圈子和社团，也有和青年组保持着个别联系的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杜子才、陈以文等。据点核心在开展活动时，常常和这些小团体“撞车”，有时还发生误会。到1944年下半年，青年组就把杜子才等人的工作关系交给了“据点”。这就形成“据点”的非

党员“领导”党员（失去关系的党员）的特殊局面。

复旦的“据点”核心和此后发展起来的“十月同盟”扩大了在北碚地区一些院校的活动，把江苏医学院、戏剧专科学校、歌剧学校、立信会计学校和一些中学的进步青年联系起来。

在青年组的帮助下，在重庆九龙坡的交通大学、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也都建立了各自的“据点”。青年组还建议国立六中的进步学生刘实到重庆电力公司工作，在青年工人中建立了“据点”。

按照各个学校、工厂不同情况，各个“据点”都有自己的特点。总的说，在地下党组织撤离、党员疏散之后，“据点”的核心实际上担负着地下党的作用。他们从红岩村取回《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文章和青年组编发的学习材料，《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大众哲学》之类的小册子等，回来后在成员中学习、讨论，在相互交往中逐步扩大志同道合的朋友。“据点”这个名称并不下达，只有极少数与青年组联系的核心成员知道。核心成员联系着基本成员，基本成员又联系若干一般成员。他们还鼓励成员们参加各种公开合法的团体，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并对所在单位做些调查研究。

据1945年4月青年组统计，在大后方广大地区建立的“据点”48个，同“据点”保持联系的有近千人。他们后来大都参加了“民协”、“民青”、“新青”等进步青年秘密组织。

## “民协”（成都：民主青年协会）

成都南郊的华西坝，以早年在此建立了华西协和大学而得名。抗战期间，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等院校，先后迁移到这里。原址于成都城内、移校峨眉的四川大学，也回迁成都，在望江楼附近原农学院院址扩建了校舍。

这些院校大多数是教会办的，外籍教授较多，有一定的自主权，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有所抵制。四川地方势力与国民党政府也存在矛盾。因而，成都进步民主力量的活动余地要比重庆大些。



复旦大学的王晶尧转学到燕京大学后，就和金陵大学的赵一鹤（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革命先烈赵世炎之侄）取得联系。在赵的周围有一帮进步朋友，如燕京大学的刘克林、崔崑，华西大学的刘盛舆等。1942年，赵一鹤把这几个人找到一块儿，成立了以成都的简称为名的秘密组织“蓉社”。1943年，“蓉社”改名“马克思主义小组”。赵一鹤因患肺病休养，改由王晶尧负责，小组吸收了一些新成员，其中多是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小组的活动方式基本上和“据点”一样，没有纲领和章程，是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友情的结合。这年冬天，成都的民主宪政运动正在兴起，为适应新的形势，他们又把小组名字改为“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推进成都的民主运动。

与“蓉社”同时，在成都校园内还有另一个进步青年社团“现实文学研究社”。当时在金陵大学求学的谢韬回忆说：“1942年我和方然等进步同学一起，组成了一个‘现实文学研究社’。除了金陵大学进步同学外，参加的还有华西大学的学生，三联书店的经理。后期，邹狄帆夫妇到了成都，在美国新闻处工作，也参加了。我们先办一个手抄传阅的刊物，后来又办了一个名叫《呼吸》的刊物。名为‘文学研究’，实际上无所不谈。我们举行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晚会，把志同道合的朋友联系起来，团结起来。”1944年，“现实文学研究社”改名为“现实学社”，明确以探讨时事政治、研习进步理论、参加现实斗争为宗旨。

成都的民主运动逐步高涨的形势下，进步青年越来越不能满足于分散的个别活动方式。贾唯英就经常为“隐蔽何时了”所折磨。她是个四川籍的共产党员，抗战开始时她与同伴们从北平到延安，后来因治病回到成都。她曾渴求回延安，邓颖超、孔原同志劝她留在大后方读书。于是她考进华西大学，隐蔽下来。在这里她遇见了在延安时的两个战友程天赋、胡文新。在胡文新的劝慰下，她潜心学

习，并被选为女生院学生自治会的主席。

谢韬认为“是时候了”，进步力量应当联合起来了。谢韬回忆说：1944年5月间，“现实学社”推举我出面，串联了九个大学的进步社团的骨干分子25人，在望江楼公园的一个茶馆里开个联谊会。大家认为，形势发展很快，当务之急是如何发动和组织群众，迎接更大规模的斗争。贾唯英建议各校进步同学成立一个共同组织，会上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成都举行“国事座谈会”之后，爱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1944年秋天，“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约定在成都北门内的文殊院集会，到会的有十几个人，大家都同意成立“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并公推燕大、川大与会同学为召集人，推举与重庆红岩村保持联系的王晶尧为协会的临时总负责人。会上讨论了几条：“民协”的任务是团结青年学生，开展民主运动，反对当局的法西斯统治，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在各校建立组织，发展会员，开展活动，各校设立联络员；“民协”是秘密组织，会员必须保守秘密，防止特务破坏；吸收新会员应有两个会员介绍，干事会批准。这几条就成为“民协”的不成文的章程。

“民协”不仅在各大学建立了“民协”小组，而且扩展到新闻界、妇女界、教师界。到1945年秋，会员数量达128人。张定、卫永清、李慎之、彭迪、于明、赫鲁、石泉等人都是第一批“民协”成员。“民协”成立之初，就积极参与和领导了成都



1945年5月，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游行示威，要求实行民主，废除独裁

1944年11月的反抗法西斯统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史称“双十”运动)。

“民协”的成立和她的发展,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共产党员处于隐蔽分散状态下,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一些失去关系的党员实际上是和非党的进步青年处在同一位置上)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主动积聚起来建立秘密组织,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当时并没有党组织的直接指示和介入。当时国民党政府总是把爱国进步青年反抗独裁专制的行动,归之于“异党暗中策动”。而解放后的某些党史文献、资料,也往往把一切爱国进步青年的行动,说成完全是党直接组织、直接指挥的。但这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 “民青”(昆明:青年民主同盟)

在昆明,由于云南地方实力派主要人物龙云与共产党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共产党各级组织在皖南事变后短暂隐蔽就恢复了一定的活力。西南联大还有一批进步、开明的学者、教授。

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感到,只有一些小型的分散的学生社团,已经不能适应民主运动兴起的势头了。这年11月间,成都成立了“民协”的消息传到了昆明,进步学生们受到鼓舞,立即商议、串联,打算在昆明建立一个类似的青年组织。

原任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的袁永熙,皖南事变后曾被疏散出去,在四川重庆白沙隐蔽了两年。1944年秋,红岩村要他回西南联大复学。临行前南方局交代他到昆明后和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保持联系。他回到联大,很快就结识了洪德铭(洪季凯)和一批进步青年。洪德铭曾参加湖南人民抗日游击支队,后改编为新四军部队,对日作战。皖南事变中受伤被俘,在被押解途中逃脱。为了找党,他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他在联大也结识了一批进步学生,包括也在寻找党的关系的谭正儒(严振)、萧松、王念平等人。

萧松正在向袁永熙申请入党,袁向云南省工委郑伯克谈了洪德铭、萧松等人的情况。郑伯克考虑,只有公开的学生自治会是不够的,进步青年需要有个秘密的坚强的核心组织。他告诉袁永熙,对洪德铭等人应当鼓励和支持。

袁永熙通过萧松和洪德铭联系,说明当前青

年组织的政治目标、基本任务、组织名称都应适应进步青年的根本要求,才有吸引力和生命力。他们认为可以参照成都“民协”的做法,定名为“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

从这时起到1945年初,他们就为筹建“民青”而紧张地工作。其时,联大学生正忙于期考,学生自治会也正在改选。他们就把筹建“民青”和改选结合起来进行。

洪德铭估计吴晗、闻一多教授可能与党有联系,就将成立“民青”组织的计划向两位老师作了详细介绍,得到他们的支持。不久,吴晗告诉洪德铭,他已将筹建“民青”的情况告诉了中共朋友(华岗),取得了同意。闻一多也将“民青”一事向民盟云南支部作了汇报,民盟的反映是赞成的。筹建期间,洪德铭联络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东方语专的30多人,大家委托洪德铭起草“民主青年同盟章程草案”。1944年底的一个夜晚,举行了第一批参加者的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接受中国最先进的政党(中共)的领导,和民盟及一切民主力量合作”,“以在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为奋斗宗旨”,“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1945年2月4日,一群作游客打扮的青年,在滇池游船上召开了“民青”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和工作计划。这时,盟员已有40多人。

民盟云南支部决定闻一多、吴晗作为民盟联系“民青”的代表。吴晗对洪德铭说:“我们真是结成忘年之交了。”洪德铭说:“我们永远是两位老师的学生,吾既要爱真理,又要爱吾师!”

在袁永熙、洪德铭筹建“民青”之际,马识途、齐亮也在酝酿组建云南进步青年核心组织,他们也起名为“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两个“民青”同时孕育,就像一对“双胞胎”。郑伯克得知后,考虑到洪德铭他们筹建的“民青”一事已报告南方局,还没得到答复,对于马识途他们筹建的组织,只好暂不作定论。郑对马说,先在联大与其他各校的读书小组里,吸收拟建的核心组织的预备成员,何时成立核心组织,以后再议。

1945年春,“民青”召开“民青”代表会议,参加的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昆华女中等校14个分支的代表。会议通过了“民青”章程,确定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奋斗目标。选举出以陈定侯为首,洪德铭、严振、萧松、何东昌为执

行委员的领导机构。同年6月，“民青”改选，洪德铭出任主任委员，王汉斌、严振、徐克权为执行委员。中共云南工委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和历史关系，把洪德铭等人组织的“民青”作为“民青”第一支部，把马识途等人组织的“民青”作为“民青”第二支部。两个支部平行，互不发生横的关系。袁永熙、马识途代表党组织分别领导两个支部。不久，两个支部通过协商，协调彼此的工作。

1944年冬，在周新民、尚钺、楚图南等的支持下，云南大学也成立了一个“民主青年同盟”。而联大两个“民青”支部也在云大发展盟员。经过协商，云大的“民青”和第一、第二支部在云大发展的盟员，合编为“民青”第三支部。

由于“民青”的迅速发展，以学生为主的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西南联大被誉为昆明的“民主堡垒”。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昆明掀起声势浩大的制止内战、反对独裁统治、要求民主的“一二·一运动”。北大、清华复员之后，又在北平发动了抗议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

### “新青”（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重庆是战时国民党政府的心脏。迁渝各大学彼此之间距离较远，在特务的严密统治下，很难建立全市性的进步青年的统一组织。但在南方局青年组指导下形成的“据点”的周围，积聚了相当数量的进步青年。在爱国民主运动逐渐兴起的形势下，在“据点”的基础上建立进步青年的秘密核心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就应运而生。

1944年11月，日军长驱直入至贵州独山，重庆人心惶惶。蒋介石号召青年从军，爱国学生纷纷报名，欲上前线抵抗日寇。中央大学进步学生得知



昆明各校师生和各界人士为“一二·一”死难烈士出殡

此事由军统特务头子康泽负责，提高了警惕。罗炳权、陈宏万（两人在广东梅县中学入党，因组织遭到破坏而失去组织关系）、曾卓（曾庆冠，地下党员）、柯在铄、潘志新等，秘密商讨，决定成立“中央大学学生抗日救亡会”（简称“救亡会”），引导同学走正确的抗日救亡道路，避免投入可疑的青年军。他们四出串联，联络了几十个人，于1944年12月2日召开预备会。他们认为“救亡会”的现实任务是向群众宣传全民抗战，到战地做慰问将士、救护工作等。会上决定12月3日在101大教室召开“救亡会”成立大会，并在校园里公开宣布。

中大“据点”负责人吴佩纶得知进步同学要召开“救亡会”的事，心里十分着急。“据点”核心成员都认为召开“救亡会”这件事是不妥当的，不适合中大当前情况，过于暴露自己，容易受到打击。刘晴波连夜赶往红岩村找青年组的朱语今，朱说，要劝他们不要开大会。可是，等他午后回到沙坪坝时，几百名同学已经去101教室开会去了。

大会尚未开始，教室外面已经被青年军和三青团分子包围。大会开始，主席陈宏万刚刚说了几句开场白，就被会场内的几个特务学生的吼声打断。接着，宣读由曾卓起草的《救亡会成立宣言》时，外面的青年军新兵和预伏的暴徒们冲进会场，顿时叫骂声、桌椅碰撞声，一片混乱。最后任健、陈宏万和潘志新都被他们抓住，捆绑起来关进他们



私设的牢房。之后，这三位同学被学校开除，柯在铄在中大也呆不下去了，转到西南联大继续求学。

“救亡会”的失败，进步同学遭到迫害，使中大的“据点”成员深刻反思。他们终于认识到，进步力量（包括一些有单线的党员和失去关系的党员）没有统一的组织，行动步调不一致，松散的联系形式和小手工业的工作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也脱离了大多数进步同学对于建立自己的组织的迫切要求。

青年组负责人刘光提出，先把“据点”核心成员组成定期开会的核心组，逐步改变按自然形成的友谊关系的单线联系的工作方式，按照院系建立小组，由核心成员分头联系。这样，就把原来松散不定型的联系转化成严密的有形的秘密组织。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的雏形。

1944年12月，朱语今到成都了解青年运动的情况，回来向主持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同志汇报，说成都已经建立了“民协”，重庆各大学建立类似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王若飞同意，在重庆有较多“据点”成员的大学和青年工人、职员中，着手建立这样的秘密组织。

朱语今立即把这个意图告诉了中大“据点”核心成员，要他们起草这个组织的章程。黄可、刘晴波起草了“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或“新青”）的章程。章程规定，接受中共的领导，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奋斗。章程规定参加组织的条件和严格的手续，社员的权利和义务，秘密工作的原则等。

1945年春，经青年组同意，在中大“据点”基础上建立了“新青社”，并在柏溪分校发展组织。同年8月，新青社得到南方局的批准，其核心组成员为：黄可、刘晴波（刘宪贞）、黄志达、罗炳权、胡甫臣、童式一、穆广仁、任彝玺（任健树）、翁礼巽。新青社成立后，迅速建立了一批进步的壁报社和各种名目的社团，中大终于突破了长期沉闷的局面，呈现出活跃的民主气氛。由于中大民主力量的发展和与其他各校的串联，促成了1946年1月25日震动重庆的促进政协成功的“一·二五大游行”。万余名学生和中大校长吴有训、马寅初等百余名教授走上重庆街头。

在重庆民主运动迅速兴起的形势下，复旦大

学“据点”核心的活动不断扩大，同时许多进步的小团体、社团也在发展、活动。

1944年10月，杜栖梧叫金铿然在北碚的悦来店租了一个房间，作为复旦“据点”核心联络校内各方面进步学生秘密集会的地点。大家议定，成立一个以复旦为基地在北碚地区开展青年民主运动的秘密组织，定名为“十月同盟”（对外说是“时事讨论会”）。他们制订了章程，规定了宗旨、机构、活动内容和分工等。这样，就把全校的青年运动初步统一起来，并担负起推动北碚地区各校民主运动的任务。这个组织把校内各个小圈子、小团体联合了起来，并加强了与“文学窗社”、“德社”、“菊社”的紧密联系。事后，“据点”核心给青年组打了个报告，说明“十月同盟”成立的必要。青年组对此表示认可。

“十月同盟”成立后，他们计议建立代表全校各院系的群众性进步学生团体。经过慎密考虑，由陈以文、金本富出面，张历冰、王效仁协助，把各系学生会干事会的进步同学串联起来，成立了半公开的各系民主学生联合会（简称“系联”）。“系联”的成员不断增加，他们又在“系联”的基础上改以各学院为单位推派代表，组成“院联”（名称仍叫“系联”），并夺取了全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十月同盟”又委托复旦最有影响的壁报社团“文学窗社”的带头人束衣人出面，联络各壁报社，成立了“复旦壁报社团联合会”（简称“壁联”）。

为适应北碚地区民主运动发展的需要，复旦以“据点”核心和“十月同盟”为基础，吸收“系联”、“壁联”和其他进步社团的骨干，于纪念“一二·九运动”九周年之际，组成“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成为北碚地区民主运动骨干分子的统一秘密组织。

## 结束语

上世纪40年代，以这些青年组织成员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为争取抗战胜利、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其中有些被国民党专制政权杀害，幸存者仍然无悔地坚持热爱祖国、争取民主的初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奋斗不已。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文革初期的空军

## ——访空军原副司令员何廷一将军

钟兆云

### 没支持吴法宪招来报复

1966年6月6日，文革爆发不久，空军召开党的三届十一次全会。会议未开之前，两位副司令员有所活动，其中一位给林彪写信告吴法宪，另一位则到叶剑英那里状告吴法宪。会前，叶剑英给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打来电话，要他过去谈情况。在这次全会上，吴法宪的开场白还没讲完，就被某副司令员打断，话筒也被人抢去。七个常委齐上阵，搞得司令员吴法宪、政委余立金措手不及。何廷一对此颇感吃惊，后来才意识到，他们是对吴、余当空军的军政一把手不满意，看不起他俩，要知道，他们中想当空军司令的大有人在。于是，空军党的三届十一次全会开得气氛分外紧张。

会后，吴法宪急得上蹿下跳，到处活动，企图拉拢一些人给他“保驾”。一天，他把何廷一找到家里，要何支持他。何廷一是参与空军初创的元老，比吴法宪到空军的时间还早。何廷一不想卷进这些是非，建议吴法宪找反对他的七个常委面谈。几天后，吴法宪又把何廷一找去，在座的还有空军政治部的王平水、王静敏两位副主任、军校部部长陈熙、直属政治部主任徐又彬。吴法宪对众人说：他们拉了一帮人，我也要拉一帮人。我不怕他们，我要和他们斗……在座的谁也没吭声。

吴法宪为了拉帮结派，可谓绞尽脑汁。一天，何廷一去理发，恰巧吴法宪也在理发室，他见了何廷一，十分热情地说：你的汽车太旧了，我准备给你要一辆红旗车。红旗车是大军区正、副职坐的，何廷一想自己是副参谋长，还没有资格坐这种车，吴法宪分明是在对自己进行物质引诱。吴

法宪还说已给林彪汇报，准备直接提你当副司令员。面对吴法宪的公开拉拢，何廷一没有表示积极的响应。

一天，空军一位高级干部来何廷一家串门，试图探听他对吴法宪、余立金的态度，何廷一以不了解情况把他支走了。何廷一认为这次全会开得极不正常，因此小会几乎都没去，大会也没全参加，通知非去不可时才勉强去一二次。这次全会分成两派，开始时由于对立派相当活跃，吴法宪、余立金有点招架不住。后来由于林彪出面干预，贺龙、叶剑英两位元帅在三座门召集空军党委常委开会，批评组织派性搞地下活动不对。叶剑英还在空军十一次全会的大会上要参加会议的同志记住三个“六”，即1966年6月6日，其意是说此会开得不好，要大家接受教训。会后，吴法宪显得趾高气扬，另一派则有点灰溜溜的。

由于何廷一不支持吴法宪，吴法宪拉拢了几次也不见效，于是心怀不满，便要寻机报复了。这年9月某日，空军防化研究室为了检查作战部防化处长赵修直有没有反毛泽东思想，竟然拿走了西线核试验文件，试图从文件里寻找有没有反毛泽东的东西。作战部副部长曾幼诚迅速向何廷一作了汇报，何廷一大为震怒，当即命人取回。正在开会的吴法宪听了空军副参谋长梁璞的报告，认为报复机会到了，遂利用此事大作文章，中途离会，把何廷一找到办公室，当着梁璞等人的面好生训斥了一顿。梁璞还火上浇油地说：西线核试验的文件是绝密的，记了全部数据，如果被敌人搞走了，要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何廷一说，防化研究室取走文件的事，曾幼诚报告了我，我批评了他，并要他立即乘车把资料追回来，此事已经处理完了。吴法宪不甘罢休，责问何廷一为什么

不向他报告。何廷一回答说：你正在开会，何况资料又很快原封不动地取回来了。

针对此事，梁璞还制造了一个假情报，说防化研究室取走资料后，西郊机场附近停了一辆外国使馆的汽车，意思是来取资料的。好在资料已及时追回，使得他和吴法宪合计谋害何廷一的阴谋没有得逞。

## 空军乱了

1966年国庆刚过，数以万计的空军院校学员，手持林彪签发的允许进京串连的电报令，大摇大摆地进京来了。解放军三总部和军兵种机关成了他们冲击的对象，空军首当其冲。

面对这种情况，空军分管空防作战和院校工作的副司令员成钧忧心忡忡。在不久前的“六六六”会议（即空军党的三届十一次全会）后，他就受到林彪的点名批评，说他参加七个常委联名向中央军委写信是“有野心，搞罢官夺权，犯了反党性质的错误”。针对林彪的批评，为取得吴法宪的谅解，搞好空军班子的团结，他只好委曲求全，再三到来京的空军院校学员中承担责任，耐心做工作，劝说他们回去复课闹革命。可空军技术学院“红色恐怖”的头头萧某某不仅不听，还率人把接待单位的干部打个遍体鳞伤，强迫他们跪了一地。

空军院校来京的这些造反者，天不怕，地不怕，经四处串连，多方查抄“黑材料”，竟把大火烧到了吴法宪的头上。造反小将们在机关门前静坐，要求吴司令出来接见并回答问题。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吴法宪哪敢出面，惹不起便躲，可他越是东躲西藏，越是激怒了造反小将们。他们高呼“吴法宪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吴法宪必须当众请罪，承认错误！”吴法宪又急又怕，指示党办的王飞、周宇驰、何汝珍、于新野等一帮干将不断搜集材料整理成“情况反映”上报，还亲自频频向毛家湾告急。

在林彪撑腰和密授机宜下，吴法宪的腰杆又硬了起来，下令把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的教员××抓起来，罪名是说他指挥军事院校学员冲击国防部。接着，几个院校造反组织的头头也被带到空军第二高专，准备审查处理。但林办突然来

电话，命令立即释放他们，还让食堂立即准备一桌饭菜，为这几个被抓的人压惊。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吴法宪可真蒙了。

一夜间，“吴法宪继续执行资反路线压制革命，抓革命群众”的说法在北京城传了个遍。而后《红旗》杂志1966年第15期发表社论，说：“那种迫害群众的司令部，难道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吗？难道不可以炮轰吗？……”造反派对号入座，对吴法宪的攻击更为猛烈，说“吴法宪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火烧、炮轰吴法宪”，有人还闯到空军指挥所去揪他。

林彪当然不会丢弃忠于自己的吴法宪，他要运用一个稳当的办法来解救陷入困境之中的吴法宪。中央文革小组把持下的《红旗》杂志，他可以打招呼，让他们变变风向，那些造反小将他更有办法控制。这些小将冲击三总部及军兵种机关之初，一会儿正确了，一会儿错误了，这一切正是由他的意愿所左右的。林彪喜欢空军这支解放军现代化的部队，但对空军眼下的现状不甚满意，他关注着空军的一切，他要在乱中取胜。于是，空军还在乱着。何廷一感到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为此忧心不已。

1967年1月5日以后，空军司令部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先是管理局的职工深更半夜要求成立造反组织。何廷一和徐又彬向他们解释军委命令军队不许成立组织，但他们不听。第二天，司令部的二级部开始成立名目繁多的所谓“革命组织”。接着，作战部、领航部、办公室先后有人冲击司令部党委会。主持司令部工作的何廷一感觉自己已经被架空了。

吴法宪为了从造反派的“火烧”、“炮轰”中尽快脱身，一面向毛家湾求援，一面转移目标，唆使院校造反派在大院内揪斗所谓“罗瑞卿分子”、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廷发。张廷发受尽折磨，肋骨被打断三根。在吴法宪的授意并经请示叶群后，党办司办的王飞、周宇驰、何汝珍等一帮干将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先是在大院里贴出一大批攻击空军前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遗孀翟云英的大字报，紧接着又抄了她的家。因为翟云英与罗荣桓元帅的遗孀林月琴等有些正常的来往，加上她又拒绝为叶群炮制的所谓刘亚楼生前揭发罗瑞卿“四条”作伪证，便引起叶群的



猜忌，把她们打成了“寡妇集团”。

吴法宪和他的喽罗们的反常表现，激起空司一些干部群众的不满。群众自发揪斗了空司办公室主任王飞等人，追问他们深夜组织人写大字报搞阴谋活动、转移群众视线的问题。眼看机关内部乱起来了，党办司办的秘书们彻夜行动，向林彪叶群写报告、送材料，吴法宪从院外打电话，要王飞等几个人“吃饱一点……坚决顶住”。

有了吴法宪的密旨，司令部办公室有人公然闹到部党委会来，要求马

上召开群众大会，并问何廷一支持不支持？何廷一说：如果是群众的革命行动，我就支持。对方又说：开群众大会，部党委要派人参加。但部党委没有人愿意参加，最后何廷一提议部党委委员都去参加。

1月11日晚，何廷一走进第二食堂。刚坐下，便有人给会议主持人递条子：“这个会与何廷一有关，让他退出会场！”台下有人拉长声音起哄表示同意。何廷一知道自己被人耍了，立时起身回家。后来听说这个会开了个通宵，群众把姚克佑、梁璞、石国英等轮流批斗了一夜，还给石国英穿了纸马褂。看来这个会是有准备的，可是由谁发起的呢，怎么把梁璞这些得宠人物拿去批斗呢？何廷一怎么也想不通。造反派很快放出来，称这个会是“111事件”（因为是1月11日晚上开的），还造谣说何廷一是这个会的黑后台。这下，何廷一知道这是个黑圈套了。

12日傍晚，何廷一得到报告，说二食堂贴了张大字报，说部党委规定了三条：不准与院校学生串联，不准机关干部参加院校学生的集会，不准……何廷一判定要出事，立即赶往吴法宪家里报告。吴法宪躲进东交民巷招待所，兼他办公室主任的老婆陈绥圻出面招呼，说了一通让人摸不



文革前部分空军领导。前排左起：成钧、刘亚楼、吴法宪、刘震

着头脑的话：文化大革命就像游泳一样，游得过去就过去了，游不过去就得淹死在江中。

何廷一从吴法宪家中出来，就看到空军院校师生成群结队，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向空司办公大楼冲来。何廷一见情况不妙，急忙打电话找吴法宪报告情况，吴法宪躲避不接。而梁璞他们却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出何廷一的大字报专栏，暗示院校造反派不要冲击吴法宪，而去揪何廷一。

无时不在关注空军动静的林彪，看到火烧得差不多了，乃和叶群商量，决定去找江青“救火”。1月13日，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林总已向江青讲好了，今晚中央文革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由江青出面讲话保你，但要提出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你把他们三人的主要材料写上几条交给江青。

1月13日上午，何廷一上班发现出了他的大字报专栏。司令部那伙人闹了一夜，仅拼凑了6张无中生有的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最为恶毒，煽动性也最大，说何廷一是反党分子，污蔑江青一家，攻击江青“太娇气”，她的女儿李讷生病要派飞机送医生，何廷一和叶子龙坚决不同意……

下午上班，何廷一发现红机子被撤掉了。红机子是中南海三十九局的保密电话，撤红机子是

要对他动手的征兆。

## 江青林彪联手，拉开空军大批斗的序幕

1月13日晚，人民大会堂南大厅人山人海，军委文革领导小组接见空军机关、院校的造反派。江青大放厥词说：吴法宪是个好同志！空军真正的坏蛋是刘震、成钧、何廷一。刘震、成钧、何廷一就是关锋同志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震我不认识，他是彭德怀的死党。成钧是大土匪、大军阀贺龙的死党。何廷一好像见过面，他是罗瑞卿的死党、杨尚昆的人。他们有一个吃喝小集团，整天吃吃喝喝不干革命，专干反革命的勾当，他的材料刚才我又收到一份……会场上立刻有人领头喊起了打倒刘、成、何的口号。

江青批何廷一的这段话拿腔作调，一个“好像见过面”表现了她极大的不屑。当年何廷一在延安枣园看望叶子龙时，碰上江青，一起照过相。解放后还送她到合肥，并去上海等地接她。汪东兴曾对何廷一说：主席知道你来接江青，就放心



何廷一

了。在安徽合肥，江青曾“友好”地拉何廷一吃饭，护士告诉他江青怕声音，吃饭时碗筷要轻放。这使何廷一的自尊受损，再不同江青一起用餐了。又因江青不够礼貌，上了毛泽东的专机后就抢先躺在床上，弄得毛泽东只好坐在椅子上批阅文件。何廷一曾就此向她提了意见，没想到从此埋下了祸根。

刘震、成钧又是什么人呢？

刘震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1931年，这位16岁的湖北孝感青年便参加了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抗战时期便和吴法宪一起工作，以后两人同在四野二纵，刘任司令员，吴任政委。1950年刘震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后受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首任空军司令员。1955年，年仅40岁的刘震被授予上将军衔，后当选为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文革前，由于刘震说过彭德怀、黄克诚的好话，并向吴法宪提过批评意见，遂被林彪、吴法宪一伙视为“彭黄分子”、“有野心”，“在空军搞罢官夺权”，是必须借助江青打倒的危险人物。

成钧是空军另一位副司令员，和刘震一样，也是位出生入死的老将。到空军后，分管国土防空等重要工作，协助刘亚楼精心组织指挥，使得年轻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多次击落美制U-2高空侦察机。此外，他还长年奔波在大西北的试验基地和技术院校之间，为“两弹”的上天和空军部队装备技术的改进尽心尽力。这位为空军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将，就因为他是贺龙的老部下，林彪就想着要把他搞掉。

“9·13事件”后，江青对批刘震、成钧之举，作了解释，说她当时并不了解空军的情况，也不认识刘震、成钧，乃是奉林彪之命去讲话的。1978年10月，吴法宪接受审查时，坚持说：打倒刘震、成钧，是林彪提出来的，打倒何廷一是江青提出来的。

在人民大会堂南大厅的这次接见中，江青的点名批评，揭开了空军大批斗的序幕。此会一散，不明真相的院校造反派，立即步行到空军大院，对刘、成、何这些“反革命分子”施行果断的“红色恐怖”。

1967年1月13日晚11点多钟，空军技术学院的造反派组织“红色恐怖”前来冲击了，他

们大声敲门，狂呼乱叫。何廷一刚打开房门，造反派不由分说涌进屋里，揪住他的胳膊，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出院外，用大衣蒙住他的头，架着他脚不着地地往工程部办公楼走，上楼时，他们不断地踢何廷一的屁股。上到五楼，他们把何廷一推进一间屋子里，几个造反派把何廷一夹在中间。一个头目气势汹汹地逼问：1958年杨尚昆招待机组时说了些什么？

1958年朱德乘坐空军三十四师的专机，到新疆等地视察回来后委托杨尚昆宴请机组，以表谢意，何廷一应邀作陪。何廷一实在搞不懂这些造反派怎么会把这事与“文革”联系起来，大做文章。他的回答当然不能让造反派满意，斥责他还在为杨尚昆说好话，并施以拳脚。翌日清晨，何廷一刚从床上坐起，几个造反派鼓着两眼要他写什么夺权罢官的材料。何廷一气愤地说：真是莫明其妙！我夺了谁的权？罢了谁的官？他的回答又招致了一场毒打。

何廷一惨遭非人的折磨迫害，他的妻子儿女、亲戚和一些同志也无辜受到牵连和迫害。

## 幕后黑手，空军批斗“流成河”

1月14日，即江青发表讲话的第二天，空司机关的一些秘书拉上一些与他们观点相近的人搞起串连，明目张胆地亮出了“革命造反派”的大旗，队长周宇驰。首长们的耳目和心腹竟也出来拉队伍“造反”，这可是非同寻常之事。一时间，“空司造反派”名声大噪。

空司造反派借助江青讲话的声势，除批斗刘震、成钧、何廷一之外，还肆无忌惮地抓了军务部长邢永宁、领航部长尉剑畴、司政主任王少江，说他们跟着何廷一“反党”。他们还贴过他们大字报、查斗过王飞等人的干部群众进行泄愤报复。司令部办公室有三位干部在群众自发开会斗王飞时，曾提供过揭发材料，遂被点名作为“叛徒”给抓了起来。

1月15日，造反派在空军大院广场，召开几千人的批斗大会。技术学院的造反组织“红色恐怖”把何廷一拖到露天舞台上，连按带踢地强迫何廷一跪下，还在他背上狠狠地踏上一只脚。何廷一有生以来还没有受过如此污辱，直气得两眼

火星四溅。他正愤怒地挣扎着，一个造反派对着他的脸大刷起墨汁来，数九寒天，北风凛冽，何廷一脸如刀割，全身打颤。然后，“红色恐怖”把何廷一同刘震、成钧装上一辆吉普车，拉到院外转了一大圈游斗。

这以后，何廷一接二连三地被机关造反派揪斗。批斗时，造反派抢走了何廷一的小红书，说他没有资格举毛主席语录。他们喝令何廷一交代“罪行”，何廷一不低头也不认罪。过了几天，又把他从工程部办公楼揪到育鸿学校院子里批斗。他们用八仙桌做台子，把何廷一推到桌上，连打带踢地把他按倒跪下，从他的领口往里灌墨汁，冷得何廷一心如针扎。

自1月13日被揪斗两个星期后，何廷一被恩准回家，但是“白天批斗，深夜回家”。何廷一回家不过两天，防化研究室的造反派又打上门来，把他揪到西郊机场关了几天后，联合体工队狠斗起他来。他们把何廷一打翻在桌子上，给他戴纸高帽，挂“三反分子”的牌子，牌子是用铁丝拴的，挂在何廷一的脖子上，拉来拉去勒得他的脖子起了好几条红道。

何廷一像只皮球被造反派踢来踢去，防化研究室的造反派很快就把他“转让”给南苑一高专的造反派了。这回被揪斗时，何廷一是和成钧同乘一辆大卡车去的。去南苑有段坎坷不平的路，成钧被颠得在车上来回滚。何廷一想去拉住他，却遭造反派一阵喝斥，还要动手打他。他们饿着肚子上台接受批斗时，发现同台挨斗的还有刘震、张廷发等人。这里的造反派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推到台上，站成一字形，每人由两个造反派押着，其中一个造反派揪住他们的一只胳膊，把手往后拉并使劲地压他们的手掌。这是法西斯酷刑！不少同志被压得直叫唤。何廷一咬紧牙关，忍着剧痛，数九寒天，豆大的汗珠从脸颊上滚落。

密切关注空军形势发展的林彪、叶群，见时机成熟，遂开始收网。根据林彪签发的明码电报令，外地院校师生立即退出空司机关大院。尔后，原在《空军报》社工作的林彪之女从杭州回来，发布书面声明，参加《空军报》社原本只有八个半人（半个是家属）的一派“造反派”。她这一公开亮相，使得占机关人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联”被说成是“站错了队”的“右派”而自行解



散，空司造反队和报社造反队则成了空军司政机关主持“文革斗、批、改”的指挥部。在《空军报》社，5个处长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大会小会受批斗数十次，至于其他人的命运，也都有一本辛酸史。空军政治部主任黄玉崑，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叶群，说“黄玉崑也不是好人”，《空军报》社造反队立即贴大字报说他“反毛泽东思想”，黄玉崑在空军党委常委会上当场被造反队抓走，不久就被拉往空军学院批斗。

在空军学院的那场批斗阵容极为庞大，挨斗者除“刘、成、何”外，还有张廷发、黄玉崑、王平水、王静敏等人。王静敏没站多久，心脏病发作，差点儿倒在台上，可有人还说“你不要装”。批斗结束，这些人大都气息奄奄，黄玉崑不知什么时候被打掉了两颗牙。被拉回空军大院时，被打得浑身无力的张廷发，爬了几次都上不了车，何廷一顶着造反派的监视，用力把他扶上去。

看到空军这些“异己”纷纷落网，空军形势“大局已定”，林彪乃于这年2月让称作“老虎”的儿子林立果出山，从上海回来入伍，正式进入空军。

为了彻底控制空军，林彪、叶群蓄意扶持吴法宪、王飞、周宇驰等一批亲信，叶群还露骨地对吴法宪说：要把空军反对你的人搞掉，撤掉他们的职务。吴法宪对那些不合自己心意的干部没有好感，有后台撑腰，更是大施淫威，不久又把1946年驾机起义投奔延安、时任空军学院副教育长的刘善本，扣上“特务嫌疑”的高帽，隔离审查，将其迫害致死。在空军政治部，吴法宪指责保卫部“在关键时刻没有站在空军党委一边，包庇反革命”，决定“关门整风，查出坏人”。结果部处以上干部多数被打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小爬虫”，副部长赵国锐被逼上吊自尽。

在批斗中，空军技术学院“红色造反纵队”的头头萧某某看风使舵，投靠吴法宪，表示坚决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办，支持吴司令员领导我们斗倒斗臭三反分子刘、成、何！吴法宪当即封他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批准他把成钧押到西安市，在体育馆组织十万人大会进行无情批斗，尔后又指示成立专案组，大搞逼供信，说成钧“要搞兵变”，把他投入监狱。这位战功赫赫、九死一生的

老将军，在林彪自爆后重见天日时，身体已被摧垮了。

身为空司“造反队长”的周宇驰，还一身二任，兼着机关“文革办公室主任”的要职，不遗余力地执行林彪“大罢一批，大提一批”的指示，把紧跟吴法宪、王飞和自己的人迅速提升重用，让他们控制机关的各个部处，以达到净化以吴法宪其实是以林立果为中心的环境。在这期间，空司凡站错队的人都一个不落地受到清查批斗，受批斗面达百分之六十，其中有80多人被打成“反党反革命分子”。至于那些既无过也无功的人，则大批调离，或让“支左”，或下放部队，或让去“五七”干校安家落户。这也是后来周恩来批评空军“万马齐喑”，无人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个原因。

《空军史》载：“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插手空军，通过其同伙吴法宪把持空军领导机关，推行极左路线，以‘阶级斗争’之名，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之实，全空军造成的冤假错案达5300起，受吴法宪直接诬陷、迫害的有147人，其中定为‘走资派’的33人，定为‘敌我矛盾’的仅空军司令部就有64人……许多干部和群众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监管‘审查’或关过监狱，被他们认为‘有问题’而送‘五七’干校劳动的有1.3万人……”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空军受批斗的哪里仅仅是刘成何（刘震、成钧、何廷一），其人数之多，其鲜血淋漓，照群众的说法，真是：江青一句话，空军“流成河”。

十年动乱，空军深受其害，各项建设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和破坏，空军领导机关、院校、科研部门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林彪自我爆炸后，惨遭批斗的刘震、成钧先后解放，而何廷一却迟至1973年才结束囚徒生涯，从流放地戈壁滩辗转回到北京后，仍受到歧视，不给分配工作，也不让过组织生活。1975年9月下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发话后，总政治部起草了任命何廷一为空军副司令员的报告，经病中的毛泽东圈阅，何廷一于这年10月5日重新工作，分工主管后勤部及司令部的军务、装备、外事等工作，为空军的整顿复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85年8月，何廷一退出空军领导岗位，时年70岁。

（责任编辑 李晨）

空页

空页



# 走改良之路

高伟梧 整理

2005年9月,任仲夷同志约我们几位学者漫谈改良主义,这是有关政改部分发言的综合述。

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今世界潮流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政治与科学的人文的文化。我国市场经济已初步建立,不能再走回头路,当前主要的是过政治改革关。

这个政体转制关总得过,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与计划政治的矛盾终得解决,我们要力争过好,就是推进民主法治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不产生动乱和降低民众生活水平。和平崛起先要和平转制。

中国如何实现政体和平转制呢?我们主张走改良的道路。

我们说的革命常是指政治革命,实际是社会革命,是整个社会制度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转型。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要有个历史过程,不只破旧还要建新,破旧像毁掉旧楼房用炸药爆破可以或者必须,但是,建新社会制度必须是渐进的。

革命万岁论和告别革命

论,都不全面。革命的发生是社会诸多因素综合形成的,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不来不会因你高喊万岁就来,要来不会因你告别就不来。

造反不等于革命,革命不一定是暴动,革命也不是只靠革命的手段,革命尤其是渐进式革命,必然包括许许多多平凡的工作,包括改良和改革。世界近现代史,推翻专制独裁常是暴力革命,也是不得已的事。现在看来,靠战争摧毁旧政权,较干脆不拖泥带水,可往往会“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容易产生胜者为王唯我独尊和特权,沿着敌对的绝对对立的传统思维,暴力迷信,惯用打压消灭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这也就不利于民主法治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建设。

改良,若不是以维护旧的核心制度为宗旨,而是为了达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就是革命的一个过程,一种手段,就具有革命性质,所以说改良就是革命,是质变中的量变,是进步的积极的。改良并不一定是慢慢来,革命要造成反复,也会延误历史进程,不断朝着转制方向的改良,分段快步,不走回头路,不仅减少代价,

而且也会更快达到目标。

说革命是自下而上,从外到内;改良是从上而下,由内及外,其实改良也要内外结合上下互动。我们是党领导的国家,共产党是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核心,要有序改良和平转制,就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前取消党的领导必然出乱子,而不主动推进政体改革,让其自流,也就是放弃党在这方面的领导。党要领导好,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改革的主要对象是旧体制,握权者很容易成为原体制的维护者。改革的动力和力量主要在基层和民众,体制创新的经验主要来自直接实践者,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全党和人民群众,做到内外上下结合,而以上以内为主。党内改革的力量起主要的主导作用,此是改良的必要条件。

西方学者说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过程,一个条件,是政权从传统的政治领袖向现代政治领袖转移。形成现代政治领袖核心是决定性的。现代政治领袖必须两个决裂,要有现代的政治文化,新的理念,站在时代前沿,顺应世界潮流,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负起历

史责任；明白权为民所谋，权为民所授，不为家族和小集团谋特权私利；带头遵守宪法，按照法定的程序办事；要有民主的平等的公民意识。社会改良要靠共产党靠党的领袖，而且要有足够的威望，获得人民高度的信任。我们不赞同新权威主义，也不否定权威的作用，没有足够的威信是难于驾驭形势、开创新局面的。然而，威信来自正确，来自真正为民众办实事，真正推进社会改革，吹擂作秀适得其反。SARS问题的公开处理，新的三农政策，给农民国民待遇，台湾冷战僵局的突破，扭转了困难的形势，这有政绩。克服传统旧思维，推进民主政治，最能提高领导威信。党和领袖都不是神仙，讲过错话做过错事，也在所难免，正确认识、承认和改正就好，文过饰非，推诿辩解，会令人民失望。清理历史上讲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不但会提高全党全民的思想认识、政治理论水平，而且也会提高党的威望。

政体转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关键是实现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向现代政治权力结构的转型。减少阻力，和平过渡，可以分步到位。首先是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党中央带头学习宪法是榜样，但还得在行动上落实。实行宪政，所有党派社团组织以及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建立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民选立法机构，具有国家最高政治权力，“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我

国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党派社团通过选举进入人大，中国共产党在人大中占多数席位，持续执政，就不会产生社会的大的波动。执政为民转变为执政由民，就是尊重民众的选举结果，尊重多数选民决定的规则。

民主具体表现为自由，推进法治民主，就是依法落实公民的自由权利，宪法所规定的选举、言论、集会、出版等权利。我们是一个几千年帝皇专制的国家，形成了一套维护专制制度的传统文化、世俗风范与社会心理，中国改革不能操之过急。然而，世界潮流汹涌澎湃，社会内在矛盾已经积累，人均1000美元就进入爆发期，我们也拖不起，必须有“只争朝夕”的精神。要平稳改革须要通过试验，逐步推广，我们在基层已经有了多年民选的实践，新一代公民现代文化水平大为提高，民主意识更大不同于前辈，这个进程大可以加快。我们主张中间突破，就是选择政治文化素质较高的县、市或者单位如高校、文化社团等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再普遍推开。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根据多数人的意见集中，候选人先由公民提名，一般选举应该有差额，无记名投票。香港不仅有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可以为大陆所用，它的民主法治建设与社会管理也值得借鉴。

思想自由实际是指思想表达自由，能在社会公共领域自由表达思想。这很重要的是著作权出版权在媒体上的自由

发表文字与信息的权利。自由不同于自由化，毛泽东说“化者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有皇帝才能做到。公民的思想自由同样是在宪法和法律规范之内，哪些出界哪些未出界，就要有新闻法和出版法加以明确界定。现代传媒是信息载体，是新兴文化产业，如果把传媒只单纯作为宣传工具全加以行政控制，那会造成信息严重不对称，它造成的垄断必产生腐败。必须有新的视野和理念，重新定位，改革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现代信息社会，不放开舆论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禁堵不住突然决堤式的放开，超出社会承受力，就会泛滥成灾；逐步通过引导开放不断增加社会承受力，提高公民的辨别能力，效果会更好。

可以采取分级逐步放开的办法，先对市县依法自由采访和报道，发表有关评论，或自由讨论，然后省、全国开放。现在有的报刊时评就办得好。有党掌握媒体的引导，政府有法律监控，有民众监督，不会出大问题。所有转制顺利的国家与地区，都是舆论先放，是否逐步开放公共舆论是推进政体转制一个先决条件和考验。必须继续启蒙，加强公民教育，培育独立自主的公民意识，特别须教育官员，认识手中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造福于人民，为人民推进现代公民社会建设。

(责任编辑 李晨)

# 欧远方之死

邹人煜



欧远方是我的伴侣，他活了80岁，古时有人生五十不为夭之说，他能活到80已算是高寿了。使人扼腕的不是他的突然因心脏病发作过去，而是因为他是带着一肚不便宜走的（朝云说苏轼语），换言之，即是一脑子遗憾走的。他的一生，可以折射出一个老干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遭遇，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复杂、痛苦、回归的心路历程。

欧远方17岁投身抗日，不久即干上新闻事业这一行，从此与新闻这一行结下不解之缘，他的悲欢也就从此开始。起先是他参加编一个小报——《团结报》，后来又到了《拂晓报》，二十多岁即当了《拂晓报》社的社长。解放战争期间，他们被围困在洪泽湖里，一叶扁舟，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他和几个同志坚持办报，靠打渔维持生计。

入城后，他到《安徽日报》，先是副总编辑，后是总编辑，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事业。

新闻工作是个敏感的事业，也是个踩高跷的行当，注定他要在风险中度过一生。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他为所谓的失误受过处分，两次被迫离开他的心爱事业，到省委办公厅干副秘书长和其他工作。

他是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极专心的学习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著作，《资本论》反复读，书的眉头笔记像针尖样的密密麻麻。他是读书狂，最大兴趣就是买书画，一辈子的工资大半花在这些方面。他对领导尊重，沉默寡言，但他决不会去巴结谁，谁交任务他都认真执行。他在《安徽日报》任总编辑的时候，还常发表驯服工具论，说报纸工作人员就要倒在党的怀里。他对新闻事业热爱终生，想尽各种办法提高报纸质量，每天超负荷工作，不以为苦，天天一早起来到省委办公厅列席会议，下午要开编委会传达讨论或者开编前会，晚上

还要上夜班，所以他37岁就得了高血压，夜间要服安眠药，但他体

质好，一直能吃能喝。反右中，当一把手，自然是要执行上级指示的。那期间，他变得很烦躁，常常夜不成眠，他总想多保护几个，所以当报社不得已要开鸣放会的时候，他主持会议，常常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发言。有一次，一个叫袁平的编辑正欲讨伐上面的官僚主义，他忽然严厉地说，不要说了，注意时间。这袁平年轻气盛，况且报社又是民主空气较浓的单位，他便马上掉头向老欧开炮，老欧一言不发，听他说完，回来他对我叹气道：这个袁平，他哪里知道轻重啊！遗憾的是，袁平虽被保住了，还有一些未被保住的，其中不乏有他欣赏的记者与编辑。

1958年，因一位副总编连写八篇小品触了上怒，将他左迁至省委内刊编稿，当时没有头衔，不久当了副主编。

1961年，因陆定一两次要调他到中宣部，正左迁中的欧远方突受重视，将他调任省委宣传部部长，但未参加常委。1962年，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调走，李葆华来任第一书记，又将他左迁至省委办公厅任副秘书长。对这种频繁的调动，他一无怨言，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不久又得到李葆华的信任，让他兼《安徽日报》总编辑。他是个书呆子，不善于观察形势，文革前我已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报纸上一片肃杀景象。我感到干这一行太危险，其时他已调省委办公厅干副秘书长兼《安徽日报》总编辑，便劝他抽身，他执迷不悟，我气极了，便去找秘书长吴文瑞，让他找书记李葆华，免去他兼总编辑的职务。吴巴不得他



抽身好全力帮他搞办公厅，便向李葆华书记反映，李也同意老欧不兼，老欧也默认了我的建议，组织部便决定另一同志来《安徽日报》，要是这样下去，也许根本就没有后半生的波折，如果老欧自省委同意起，就坚决不过问报社的事，也没有什么事。可是事情并没有按照我的心愿发展，偏偏在这时那位同志来不了啦，老欧高兴地一路兼下去，我则总是预感不妙，和他吵了多少次，要他坚决不兼这一职。可他哪里听得进呢，天天白天黑夜的往《安徽日报》跑，夜间不管两点三点，只要值班副总左其煌电话一来，他便骑自行车就走，因为夜间不好叫小车，便自己拿钱买了自行车。我十分恼火，因为影响了我的睡眠。可他我行我素，累死了也毫无怨言。由于夜间常到报社，这边办公厅的事又不能少，所以他十分劳累，身体是外强中干。

不久，文革爆发，开始是冲击我，不久便冲击到他，我的担心成了现实，打倒他的就是《安徽日报》的造反派，谁叫他兼总编辑呢？什么事都弄到他头上，加上些个人恩怨，他的情况很不妙，最早被投入牛棚，在安徽挂牌游街最早的一批中，就有他一个。他一天几场接受批斗，还得干最繁重的、最脏的体力活，诸如做砖瓦工、扛铅板、推卷筒纸、打扫厕所等等，加上不给多吃，身体很快衰了下来。此时造反派已限制我与他见面，每谈一次话，我都要手捧小红书罚站半至一小时。有一天，我在厕所旁边见到他，只见他面色苍白，挑了一担水，歪歪倒倒，我吃惊地问他，他说，气喘不上来。我着急地说，你怎么不要求治病呢？他苦笑说，没用的，他们不同意。我听了掉头就走，找到造反头子，要求给欧远方治病，他们凶狠地说，死了算了，不要浪费钱财。我说，他是你们一号斗争对象，他身上牵了好几根重要的线，你们让他死了，等于灭口，上面追下来怎么办？他听后思索了片刻，便说，好，让他治吧。就这样，他才得以治疗。一检查，方知得的是最凶狠的胸膜炎，亏得赵衍大夫尽力治疗，方拣得了一条命。

文革十年，他倒霉了十年。1970年前后，许多老干部都“解放”了，重回工作岗位，而他一直被贬，因为《安徽日报》造反派把他的事向上汇报，说他交待少，态度差，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省军管会的某个大人物听取汇报后，便点了他的名，封他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从此便以某大人物点名

为由，不“解放”他，一直把他放在农村改造。俗话说，淹死会水的，缠死玩蛇的。欧远方便是这种类型，可叹他热爱新闻事业，却因这热爱而倒了大霉。他热爱人才，热爱部下，却不被理解反而被斗得七死八活，这就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的悲剧。

文革后，他转来转去，又回到了省委办公厅，还是副秘书长，华年已逝，廉颇老矣。最后他落到省社会科学院，以院长、省顾委常委身份离休，算是落了个副省级。

他自离休后，甩掉了乌纱帽，思想就更开朗了。原本自三中全会后，他的思想就日益开明，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说倾诚拥护，对农民问题日益关怀，他全力倡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大别山去调查，写了专著。此时，他仍受排挤，我颇为他不平，但他从未说这些人一个不字，可见他为人宽厚。因为当时一些领导不想重用又不得不用他的才能与淳厚，便老是打打用用，用用打打。为此我曾以十七令打油诗一首赠送他：“老马为时累，心力已交瘁，跌跌爬爬赶，掉队！”他看了苦笑无言。

但离休后的他，直到死时也没闲着，他先是组织一大帮专家、老干部到安徽各县咨询，帮着各地决策参考，写成一部书《安徽发展咨议》，反映他一颗火热的爱国爱家乡之情。然而这一切在某些人眼中，是大钱不值一个，还背后说他这些意见都是书生之见。其实那里面充满智慧与调研得来的真知，如果当时这些建议能在省里实施，安徽的情况应该比现在好些。后来他又转向安徽文化的调查，他组织了一帮文人，将安徽文化创造性地分成三个文化圈：淮河、皖江、新安，写了不少文章，又与电视台合作，搞了历史文化片《皖赋》，这是足以流传后世的杰作。这件事完成后，他又组织了炎黄文化研究会，办了杂志《华夏纵横》，自己则到处开会、旅游、写文章，生活得十分充实。他广交朋友，上到北京、上海、安徽著名的思想家、文化家，下到工人、农民，都与他通过电话、开过会、吃过饭。他酷爱旅游，一生拍下许多照片。晚年的他，头上没有乌纱了，开放多了，话也敢讲了，文章也敢写了，回归到真实的自我。直到去世前，他的笔未歇过。写了五本书，第一本为《安徽包产到户研究》，这是农村改革较早出的一本书，不免要引起一些争议和麻烦，还被告了状；第二本是和朱文根

合写的《安徽农村改革》；第三本是《安徽发展咨议》；第四本是《致远集》；第五本是《书生之见》。这些书中，不乏振聋发聩的好文章。如《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民主》、《反腐斗争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封建主义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等等。其中三篇《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被张劲夫老



欧远方夫妇

收入他的《嘤鸣·友声》集中。其中一篇反封建的文章在他死后还遭了通报，说他批评了一位大人物的封建残余。其实在他生前也已听到批评的话了，不过没有正式通报而已。

他这人一生未住过医院，为党和人民干了一生。他是一辈子只吃草、专吐奶的黄牛，是满腹才思、藏而不露的学者（只有我知道他学习是多么刻苦），是个遭遇不幸的文人。他老来表面健康，实际上心脏并不好。促使他心脏病发作以致死亡的除了病理机制外，还有心理机制。他写信、写文章均遇到了麻烦。第一件，某大人物到老家南陵去了解粮食状况，那里的干部欺骗了他，说粮食走向市场如何乱了套，他头脑一热，当即决定，退回到统购统销年代。这一下，粮食部门的大小官员来了劲，粮商也来了劲，农民粮食上市无处可去，只有涌向粮站，粮站不仅恢复了压级压价的老做法，又开始了打白条。可怜中国农民，生产粮食本身就只能糊口，这一来更是不赚还倒贴工本费和劳动力，他们怎能不怨言沸腾！对抗的唯一方法就是抛荒进城打工。我的老伴听熟悉的老农来反映，他又到了肥西等地作了调查，心急如焚，一心想向中央反映。他通过原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老同学，辗转把信交到某某手中。某某看了顿时大怒，立即把老伴的信连同他的批示返回安徽省委。省委办公厅不敢怠慢，当下把批示复印一份给老伴，意思要他检查。那上面措辞十分严厉，说他不该对粮食政策说三道四。这一通话使得老伴脸色煞白，一句话也说不出，但他没有后退的意思，还是继续通过各种关系向上反映。对这一倒退做法反映强烈的不止老伴一个，全国农村有良知的人都反对。事实是，统购统销搞不下去了，某某这才觉得有问题，只得

先做改回的试点。得此消息，老伴已重病在院，不多天就抱憾离开人世。在老伴去世后几个月，某某终于收回错误的决定。此时老友们纷纷打电话、来信告诉我，都说老欧要迟走几个月就好了。可是哪能呢，他是带着一颗被伤害的失望的心离别人世的。这使我欲哭无泪，我只有把满腔悲愤写在诗里：“目注风云天下事，常忧风雨问民情。直言招得权人嗔，谁识书生赤子心。”第二件，他从苏联参观回来，看了大量资料，写了一篇《苏联垮台的历史教训》，这是掷地有声之文，可不久就受到了某刊物的批评，而省里又有人上书告状，这又是一个重锤。可他就在病重时也不忘保护年轻人，这篇文章是在社联一个刊物发表的，老欧抱病披衣写信给宣传部，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这几件事，使他彻底变了一个人。那年的冬春，他一切都反常，我早已预计他活不到八十。果然，在3月12日生日之后的半个多月，他就匆匆的走了。不过聊以自慰的是，他的朋友真多，在他遗体告别的那天，到了足足有两千人，哀乐从两点放到五点，签名册不够用，白花也告乏。殡仪馆的人说，这是空前的。老友徐亦孺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遗体告别，他回去对杜导正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备极哀荣”。有这一句话，老欧也该瞑目了，他得到了做大官没有得到的一切。为此，我也曾作七绝一首：“大厅滴滴清明泪，悼语拳拳意俱真。始信人心均有秤，叮肌宵小是蝇蚊。”

纵观欧远方的一生，虽没有像右派那样受过大苦大难，也没有在文革中被折磨死，但他的一生，或起或落，或沉或浮，在老干部兼知识分子中，却带有典型性，偶然中含有必然，很值得我们去玩味，去思索。  
(责任编辑 李晨)

# 怀 念 千 峰

安子贞

李千峰同志仙逝了，一位宽厚的长者，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我师、我友离开了我们，使我深深的怀念与他相处的日子。

我闻李千峰同志的大名，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在河北日报社当记者，那时他好像在《旅行家》杂志做记者，撰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旅游通讯。我读过他写的《华北平原旅行记》，记得他把写在保定城墙上的一幅大标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劳资两利”写进了旅行记里。每次从北京坐火车南行，离保定市老远就先看见城墙上的这幅大标语，因此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只是闻名，未曾见过面。我认识李

千峰同志是在十多年以后，1964年他从新疆调到人民日报社任编委、记者部主任。所谓认识是单向的，即我认识他，他未必认识我。因为我不在他领导下工作，文革以前没有打过交道。文革中，因为他到人民日报社不久，办报和人事等方面的是是非非不多，虽然属于当权派层次，但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人民日报》是文革中未曾停过刊的极少数报纸之一，在我的印象中，李千峰同志也在断断续续地工作。既然工作，就得按着上头的意图行事，也就免不了说错话，做错事。可能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吧，文革后，李千峰同志调离人民日报社，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当调研员，后到中国农民日报社任社长。

写了一串李千峰同志文革前后的履历，是因为这段履历与我有些关系。斗转星移，时序推进到1984年，我在人民日报社当机关党委书记，工作不大顺心，想另找个地方换换空气。李千峰同志闻讯，多次找我，说是1985年要出日报，急需人。我当时虽然对他了解不多，但感到他是一片诚心，最后，决定去协助他办于1985年元旦出版的《农民日报》。

走近李千峰，相处一年八个月的时间，我看到，在他的身上体现着很多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李千峰同志处世待人以诚，办事与人为善，有很强的敬业精神。他懂得办报，研究办报，向年轻的编辑、记者传授怎样办报。在他坐班的时候，一早就来了，安排部署日常工作，晚上下班的时候，上白班的人都回家了，他不回家，把报社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留下，拿出京沪出版的报纸，上面画着各式各样的杠杠，叫大家看。看过一遍以后，就研究讨论。哪家报纸提出了新的问题，哪家报纸编排得好等等，联系《农民日报》怎样学习、改进、提高，出日报的初期，几乎



李千峰



天天如此。就我个人来说，过去编过一块版，没编过一份报。编一块版，只是报纸的一部分；而编一份报，需要统揽宣传报道的全局、整个报纸版面的全局，做整体思考，事情要复杂得多。就是在李千峰同志的引导下，我开始学习怎样办报和怎样把报纸办得使读者喜闻乐见。那时，我与千峰同志可谓志同道合，他放手，我实干，初办日报，整个编辑部有一股热气，在大家的努力下，一个时期《农民日报》办得很有生气，受到农村干部和农民的喜爱。现举两例：

一是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报道。1985年初，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见成效，农民开始摆脱饥寒贫困，少数地方农民手中有了余粮、现款。舆论界总是抓典型，而且常常犯层层加码、日日升温的毛病。于是一段时间，有些传媒把农村经济的初见好转说得有点过头，说目前农民已经富得流油。说过一点，可以鼓舞士气，刨除虚数，实绩不减，倒也无伤大局。只是由此产生两种思想偏向：一是有些部门、有些干部认为农村已经富起来了，各式各样的捞钱的手，也就从四面八方伸过来了。农民不堪重负。再是有些农民对于手中余钱不知如何使用，加上当时有一种“高消费”可以刺激生产之说，有的人就瞎花滥用；有的人投资不对路吃亏蚀本。针对这些情况，《农民日报》选择典型事例，配合评论，加以引导。配合典型报道，先后发表了《要讲点花钱的学问》、《农民还需要休养生息》等评论，保护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负担；引导农民投资，把余钱用在扩大再生产上。

再是关于农民进北京卖菜的报道。1985年五六月份，农贸市场开始活跃起来，国营菜店按计划收购蔬菜价格低，农民不愿意出售。一时，城里上市的蔬菜很少，“快马赶不上青菜行”，蔬菜价格天天涨，直到头茬春菜上市的时候，仍然居高不下。这时，《农民日报》记者张志清、李英杰在采访时发现一种奇怪现象：城里蔬菜紧缺，而来自农村的运菜车却在路口上被卡住，不能进城卖菜。原因何在？经了解，原来是文革期间一份限制农产品进城文件还在起作用。这份文件规定：农民运载农产品进城，必须有地、市一级开具的证明，才能放行。一是农民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再是蔬菜属于鲜活产品，由村到乡、到县、到

地市，层层开介绍信，加上有些地方还要走回头路（比如紧邻北京市的涿县，还得南下保定去开介绍信），这么折腾起来，青菜早就烂的烂了、蔫的蔫了。记者向报社领导汇报上述情况以后，李千峰同志立即找有关同志商讨，认定这是对文革期间的有关文件未认真清理改正，阻碍城乡物产交流，不利于改革开放的一个典型事例。统一认识以后，《农民日报》决定组织一个临时班子，连续集中的进行报道。于是在1985年5月29日布置记者连夜采访，第二天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打开城门让农民进京卖菜》的《记者来信》，同时配合发表评论。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出。这一消息立即在北京引起震动，中央有关同志给北京市领导打电话，询问是怎么回事？北京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检查阻碍蔬菜进城的原因，并作出果断决定：撤销进城手续，农民卖菜一律“凭菜进京”。《农民日报》于5月31日又在一版头条发表《凭菜进京好》的新闻和评论。这样一连报道了十多天，共发表新闻16篇，评论8篇。在那些日子里，李千峰同志天天晚上打电话问情况、问版面安排。对这一组报道的评价，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说：农民报的报道意义超过了蔬菜，立了一功。菜农说：《农民日报》的报道给农民积了德。北京市领导开始不愿意提起《农民日报》的报道，后来，在总结工作时不得不谈到：“北京在5月下旬出现居民吃菜难，《农民日报》发现问题后，发表记者来信，建议我们给外地运菜进京车辆开绿灯，这个建议提得好。我们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城门大开，凭菜进京，这很好。到昨天（1985年6月7日）已进来400多辆车，相当于5月29日的10倍。北京的菜多了，这也是一个改革。《农民日报》的报道推动了我们的工作。”可以说，农民日报社在出日报的开始，打了一场突破城乡壁垒，为农产品开拓城市市场的漂亮仗。

此外，《农民日报》还就保护耕地问题、军民共建农村精神文明问题等等，发表了一系列的典型报道和评论，受到农村干部和农民的欢迎。1985年这一年，皆大欢喜：上级领导部门对《农民日报》的宣传报道比较满意，报社从业人员对努力办好全国第一份农民的日报树立了信心。在

那些日子里，李千峰同志很高兴，我也感到工作顺手、开心。报社上下，有一股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劲头。

李千峰同志从农民日报社社长的岗位退下来以后，我回到人民日报社工作。逢年过节我去看望他，他经常讲述当记者的一些往事，听得最多的，是他参加新中国开国盛典报道的故事：1949年春，李千峰同志随解放大军进入北平城，在新华通讯社当记者，负责采访高层政治新闻。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圆满胜利闭幕，参加会议的代表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在空旷的广场上，毛泽东主席面对1000多名代表，用浓重的湖南语调宣读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在毛泽东主席读罢碑文，挥锹填土的时候，李千峰来到他身边，小声地说：主席，我是新华社记者，想借用您刚才宣读的文稿，誊抄下来，写报道。毛主席直起腰，从口袋里掏出文稿，叮嘱说：就这一份，可不能丢失呀。用过以后要还给我啰！李千峰说：请主席放心，不会遗失的，抄过后我即还给主席。李千峰拿回文稿，誊抄罢，奠基仪式已经结束，到哪里去找主席呢？千峰想交给党中央办事部门转呈，又一想不妥，还是应该亲手送还为好。后来，打听到晚上怀仁堂有联欢晚会，毛主席肯定会参加。于是，李千峰带着文稿到怀仁堂，走近毛主席身边说：主席，我把文稿还给您。毛泽东从坐椅上站了起来，与李千峰握手，风趣地说：你这个记者，还是很讲信用哩！

我建议千峰同志写点回忆性的文稿，把那个时候中央领导同志很平易近人，当记者是很惬意的事写出来。据我所知，后来由于千峰同志身体健康上的原因，未能如愿。在千峰同志离开我们的时候，我想把他讲述的这段逸事记录在案，以资纪念。

千峰同志从延安到北京，从新华社记者到《旅行家》杂志、《人民画报》的主要负责人，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后，被发配到新疆，1964年回北京，任人民日报社编委、记者部主任，直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副部级研究员兼任农民日报社社长，为党的新闻工作、为“三农”事业作出积极贡献。我到农民日报社的时间不算长，与李千峰同志相处很融洽，我视他为好领导、尊敬的师长、亲密的同志、知心的朋友。我常常想：能够在农民日报社结识千峰同志，受到多方面的教益，仅就这一件事来说，那也算不虚此行了！（责任编辑 赵友慈）

真理始創改革先行平冤糾錯澤惠銘心一任好書  
 記天降斯人天慶幸  
 艱地眠英骨地榮光  
 政務清廉作風民主律己從嚴寬人以厚千秋垂典

深切緬懷胡耀邦總書記  
 乙酉冬安徽張耐撰聯敬書

读者张耐撰书的缅怀胡耀邦同志的对联

#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序

金冲及

周恩来是 20 世纪的伟大政治家之一，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他对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他精力充沛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他谦虚谨慎、周密细致、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直深深地留在亿万人民的心里。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讲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事。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这以前，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几乎一直处身于斗争旋涡的中心，不知经历过多少狂风恶浪，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而艰难的局面，他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中间许多棘手的两难处境，也许是后人根本难以想象的。

在谈这个问题时，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两段话很值得注意。一段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说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也就是周恩来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另一段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这里是集中全党的意见，对周恩来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所作所为做出的公正评价。

应该承认，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也有一个过程。事前，他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是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的，对许多事感到难以理解。但最初当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它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中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同群众相对立的现象，需要“找出一种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时候，周恩来是拥护这种主张的，尽管他对当时出现的许多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并不赞成。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它所造成的灾难性恶果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周恩来比较早地察觉到这些问题，十分忧虑，力图加以限制或避免。但当时可供他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很小。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只能意味着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它的后果，不是什么个人问题。在当时，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前面所说“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哪一条都做不到。对党和国家、民族怀有那样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这一切而任意行动？另一种选择，得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还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这对他是一种十分痛苦的选择，但不付出这些代价，就不可能发挥这些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作用。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话是值得反复玩味的。它正是周恩来此时此刻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我们还可以看看邓小平、陈云的评论。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



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身处逆境。他们能够真正地理解周恩来的用心所在和他那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到粉碎“四人帮”条件成熟时,周恩来在不求人谅解的情况下默默地所做的一切,都发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种韧性的战斗,岂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如果要周恩来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拒绝做任何违心的事情,又能够做到前面所说的这一切,这种话讲起来固然痛快,其实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话,讲客气些也只是“书生之见”。

有时还听到一些说法:周恩来当时为什么不这样做或那样做,并且据以对他提出严厉的指责。其实,那样说的人也许只是以一种普通人的心理,去忖度一个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肩负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家在危难时刻所作的衡量和选择,跟事实的距离未免太远了。至于那些从敌对立场或自己的阴暗心理出发,所作的歪曲描述,就更不值一提了。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并不是说:周恩

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都是无可非议的。像对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后人尽可能作出这样那样的评论。但有价值的评论首先要对被评论者有一个合乎实际的了解。记得西方有位哲人讲过:我不怕后人批评我,只怕后人误解我。这话讲得很深刻,因为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批评,当然是毫无价值的。

要说清楚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谈何容易。我很高兴刘武生同志能够写这本书。他写这本书有很多不可多得的条件:他担任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周恩来研究组(下分生平和著作两个小组)组长,系统地阅读过大量档案材料,访问过有关人士,发表过不少研究成果。近一两年来,他又集中力量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周恩来,力求如实地再现历史的真实。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一定可以有助于读者增进对这段复杂历史和周恩来这位人民总理的理解。

(2005年10月)

## 库存线装图书低价销售

购书即可免费加入蓝航文史书友会 1.成为终身会员 2.定期免费赠送最新彩色文史书目 3.购书享受2—9折优惠。宣纸线装类:

V1《二十四史精编》16开四卷精装	线装书局	定价:360 仅售:99元
V2《四库全书精编》16开四卷精装	线装书局	定价:360 仅售:99元
V3《曾国藩全书》16开四卷精装	线装书局	定价:360 仅售:99元
V4《史记》16开四卷精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定价:360 仅售:99元
V5《四书五经》16开四卷精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定价:360 仅售:99元
V6《菜根谭》16开四卷精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定价:360 仅售:99元
V7《资治通鉴》16开四卷精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定价:360 仅售:99元
V8《周易》16开四卷精装	京华出版社	定价:360 仅售:99元
V9《孙子兵法》16开四卷精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定价:360 仅售:99元
V10《三言两拍》16开四卷精装	京华出版社	定价:360 仅售:99元
V11《鸳鸯秘谱》大8开二卷精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定价:380 仅售:99元
V12《唐诗宋词元曲》16开六卷精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定价:360 仅售:129元
V13《中国传世书法》16开五卷精装	线装书局	定价:360 仅售:155元

另有:《中国传世名画》、《中国传世人物画》、《中国传世山水画》、《中国传世花鸟画》各套仅售:155元

V14《中国古典四大名著》16开檀香绣像本八卷精装	线装书局	
明·金陵世德堂刻本 明·贯华堂刻本 清·郁文堂刊本 清·双清仙馆刻本		定价:360 仅售:178元
V15《钦定三希堂法帖》桑皮纸线装10卷精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定价:1280 仅售:220元

V16《辞海》四册精装	中国戏剧出版社	定价:980 仅售:119元
V17《全宋词鉴赏词典》大16开三册精装	贺新辉主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定价:450 仅售:199元

另有:《全唐诗鉴赏词典》、《元曲鉴赏词典》《古诗鉴赏词典》《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词典》各套仅售199元

V18《中国书法全书》16开八册精装	湖北美术出版社	定价:1395 仅售:560元
V19《中国古玩收藏与鉴赏全书》大16开两册精装	天津古籍出版社	定价:560 仅售:189元

另有:瓷器、钱币、邮票、金银法琅器、奇石美石、玉器、雕器、青铜器、古典家具、绘画等类别 各套仅售189元

汇款请注明所购图书名称及详细地址 每套图书需加15元邮费 咨询电话:(010)66248729  
 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100076—22信箱蓝航书店 苏玉梅 邮编:100076

# 读资中筠《斗室中的天下》

朱尚同

年过古稀的资中筠，退休以后的初衷原本是向着“乐琴书以消忧”的，但“忧时”和“求真”的积习难改，身处北京芳古园的斗室中，还不住地向窗外凝望和求索：“陶醉在‘崛起’的豪言壮语中的吾国吾民何处是精神的家园？……俯仰今古，心事浩茫，对斯土斯民，乃至地球人类，难以释怀。”这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忧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近些年来新作不断，而且都是为时为事之作（引文除注明外，均摘自资中筠《斗室中的天下》、《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和《冷眼向洋》三书）。

资中筠新书《斗室中的天下》（撰文起讫年代为2000年岁末至2005年年中）包含有历史、现实、人文、政论等等说中道西之作。这几天我读着一篇文章，仿佛重温了走过的路。这几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我期盼过、担心过、清醒过，又糊涂过。但读着这本书中的慷慨陈辞和深入浅出的分析说理，自己乱丝一般的思绪梳理清了，常有茅塞顿开和“最难风雨故人来”的感受。

我和许多朋友都认为这本书中，有她一贯追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和风格，有很多振聋发聩的文章和可圈可点的论点，故而一边读一边写下了以下一些读书笔记。

我们每年都纪念“五四”，从来都是说“五四”是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的爱国运动。可有那么几年在报纸上报道“五四”时，强调“五四”的意义主要是爱国精神，看得出是有意逆前辈之说，将德、赛二先生“淡化处理”，似乎强

调两位先生就有碍于爱国似的。书作者在2004年春天，以敏锐的感知和笔力，将“五·四”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渗入我国政府处理“SARS”的经验教训中，将民主、科学和爱国统一起来，写了《“非典”与“五四”精神》与《痛定思痛话“非典”：再反思》两篇掷地有声的文章，痛切陈辞：认为这次“SARS”的突然袭击，以至泛滥成灾，而后得到遏制，我国有关当局如果认真总结，每一过程都与“五四”两大主题——科学和民主——处处有密切的关联。指出医学是科学，“不过这里科学的含义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取向”，“科学精神就是承认事实的基础上追求真理，把真实放在一切其他的考虑之上，例如政治影响、‘国家形象’、领导‘面子’、部门利益、经济收入、个人仕途等等。在我国‘真实’常常要服从于上述种种考虑，特别是所谓‘政治影响’，这是长期以来培养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从基层到高层各级官员皆习以为常，几乎成为一种本能，一发生天灾人祸，首先考虑对外‘口径’如何掌握，而不是穷追真相。”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腐蚀了科学精神”。

民主固然是政治制度和程序，但重要的也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生活方式，好像英国哲学家罗素就说过这个话，“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贯穿于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其基本要素之一是“知情的公众”，愚民政策显然与民主不相容。可是这些话言犹在耳，去年底松花江水污染危机中，又一次重演了2003年春天的错误，而且环保总局局长刚刚引咎辞职，中央调查人员刚刚下去，直接应对此事负责以及隐瞒不报的官员尚在等待问责时，已见媒体开始

歌功颂德,赞扬恢复供水之“功”,官员喝水作秀,并据电视报道,居然已经制造一出歌功颂德的大型专题文艺节目“水之情”。转眼间“灾难”被办成了“喜事”,速度之快,文过饰非能力之强,与对待灾难之冷漠、隐瞒、说谎成鲜明对比,真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夺天之能!可见,作者指出的“还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不能指望物质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进步和人的精神的提高”,确有深意存焉!“在科技如脱缰之马以加速度向前疾驰,不知伊于胡底的情况下”,“人的自知之明和自律能力是否超过征服自然的能力,人类心灵是否还能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将决定人类将造福还是嫁祸于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文明与野蛮的竞赛尚在未定之秋!”这里是指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人文精神,人们没有公民意识,素质低下,还能自称文明社会么?即令生产和消费再发达也将衰败下去。所谓“公民意识”就是要懂得自己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如何去保护和履行之。

《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世界观》,就只三千来字,却把从古到今,从毛泽东时期到邓小平开创时期,中国在对待和处理国际关系时,国人世界观的延续和变化沿革理清了。结尾指出当前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处境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有当代的特点。指出了国家的对外政策不能不受本民族长远的文化历史和今天内部公众压力的影响。研究和了解自己和他国民族心理特点有助于更妥善地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指出“合理的民族情绪在一定的情况下可能爆发为非理性的、群众性的排外行动,这对政府当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利用民族情绪加强对外发言权,或者抵制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又会把自己置于非理性压力之下,使符合实际的、稳健灵活的对外政策遭到非难,造成被动。”

《重建精神的家园》与《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两文有紧密联系。书作者指出,“中华民族早熟早慧,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相当成熟……但是过早地失去了天真和童趣,结果多的是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政治文化,少的是超越功利的探索。”“唯其早熟,其本身也受传统之

累。与西方人争取到思想言论自由,建立起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从而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同时,中国历代统治者恩威并施手段日益高明,一方面以官位利禄使天下读书人尽入彀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扼杀创造力。”我们以五千年光辉文明自豪,“其实有原创力的思想就在先秦诸子,由于他们享有后世所没有的思想和行动自由。”

欧美的发展历史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文章娓娓道来,提出西方在几百年中如何一个一个阶段循序渐进地发展了文明:从神权到人本位,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到确立自由权利,以及科学革命、工业革命都是一步一步走来,自文艺复兴起,从精神到物质,问题出现一点解决一点(陈乐民先生在《欧洲文明的进程》中,也阐述了同一论点)。而中国沉睡了一千年,突然被大炮轰开,一着急就赶快跟着跑,但我们要把别人几百年解决的问题拥在一起解决,为了赶时间,又来不及消化,不断吃夹生饭。况且,中国也根本不是什么“一张白纸”可以随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历史长期专制主义的沉重包袱太多了,一个“言论自由”就常令上上下下头痛不已。而没有自由舆论,只说“反腐”这一项就不能不事倍功微,这是谁都心知肚明的。如今天天下命令反对公车私用、反对公款吃喝、反对公款出国旅游等等,几曾有尺寸之功,但只要舆论一开,立马就可解决。早年,从“戊戌”诸君子到“五四”健将们,他们向外学习,拿来的大多是精华,其原因就是在作为载体的这些人,学贯中西,知己知彼,对于该接受什么,该扬弃什么,体会非常深刻。而今天接受外来影响的载体,跟那时大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经过了文化的断裂,从总体而言缺乏足够的文化修养,因而缺乏选择能力。所以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后发困境”,而要扬长避短,这倒真是中国的重要“国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个很有影响的电视台,请李敖先生在电视上月月讲、天天讲,有一段大意是书太多了,你们不必读,让我李敖替你们读,我读书,你们读李敖就行了。李敖先生也多少讲了点好观点,但有些话特别是这几句我总感到不是味道。本来我以为只是此人太自负,



再一想，这种说法在文革中和文革前就已听得太多了。八亿国民，一个脑袋。既然有人可以“洞察一切”、“一句顶一万句”，那末任凭一个人或少数人代替中国几亿人读书思考和拍板不就行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夷狄”之邦，重金礼聘李敖先生去替他们读书、想事、拍板的？寄语电视台诸君子，读书还要靠自己读，自己想，千万不要再这样导向了。因为如果“顺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欲求科学、民主、文明进步，毋乃缘木而求鱼乎！”“在国门再次打开时，面对光怪陆离的外来文化，或者饥不择食，失去选择和吐纳能力；或者在人家那里本是良种，如淮南之桔，过了江很快变质。”可见，办好自己的事，还是第一位的，少骂点别人，多一点反求诸己，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嘛！

作者独具慧眼，认为当今许多严重问题，主要来自阴魂不散的“前现代”因素，即历史包袱太重了，即令是从外面传染的，也是由于自己的痼疾太深，而不是已经完成“现代化”之后的弊病（至少主要不是）。这又是与从“文艺复兴”开始，一步一步走来的欧洲的不同之处。

2000年秋天有报纸组织关于“如何估量中国在世界的位置”的讨论。书作者十分风趣地说，问题本身就带有中国特色，说白了就是务虚名而轻实效。不能见物不见人。“要排名，不能不考虑这十几亿人的生存状况、生活质量、教育水平、精神面貌、公民意识（懂得保卫自己的基本权利和应尽的公民义务）、法治观念、社会正义的概念等。”对此，一百年前梁任公早已讲得痛快淋漓：“夫安知乎虐政所从入之门，乃即外寇所从入之门也？”“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吾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梁启超《新民说》）民本、民权思想何等鲜明！何等透彻！！对于历来中国人民人格之受摧残何等悲愤！！今人“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只是为“自己”的“天下”服务的，“爱民如子”、“为民作主”等等说法，与权为民所“授”，民有权利，民是主人，在观念上是主次颠倒的。今天一些人与古人梁任公相比，竟像是倒了个个，时光倒流，今人成古人了！当然是远远不及有见地的古人的。

本书中有一组关于国际问题的评论，其中一些论点，书作者曾在上世纪末的一些论文和长篇著作《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中阐述过，其中有一些是美国研究领域中具有开拓性和“首发”的贡献。由于《斗室中的天下》最后的跋一文中，也涉及到许多这方面的问题，这里简要作些介绍和讨论。

书作者早已多次指出：“民主是一种制度，不是一种道德标准，其精髓是权力的制衡，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个人或寡头专制。”“美国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权是客观事实，一贯如此，可以并行不悖。”“一般传统的观念是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对外侵略与对内压迫有必然的联系。美国却不然，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信仰对内不能实行压迫，所以才有渐进的妥协改良，才有今天的昌盛。”我们不能因为肯定它的民主，就否认它是霸权主义，或为之辩护；也不能因为它对外的霸权主义或行径，就说它是假民主。“它高举的‘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旗，不论它自己在实践中如何多重标准，如何为其霸权服务，甚至伪善，就其核心而言是代表了世界进步的潮流。……60年代，我国高举反帝反殖、支持民族解放的旗帜，不论在实际政策有多少错误，这一口号确实代表当时的进步潮流，至少在道义上站得住。今天世界各国的主要需求是发展经济和民主改革，并且跟上世界潮流。我国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时仍需要反对美国的霸道行径，但是作为一项总的口号，不可能建立反美或反霸‘统一战线’，就是这个道理。”几句话，将问题说清楚了，真是深入浅出的好范例。

本文作者曾在全国性的一份报刊的湖南增版上，见到转载的一篇文章，号召以我国为首，组织所谓“世界反美统一战线”。这两年来也常有文章，认为我们在实力上已可与霸权主义者一战，而且战必能胜。更有人丧心病狂的主张用氢弹突袭，先发制人，包括消灭对方人口。这些人或者是不负责任，以在战场上吸引火力，高唱“向我开炮”的“英雄”姿态，用于国家民族的安危；或者这极少数人实际是想走一条危害全人类的军国主义道路。可见书作者并非无的放矢。

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思考，即在批判美国强权政治的同时，为什么常有人对于西方对内确有相对多的民主、自由讳莫如深（自己大概还是知道的），更不为这些国家老百姓能享有较多的人权和较高的生活水平而高兴呢？这种心理不改，对于中国和平崛起是绝对无益而有大的害的。这似乎不是工人阶级的胸襟，也非全球化过程中健康的心理素质，而更像是“阿 Q 精神”。请读一读恩格斯的晚年著作吧，对于当年资本主义的改良，恩格斯不仅是肯定的，而且据以修改了自己过去的某些结论。这才是伟大的思想家。

美国何以兴，苏联何以衰？苏联解体是西方“和平演变”成功的吗？资中筠回答说：“综观 20 世纪的社会变迁，归根到底有两大动力，一是求发展，二是求平等。”“但是这二者又充满了悖论，在科学技术、物质生产以空前的加速度前进的同时，社会矛盾也空前的尖锐化。”就一个国家，一种社会而言，所谓成功与失败主要不在于政权在谁手中，或者疆土的扩大与缩小，也不是单纯的增长数字，而是要看相对来说，哪个能更好地满足这人类的两大要求，同时较好地解决或至少缓解二者的矛盾，取得相对平衡的发展，从而达到真正的兴旺发达，否则反是。窃以为这段话是 20 世纪观察全球各国兴衰的基本立足点。

书作者显然是不赞同所谓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也是不赞同所谓只要掌握好“笔杆子”和“枪杆子”就能长期或永远巩固一个政权之说的。20 世纪的美国，“充满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种族冲突，还有对外的热战和冷战。但是他避免了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其他方式的无序政权更替，在思想信仰上也没有经历过和‘传统决裂’的过程，基本在原有思想和政体的框架内不断更新、变化，较之任何一个主要国家都稳定。正是在这种稳定的局势中发展成全方位的超级大国，领了一个世纪的风骚，其秘诀在于渐进主义改良。”“这种批判的动力是知识阶层的责任感，其保障是充分的言论自由。……由于政府领导是民选的，他们既不能压制舆论，又不能置之不理，这就促成了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过来这种改良和妥协也维护了社会稳

定，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所以既得利益阶层也有进行改革的动力。”“这种改良的力量并非只靠政府，而在于上、中、下三方面力量的结合，即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措施（如一系列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立法），自下而上的公众批判和抗议运动，以及介乎二者之间的私人公益事业。”

至于苏联，“我国认为苏联解体是西方‘和平演变’成功之说颇为盛行，由此推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有限开放都是开门揖盗，是罪魁祸首。那么反过来，在外部世界突飞猛进进入信息社会情况下，这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联邦，照旧经济上国家垄断，政治上全面专政，对内实行思想禁锢和信息封锁，对外保持紧张关系，抵制思想文化渗入，加紧控制东欧各国，严守柏林墙，能长期继续下去吗？更重要的是能给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内的人民带来繁荣昌盛，幸福生活吗？”事实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各国纷纷成立共产党，都听命于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就是听命于苏共中央。在国际主义前提下，各国共产党员的忠诚首先是对“国际”，其次才是本国。苏联对各国内政的干涉，不遗余力，众所周知。美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50 年代掀起过两次反共高潮，说明当年美国为首的西方统治者感到了威胁，缺乏自信。后来，“自斯大林执政以后接踵而来的种种情况不断使一批一批向往者的理想破灭，而且使（西方）忠于苏联的共产党人经常处于尴尬境地，在本国人民中孤立。结果，本来对美国社会极其不满的人鉴于号称实践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榜样’，二害相权取其轻，只能与改良的资本主义妥协。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里有极大的讽刺意义。”因而世界范围内“思想上攻守之势易位，害怕演变的就不是西方了。”

1975 年欧安会的最后文件，西方将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线，换取苏联把尊重人权和东西方交流、人员自由往来写入文件。有趣的是：人员、文化交流本来是平等的、相互的，为什么西方力争而苏联力拒呢？既然是相互交流，为什么苏联不能对西方“演变”呢？西方“对苏”促变“是既定方针，是公开宣传的阳谋”。那么“为什么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顶住了十四国武装

干涉，却在发展成掌握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之后害怕在对等基础上的和平的思想交流？事实上，在冷战期间苏联‘文攻武卫’齐上，阳谋阴谋并用，与西方争夺势力范围，也是不遗余力的。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一些国家的革命政党接受苏联的资助也是公开的秘密。”资中筠因此认为：“所以问题不在于在互挖墙脚中哪一方的策略更高明，关键还在于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国人的创造力，满足本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些话显然是有说服力的。这一系列论点，说明书作者完全没有拘泥于传统观念，而特别擅长于在纷纭庞杂的实践中，理清事情的全部因果，并从深入一大堆表象中筛选出判断真理的“真经”——即谁的制度和国民素质能更好解决或缓解 20 世纪“求发展”和“求平等”两大要求。

资中筠先生在著文时，要求自己：“若是真话不能全说，至少明知是假话的不说”，但“就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些沉重话题，提笔时，一些论

点和文章，就非所愿地难掩锋芒”。书作者十分喜爱辛弃疾词，文章悲歌慷慨的豪迈风格和忧患意识也正像辛词。这当然是为了：“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辛弃疾《太常引》）

写完本文后，又记起朱熹的一首诗：

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  
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

渺者，深远，穷者，穷究缘由，资中筠先生著文时追求的正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说怀古，如果仅仅凭吊，非壮士本意，学古知今，使古能为今用，才称得上是壮士。查查历史，古往今来，一切有为的、有史可据的知识分子，无不是“忧时”，即居安思危、具有忧患意识的。本书中所有文章，都是从对现实的艰苦研究中成文的，决没有概念的游戏。在一片喧嚣浮躁之中，这样的呼声值得倍加珍重。如朱正先生所说，这是一本每个在关心和思考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人都应一读的书。

（责任编辑 李 晨）

## 《炎黄春秋》杂志社举行新春联谊会

2006年2月10日，《炎黄春秋》杂志社在京举行新春联谊会。部分在京顾问、特邀编委、作者及读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常务副社长徐孔同志主持，社长杜导正同志汇报了本刊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杜润生、李锐、李宝光、朱厚泽、白介夫、袁鹰、彭迪、韩钢、李昌平、卢跃刚、陈模等同志作了发言。本刊顾问于光远委托秘书胡冀燕宣读了发言；吴思同志宣读了万绍芬同志送来的书面发言。会议气氛热烈，生动活泼。

应邀发言的同志充分肯定了本刊一年来的工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对编辑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他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本刊能一如既往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与时俱进，继续坚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秉笔直书的办刊方针，把刊物办得更有声有色，使读者群继续扩大。

出席会议的还有（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仲廉	尹 骐	方 徨	王 才	王戎笙	王俊义	王强华	王建勋	冯 征
叶维丽	刘 苑	刘志琴	许人俊	齐明昌	严如平	何 方	何家栋	余焕椿
吴岱峰	吴明瑜	吴 象	宋木文	张天来	张思之	张荣华	张培森	张惠卿
李 昌	李 普	李 峰	李一蠡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兆麟	杨明伟	陈大斌
金 凤	单少杰	季 音	范敬宜	金冲及	姚力文	胡守文	赵淮青	钟沛璋
高 放	章立凡	龚育之	曾彦修	鲁 諄	蒲志强	雷 颐	薄会川	薛德震
戴 煌	魏久明							

本社杨继绳、吴思、徐庆全、李晨、胡竞成、赵友慈、杜明明等亦与会。



# 周佛海死刑改无期内幕

王贤才

抗战胜利后，汪伪达官显贵，纷纷被捕入狱，巨奸陈公博、褚民谊、缪斌、梅思平、丁默邨、林柏生、陈君衍、叶蓬等都被先后判处死刑。独周佛海，由南京高院判处死刑后，复经最高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已成定讫，而又峰回路转，减为无期徒刑，实为群奸中绝无仅有的例外。其中原委，不乏传闻。近阅友人所著《南京大审判》，内容有涉及“周案”的，谓系周妻亲自跪求蒋介石，始得改判。实际并非如此。

## 叶庭长想玩“猫腻”

周佛海是1946年11月7日，由南京高等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因本人及家属上诉“抗告”，一月后，最高法院调卷复核，分发刑事第一庭办理。当时刑一庭庭长叶某，福建人，颇有心计。因周佛海长期主管汪伪财政金融，是块有名的“肥肉”，当然不肯轻易放过。不久即有两个福建人到上海，找到周佛海旧属、曾任上海《新闻报》社社长、上海特别市政府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兼中国通商两行董事的李思浩，表示他们与叶某相识，案子就在叶某手里，周家有何要求，当可负责转达。用意是很明显的。李思浩即将此意转告周妻杨淑慧。周家商量后，虽觉不失为一有用门路，但恐其要求过高，难以满足。原来周佛海虽家资巨富，但已遭军统“洗劫”一回：1946年6月15日，陪伴周佛海软禁重庆的杨淑慧，获准由重庆回上海处理家务，飞抵上海后，即被军统扣留，逼令交出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损失不菲。更重要的是，当时杨淑慧认为已走通了另一“门路”，觉得更有把握，更有“权威性”，就没有理会最高法院刑一庭

的叶某的要求。

## 马家“神坛”与委座“外宠”

原来杨淑慧自周佛海宣判死刑后，除奔走人事外，还到处求神拜佛，夤缘结识同为佛门信徒的马姓妇女，此人是立法委员马晓军之妻。马家设有“神坛”，传说十分灵验，善男信女，有求必应。杨淑慧也到过马家神坛求过，并与马妻成为知交。马妻告诉杨淑慧，说她认识蒋介石“外宠”吴小姐，已托吴向蒋求情，为周佛海减刑，吴已答应，但吴下面的人要“打点”一下，需金条20根才能应付。以马的身份，杨淑慧当然是相信和放心的，当即答应了马的要求。马妻就叫杨淑慧写了两份呈文，由杨署名，一报国民政府文官处，一报军统局转蒋介石。周佛海在狱中听说此事，觉有疑义，但杨则深信不疑。不久马妻告诉杨淑慧，说吴小姐已在蒋介石处“求”到了“情”，蒋已将呈文，批交最高法院院长夏勤，指令减刑。但减刑仍须服刑，如能得到“特赦”，就可立即出狱。马表示亦可帮忙，但需再加金条10根，前后30根，先付半数，并议定将来获得“特赦”，发还资产应悉归吴小姐，杨淑慧也即依允，并连夜赶往上海，分头告贷，变卖女儿首饰，凑成30根金条，先交15根。于是马又代杨拟文，申请“特赦”。不久马回信说，她亲自携文到沪，面交吴小姐，吴已托蒋纬国带回南京，面交蒋介石。马说蒋纬国之妻就是吴小姐介绍的，因此关系非同一般，吴小姐在上海，就与蒋纬国夫妇住在一起，惟蒋纬国虽碍于吴小姐情面，允为代呈，也得给点好处，于是提出再给蒋纬国8根金条。杨淑慧也如数报命。但到1946年12月下旬，“减刑”

或“特赦”仍渺无音讯，杨淑慧再请马妻到国民政府打听此事，因有一呈文是递到“文官处”的。未几马妻回报说：“元旦已来不及了，因须先由法院呈请，公文往来，约需半月。”遂又提出：文官处经办人员也得给点“润笔”，以促其成，须再给金条4根。杨淑慧虽对索取无厌极感不满，但又恐功亏一篑，只好勉强支付。到1月上旬，马妻告杨：公文已于1月6日送达法院。把戏愈演愈真，此时连周佛海都有点半信半疑了。看似“特赦”在途，忽然一夜北风起，1月21日最高法院宣布对周佛海死刑一案，维持原判，才“大梦初醒”，真相大白。杨淑慧绝望之余，面质马妻。马妻这才承认，她并不认识什么“主座外宠”吴小姐，整个闹剧都是时任军统副局长的毛人凤之妻“导演”的，于是故意大骂毛妻。毛妻也怕此事闹大，因为毛人凤与军统头子郑介民向来不和，毛妻与郑妻也是死对头。怕此事为郑所知，授人以柄。毛妻便托曾任蒋介石侍从、特务小组首任组长、保密局中将设计员的胡靖安之妻出来圆场，要求不要声张，愿将金条退回。约定在上海退回20根，南京退回9根（实际上海只退回16根，南京仅退1根）。杨淑慧也投鼠忌器，又慑于军统权势，只好吃哑巴亏，同意不说此事。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郑介民也微闻此事，派人来找杨淑慧。杨虽未承认，毛人凤终觉心有不安，就想在杨身上抓到一点把柄，以利威胁、控制，于是又有了所谓“中共人士”过问“周案”的事。

### 神秘的“中共人士”

时为1947年3月9日，忽有一自称“中共人士”的薛某，自言辗转探得杨淑慧住处，特来拜访，带来中共某要员“亲笔信”，大意谓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对“周案”极为关心，决全力营救，特派此人来京主持。杨问拟以何法营救？薛某说“劫狱”。杨淑慧大吃一惊，敬谢不敏，说周佛海虽已判死刑，估计尚无执行之虞，不劳动此干戈。杨将此事告诉狱中周佛海，周立判其伪，肯定中共绝不会作此荒唐事。认为必是军统所为，但军统何以如此，尚难解释。以后薛某又来找杨，重申此议，并说如实不愿如此，请杨给中共某要员写一便函回复，他好回去交差。杨不肯写。周佛海则据此断定：

此事是毛人凤或毛妻所为，旨在取得杨与中共要人交往的依据。

然则毛人凤为什么做这种雪里埋人的蠢事，导演这出必然败露的丑剧呢？原来当时抗战胜利，举国欢庆，高层已内定将于1946年元旦发布“大赦令”。毛人凤极知周佛海与国民党的深厚渊源，国府要员中，不乏周的知交故友，就是蒋介石本人，对周一一直颇有好感，有意维护，这是戴笠生前就已吐露过的，故认定以周的身份、境况，不列大赦，亦必列入特赦，落得做个顺水人情，骗点金条。不想大赦令发表，汉奸皆不在内，也未对周另颁特赦令，而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裁定，也于1月21日下达。

原先杨淑慧以为有了“吴小姐”这条门路，算是拜到了“真佛”，未免冷落了法院。负责周案的刑一庭庭长叶某，带信过去，满以为可以发注大财，却久候周宅“关节”不到，气愤难言，不仅很快作出“维持原判”的决定，而且故意选择1月21日农历除夕这天发表，使得周家在死刑重压下，凄凄惨惨渡过那年春节。

### 惊动陈布雷

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宣布，也惊动了周佛海的一些知交故友。首先是陈布雷。陈是浙江慈溪人，长期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并负责过国民党宣传工作，与周佛海多年共事，私交甚笃。陈在上海得悉周案最后裁定消息，即赶回南京，请文官处政务局长陈方（芷汀），找到正在走投无路的杨淑慧，叫杨速写一呈文，请求特赦，陈愿代为转交。陈布雷在国民党没有什么派系关系，一向小心谨慎，胆小怕事，更不肯多管闲事。此次对“周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表示将不顾一切，向“主座”进言。不久陈方来告：陈布雷已向蒋介石陈述此事。蒋说：“怎么到现在才说！”似有嫌迟之意，而态度则是积极的，而且立即将此事交陈布雷负责，设法解决。陈布雷领此“上意”，即去与陈立夫商议，决定仍由司法方面解决，并找时任社会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洪兰友，研究法律手续（洪曾任司法法院法官训练所所长，是国民党有名的“法学权威”）。洪兰友与周佛海交谊也不错，此事又“恩出自上”，所以也很热情。二月初，在陈

布雷推动下,国民政府正式行文司法院,表示对周可免其一死。时任司法行政部长的谢冠生,也同意由最高法院改判无期徒刑。但最高法院院长夏勤却不买账,说法院既已做出维持原判的决定,不便再事更改(这里未必没有刑一庭长的声音)。洪兰友就去找司法院院长居正,居正又与夏勤和谢冠生共商此事,决定改用政治方式解决,即由法院签呈国民政府请求减刑。但其部属认为:应由中央党部下一公文,司法院办起来才有依据。于是居正又与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兼秘书长的吴铁城商议。吴认为此事最好悉由政府办理,不必牵入党部,致招物议。于是执论不下,几成僵局。陈布雷又邀陈立夫、洪兰友同访居正。居正终被说服,迨由司法院呈文,约于2月中旬,送达国府。但时近一月,尚无消息。陈布雷又访时任文官长的吴鼎昌,请再以文官处名义,加一签呈,直送蒋介石。吴鼎昌照办了。蒋介石看了文官处的呈文,亲笔将呈文内容作了修改,令文官处誊清再报。据陈方吐露:蒋改之处,比原文写得更加有力。陈布雷与陈方又按蒋的修改重新润色、补充,再次呈蒋。3月28日,蒋介石减刑令下,全文如下:

“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护京、沪、杭等地治安事迹,请求特赦前来。查该犯自民国三十年以后,屡经呈请自首,虽未明令允准,惟在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为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奉谕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立功,以观后效等语,批示该犯在案,似可免其一死。经交司法院依法核议,兹据呈复,该犯既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签核等情。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如上所述,可知周佛海改判,主要实得力于陈布雷,而陈之敢于过问此事,亦非偶然,除了与周的私交外,蒋介石对周一一直颇有好感,另眼相看,作为蒋介石高级幕僚和心腹的陈布雷,肯定是了解的,故也是知其可为而为之。从这点说,陈布雷

这番活动,并不很悖他的处世之道的。

## 全部闹剧,背后总导演原是蒋介石

但蒋介石何以在到终审定讞之后,才来干预呢?蒋介石说:“怎么等到现在才说?”真是下情不能上达,蒋介石竟不知情吗?其实非也,这正是“委座”的狡诈之处。抗战胜利,专门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惩处汉奸,是一件万众瞩目的大事,可说无日不见诸当时的报章,周佛海一案,尤其闹得沸沸扬扬,蒋介石是不能不知情的。恰恰相反,综观各方面资料,周佛海可说一直是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

日本投降,汪伪政权作鸟兽散,周佛海则于1945年8月12日“荣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当然是蒋介石点头的。以后风头不好,辞职求去,要求到重庆或贵阳暂住,也是通过戴笠向蒋请求获准的。1945年9月30日,周在戴笠亲自陪同下,由沪飞渝,原拟次日换小飞机去贵阳,因周佛海岳父及妹佛珍均在贵阳,其母病故后尚暂厝贵阳市郊红花池。但蒋介石又变主意,要周留在重庆待命。当时蒋在西康,戴笠为此专程到西康请示后,即将周安置重庆“白公馆”。戴笠对周一再说过,“委座”对周至为关心,到适当时期必有解决办法。此话虽出自戴口,应属可信。因为以戴笠的为人,无论与周私交多好,如无蒋的旨意,是不敢与周佛海这样的特大汉奸打得火热的。还有一条“旁证”:周佛海由沪来渝前,戴曾约方以上海市长履新的钱大钧同访周佛海,钱曾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侍卫长,与周亦为旧交。钱就说他亲眼见到蒋对戴的“训令”,将周交戴笠负责。只是戴笠短命,不久就死于空难。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40余中委谒蒋,要求严惩汉奸。蒋介石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周佛海匿居重庆,亦非了局。终于1946年9月17日,押回南京,此事仍由军统出面,但显然也是蒋介石交办或认可的。总之,周的一行一动,莫非蒋的意旨,判处死刑这样的大事,蒋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故周佛海自己也认为蒋是故意于复判定讞后解决,以示恩威并重之意,应该说他是很懂得蒋的为人和心理的。

(责任编辑 李晨)



# 郡县制与美国政体

尹振环

《“秦家店”的郡县制》一文，分析了我国郡县制的形成、内涵，并与法式郡县制作了点粗线条式的比较。现在需要接着那个话题，再将郡县制与美国政体作点粗略比较。虽然美国政体是现代的，但通过比较，才会进一步了解古今中外的郡县制，并且顺便就了解了在美国为什么不会发生斯大林式的错误。

## 一、一部朴实与力行的“主权在民”宪法

不是说凡是没有出现秦皇汉武、拿破仑等等讲英语的国家，就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他们的总统、首相权力很小很少。不，不是这个意思。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西方各国都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着“帝王般的总统”、总理。以美国为例，总统掌握全部行政大权，总统的行政命令具有同法律一样的效力；经参议院同意，总统有权任命各部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总统还是三军最高统帅，握有最高军事指挥权；在对外关系上，总统权力也至关重要；总统下的内阁并不是一个集体决策机构，而是一个集体顾问机构，内阁不对国会负责，只对总统负责……无怪有“帝王般总统”之称。但是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过拿破仑、斯大林式的人物呢？没有像郡县制那样一治一乱、循环反复、周而复始呢？固然这是多方面综合因素造成的：

第一，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尤其是没有封建专制主义经历的污染；

第二，没有国王、贵族、军功、事功贵族等种种历史包袱；

第三，有着全然不同于中国的民族组成、宗

教与传统文化等等。

但建国后的根本的原因是有部付诸行动的、真实不二的、主权在民的宪法：1776年的《独立宣言》、1787年颁布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91年生效的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宪法》。它为美国缔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郡县制的资产阶级国家。上述根本大法解决了共和民主政体的两大根本问题——主权在民和权力制约。

先看“主权在民”。

比起“君权神授”、“君权军授”，主权在民是一种质的飞跃。它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人民有权选择和改变政府。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宣布：

政府的正常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政府要破坏这个原则，人民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另建新政府。

权为民所授，权来自人民的同意，这“授”与“同意”的主要手段，就是普选、选举。七十年后，林肯总统再次给主权在民的原则下了一个定义：

任何人民，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愿意并有力量，都有权奋起行动，抛弃现存的政府，并建立新的、更合乎其意愿的政府。这是最宝贵和最神圣的权利，这是，正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将使世界得到解放的权利。

所谓“有权改变或废除它”，“有权奋起行动，抛弃现存政府”，并不是指武装起义，暴力夺权。而是通过选举、游行、请愿等合法的形式，改变、废除、抛弃现存政府。

第二层意思是上一层意思的推衍：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不容剥夺。《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91年的《权利宪法》又作了具体

规定：“国会不得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不得“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申冤请愿的权利”；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侵犯，没有正式命令不得逮捕、搜查和扣押；建立陪审团审判制度；禁止任何人自证其罪；禁止酷刑和过重的罚金；……尽管百万富翁与草芥小民在享有上述权利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尽管“主权在民”之“民”有极大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主权在民”的基本保障，没有它，主权在民就会是一句空话，而且也只有它才能防止暴政，防止滥用权力，防止专制主义。老拿破仑、小拿破仑式的政变，是不可能发生的。

## 二、一套切实存在的制约网络

尼采说：“历史存在的原则是追求权力的意愿”，为了达到权力，“要成为强暴者、自私自利者，要成为卑躬屈膝者和目中无人者，如果需要，集所有这些品质的大成。”这话对于追求权力的人来说，未免一概而论，有点过分。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话则易于为人接受：“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与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统治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主要管理。”看来美国顺着这个思路——管理人民，人民管理政府，政府管理政府，逐步形成一套制约权力的网络。

宪法至上。在中国古代秦家店、郡县制下，皇帝至上、至尊、至重、至隆，口含天宪，自然也可以无法无天。美国没有经历过帝制，所以一开始就使宪法凌驾于任何权力之上。它主要是对统治者对政府的管理，当然也包括对被统治者人民的管理。种种政治权力必须以无条件地服从宪法为其存在的条件。

名副其实的普选制。国家行政首脑和参众两院议员由普选产生。尽管选举有种种不公平，选举过程中有种种弊病，但它体现了主权在民、权为民授与人民管理政府。使权力最终来源于、受制于人民。同时解决了用人上的择优汰劣“为

政在人”的问题。

议会制。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参众两院行使立法、制宪、选举（在总统或副总统所得选举人票未过半数时，众院决选总统，参院决选副总统）、审议、监督政府的职责。

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相互平衡。总统、联邦高级官员的活动，受参众议院之监督；总统任命重要官员，需得到参议院同意；国会对政府有质询、问责、财政监督、弹劾权。立法机关立法权受到行政机关的否决权和法院方面的司法审查限制。国会通过的任何法案，都必须送交总统签署，签署后才能成为法律，如不同意，总统有权加以否决，但国会仍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的法案，不经总统签署即可成为法律。最高法院也有权宣布联邦和州法律是否符合联邦宪法，宣布违宪者即不成为法律。司法机关的组织法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最高法官由总统任命，终身职。参议院有审讯各种弹劾案的权力，而总统受审时，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担任主审。由于三个机关互相分离、制衡，从而防止了权力滥用及因独裁而犯的种种错误。与郡县制的集权于一身，万事皆决于上，相距万里。

新闻出版自由。根据宪法“不得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普通百姓可以抨击时政。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说：“出版自由是鞭挞专制主义最可怕的鞭子。”马克思 1840 年时说：“报刊按其使用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人民利用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管理统治者，使执政者时时保持头脑清醒。同时又使得掌握信息传播工具的新闻界，对一切违法行为都起震慑作用，充当资本主义制度监护人与社会调节器。古代郡县制是没有这种权力的。

两党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竞选总统、议员中起着重大作用。当选者入主白宫，执掌国家行政大权；失败者也不甘寂寞，在野攻讦评说；当朝者唯恐被揭出疮疤而兢兢业业；在野者则竭力在民众面前重塑形象，以待来年。双方彼此制约、相互监督、校正美国决策、政策。政党制度是近代才形成的，所以古代郡县制无现代政党可言，无非是帝党、后党、官党……之分。

消除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重大因素。建军权集中于联邦。军队属于国家,而不属于党派,更不属于私人。禁止各州有自己的陆海空军。禁止各州结盟。禁止各州同外国结盟。总统任三军最高统帅,但发布关于镇压叛乱等方面命令的权力属于国会。国防部长及陆、海、空三军部长,由文职人员担任,负责部队编制、训练、后勤、武器研究和发展等事宜,但无作战指挥权。铸造货币、发行纸币、招募军队警察的决定权在国会。宣布战争、签订外债、规定度量衡的权力,也属国会。从而消除了军阀割据混战、各州拥地自立成为“国中之国”的可能。

可见美国政治权力是被控制在一张网络之中的,其纵线为宪法、民权,其横线是各种权力的互相制约,或者说,美国的政治权力被控制在十大制约中:

- 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
- 行政、立法、司法的互相制约;
- 中央与地方的互相制约;
- 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政治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 权力获得的制约;
- 权力运行中的制约;
- 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出版自由,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 权力运行后果的制约;
- 总统等重要官职,法定任期的制约;
- 议员等改选法定名额的制约。

我们并不认为美国政治体制尽善尽美,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亮,美国政治没有肮脏的手段,卑劣的目的。我们只是说美国上述政治体制存在着一些郡县制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机制:

- 防止错误、纠正错误的机制;
- 择优汰劣的机制;
- 杜绝专制独裁的机制;
- 防止暴政的机制;
- 防止治、乱、合、分循环反复的机制……

它无法孕育秦皇汉武,也难以产生拿破仑、希特勒、各路诸侯。

它绝对不会削弱“统一”,相反,美国 1776 年后的一百年中,“统一”的领土扩大了十倍。现在早已由十三个州的“统一”,变为五十个州的

“统一”了。

可见,统一中华、振兴中华、光大中华,需要的是邓小平的三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这里就有政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

### 三、一个千真万确的判断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派米高扬亲自送达毛泽东。毛阅、听之后,曾感慨地说:“苏联揭露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徐焰:《苏联的 1941 年和 1991 年》《百年潮》2001 年第五期),“这在西方是不可能发生的。”并且毛泽东还断言:“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上述论断精辟、深刻、正确。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只是非常非常的表面现象,根源在于“这是一个制度问题”,千真万确的判断。陈独秀早在 1940 年,不仅预言苏联将亡,而且预言:“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和别国产生出来”(《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版 397 页)。这里也谈到制度上的缺点,并且他的预见不幸而言中。在美国上述那种制度下,是绝不会形成斯大林主义的。一党专政;斯大林“拥有无限的大权”(列宁语);他事实上掌握了党、政、军高级干部甚至中级干部的生杀予夺大权;任命制畅行无阻;各种权力受制于一人;宪法、苏维埃(议会)新闻出版自由有名无实;党、政、军内的,以及高校、科研等等机构中的异己分子或可能的异己分子,或调离、或流放、或诛杀;社会名流中不可靠分子,或明或暗加以驱逐、流放、以至暗杀;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完全成了现代苏式的郡县制。这种体制下产生斯大林的专制暴虐,毫不足怪。在美国上述体制下,它是绝对不可能的。美国克林顿总统,政绩颇佳,经济连年上升,失业率下降,政治、军事、外交,也颇多建树,但就是因为与莱温斯基偷情,而遭国会弹劾,险些下台。在中国,秦始皇、晋武帝等几位帝王,后宫竟达万人。“粉黛三千”之帝王,比比皆是。有一两个情妇,那算什么?毫不足道。尼克松对在野党安装窃听器,竟因此受到弹劾,不得不灰溜溜地辞职下台。前苏联,岂止是窃听,对敌党、友党,



驱逐之，镇压之。结果只剩下孤家寡人。克林顿与尼克松，相去不远，人们记忆犹新。只简单提提就可以了。但 1867 年美国国会弹劾第十七届总统约翰生的事件有必要稍作详细的介绍。

美国第十七届总统约翰生，是接替林肯被刺后的一位副总统。他是南部民主党人，曾拥有奴隶，内战后就任总统，对南方奴隶主，对奴隶制度，抱有同情，采取了一系列妥协政策，激起了全国的不满与激进共和党人的猛烈的反对。“1867 年 8 月，约翰生总统要求陆军部长爱德义·史丹顿辞职。史丹顿予以拒绝。因为总统未依宪法所规定的征求参议院同意即把他免了职。参议院过去对于总统这类命令，曾经不是以普通的多数票，而是以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票予以批准的。现在因为约翰生总统未经参议院同意便把国防部长免掉，参议院拒绝批准。史丹顿于是又身莅陆军部大厦，并开始发号施令。1868 年 2 月 21 日，总统再度要求史丹顿离职。随后史丹顿便把自己的办公室用砖堵起来并搬到里面去，晚上留在那里，吃饭也在那里。众议院认为总统的行为是违宪的，并于 1868 年 2 月 24 日举行表决，表决结果以 126 票赞成和 47 票反对而通过了把总统依宪法程序交付法庭审讯(所谓‘弹劾’)的决议，总共控告总统十一项罪名，其中除了有关史丹顿问题外，还控告总统在言辞中侮辱国会、拒不执行国会的若干决议以及其他等等。

参议院在审理‘弹劾’案时，是在最高法官主持下进行的……这次对总统的审讯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波动。

1868 年 5 月 16 日，有三十五个参议员投票赞成认为总统有罪，而有十九个主张宣告无罪。要宣告约翰生为有罪，必须参议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决，这就是说，如果这次所投的票不是三十五票，而是三十六票的话，则约翰生已被宣布有罪了。根据美国宪法有关条款，约翰生乃得宣告无罪，而仍旧留任总统。”(《美国史纲》，苏·阿·芙叶菲莫夫著，三联书店 1972 版，557、

558 页)

这三则总统案件，足以说明斯大林的暴虐不可能发生在美国。中国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彭德怀、乃至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发生在美国。诚然，恩格斯只是说“美国式的自治，这正是我们应该有的”，马、恩并没有提美国式的其它政治制度也是我们应该有的。但是他们所设想的政治制度，是比美国政治制度更民主，乃至“民主千百倍”的政治制度，同时他们把国家消亡与政党消亡，估计得太快。历史证明他们太过乐观了。我们现在又有了百多年的经历，同时不是一两个国家，而是十多个国家正反两面的经验，足可以使我们作出正确判断：哪些我们应该有，哪些应该渐渐一步一步地有，哪些应该摒弃。如果说，我们今天还存在某种郡县制的残余的话，那么应尽快抛进历史垃圾中去了，这是应有的起码结论。(责任编辑 李 晨)

## 《随笔》2006 年第 2 期目录

- |                    |              |
|--------------------|--------------|
| 从“苦难美学”说开去         | 资中筠          |
| 名问名答的异同(外一篇)       | 黄一龙          |
|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 风石堰          |
| “受活”还是“活受”?        | 张 鸣          |
| 末世悲风说晚明            |              |
| ——读刘志琴《晚明史论》       | 吴小龙          |
| 野性学问               | 孙 郁          |
| 民间的、个体的记忆(外一篇)     |              |
| ——读倪良山《沉思集》书稿      | 邵燕祥          |
| 这不仅仅是遗憾            |              |
| ——巴金逝世百日祭          | 陈思和          |
| 巴金之死及其它            |              |
| ——怀念被抬者和抬棺的一代人     | 陈润华          |
| 从郑和到郑芝龙：祭奠中国民间海上英雄 | 周 宁          |
| 四十年前那一年            | 何满子          |
| 往事难以尘封——重庆文革墓地游记   | 侯艺兵          |
| 他坐在那高高的山顶上         | 萧功秦          |
| 我的父亲冯至             | 口述 冯姚平 撰文 陈远 |
| 母亲                 | 李亢美          |
| 读“高祖还乡”的联想(外一篇)    | 章 明          |
| “趋炎附势”钩沉           | 陈 炳          |
| 闲话三题               | 龚 刚          |
| 我们读什么书             | 袁            |
| 那方水土               | 卢锡铭          |
| 关于脱亚(外一篇)          | 李长声          |
| 天才的暗夜              | 世 宾          |
| 筑巢而居               | 王陌尘          |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随笔》杂志

邮编：510075 电话：(020) 37606288-510

邮发代号：46-90 欢迎邮购，免收邮费，每册定价 6 元

# 不只是“落后就要挨打”

官伟勋

## 一言而可以兴邦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是我中华民族从1840年以来屡遭残酷的侵略屈辱后，概括出的最沉痛最深刻的教训。如今，这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名言警句了！

这个警句非常好！好就好在它有极其有力的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它是警钟，是动员令！它无时无刻不在激励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强大而奋斗！

拿破仑曾称中国为“睡狮”。“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成为我国人民共识之日，就是“睡狮”觉醒之时。

晚清的六七十年不说。“七七事变”时，堂堂中国，一年才产4万吨钢。而当年日本已能年产580万吨钢，1580架飞机、744门大口径火炮、330辆坦克、9100辆汽车、5242吨军舰（郭玉槐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301页）。

我们呢？1954年毛泽东还说：“我们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也不能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712）抗战前还用说吗？我参加八路军已是抗战末期。发给我：老“七九”1支，子弹袋1条，内有子弹3粒，其余塞满胡秸棒棒，鼓鼓囊囊以示“弹药充足”以壮军威。另外还有4个手榴弹，1把刺刀。老“七九”的枪口老到能把子弹头装进去。射出的子弹会飞向何方？真是天晓得！

有人曾攻击我军“消极抗战”、“日军一进攻就跑”！莫斯科那个派住延安搞情报的“记者”，不但在日记（中苏交恶时出版）里写，还向莫斯科

写密报，“揭露”中共军队“不抗战”，“破坏统一战线，搞独立自主”；“背叛国际主义”，不肯按苏联的指示去打关东军，阻止日军进攻苏联。他明明知道八路军装备落后，“兵工厂”拆七条破枪凑一条枪，他还要像某些人一样要八路军与装备现代化的日军死打硬拼打阵地战。若真照他们的办法打，不要说抗战八年，恐怕八天抗不到，长征剩下的那点老本就拼光了！

持久战、游击战、以空间换时间，打伏击、打拼刺刀手榴弹的夜战、近战，是武器落后逼的，非如此不能保存有生力量，不能集小胜为大胜，不能争取时间发动群众夺取最后胜利！国民党几百个师，其中不乏甘愿为国捐躯的英勇官兵，也确曾数次以巨大牺牲给日军以重创，但为什么不到一年左右，就丢掉从平津到广州，从大沽口到海南岛几乎所有大城市与港口？原因就在装备落后而又作战方针不对头。

战争之初，日本天皇问征服中国需多久？陆相杉山元大将很有把握地说：“一二月足够了。”（【日】松下芳男著《日本军阀的兴衰》）他的根据就是中国落后。说实在的，如果不是我们党在敌后发动如火如荼的成功的游击战争，使日军痛感一线兵力不足，真不知已经打到广西云南的日军还会打到什么地方！

只有落后才挨打吗？

落后就要挨打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不是只有落后才挨打呢？历史回答并非如此。

晋、唐比胡如何？北宋比辽、金如何？南宋比蒙（元）、明比清如何？哪个不比所谓的“蛮荒之国”“蕞尔小邦”有着更发达的经济、更先进的文化、更丰富的人力资源？

北宋的经济与文化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农业与农业科技比起隋唐五代都有了长足进步。城市繁荣百业兴旺。东京(汴梁)成了“天下富商大贾所聚”之地。市上至少有160多个行业,行房有6400多户。造船业兴隆,指南针普遍采用,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以及火药火器,皆为天下先。宋朝发明的“交子”,史称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没有发达的贸易,不深感金属钱币之重之累,纸币是不可能产生的。北宋人创作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当年东京繁荣景象的生动写照!

南宋虽说偏安一隅,但随着大批官民随军南迁,加以江南已有东晋与宋齐梁陈几代人的开发,各方面不比江北差多少。经过一段恢复,南宋的经济文化很快就达到甚至超过了北宋的水平。临安(杭州)发展成拥有39万户、124万人口的大城市,超过了当年的东京。“店铺并列。交易繁盛”,“夕阳西下,夜市又开张”。陆运水运发达,水运可西达四川,南达广州、琼州,泉州成了海内外贸易大港,来自波斯湾的阿拉伯与来自高丽、日本的商人,络绎不绝交易频繁。林升那首“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虽说是讽刺朝廷醉生梦死的,但也反映了当时的繁华景象。南宋中期不仅是政治经济发展鼎盛期,也是著名学派形成期。理学学派集大成者朱熹、理学心学创建人陆九渊以及“中兴四大诗人”陆游等,都出在这个时期。学术繁荣带来教育的发达,著名的南宋书院纷纷涌现。

明王朝在宋元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方面,由于育苗与春化技术的提高,产量大增。手工业如炼铁、纺织、制盐、制瓷、造船都有显著进步。由于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全国相继出现了纺织、粮食、印刷及文具等交易中心,从而使纸币更加普及。《梦溪笔谈》与《天工开物》两本书的出现,就是宋明两代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最好证明。没有雄厚的物质力量与科技水平,怎么会有郑和万人船队浩浩荡荡下西洋的空前壮举?

与宋、明敌对的契丹(辽)、金与蒙(元)与后金(清)又怎么样呢?

它们在不久以前都还以渔猎畜牧为生,南下占有了黄河以北或辽东后,才开始有了农业并逐步发展起手工业、矿业、商业。蒙古贵族奴隶主进入中原后,才逐步转化为封建农奴主或地主。总的

说来都还是处在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阶段。

人口更不成比例。“记录在案的,宋明两朝人口都已达7000万,也有人估计实际数字还要多些,有人估计达到一亿以上了。”(戴逸《论康雍乾盛世》)入侵者人口却只有几十万、百多万。毛泽东曾向范文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清朝入关时只有六十万人口(八旗兵则只有29万多——作者),怎么能征服有7000万人口的明朝?(戴逸《论康雍乾盛世》)事实正是如此!经济先进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天朝大国”,却不敌区区“小邦”,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庞然大物,被人口不到自己百分之一的后进小国轻而易举地打垮了!

## 原因何在?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新兴民族朝气蓬勃、上下一心、英勇善战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根本的原因却在“天朝大国”统治集团本身的腐败!

宋明王朝的腐败表现真是“罄竹难书”。仅说数事以为例。

北宋由盛而衰而亡是从宋徽宗赵佶重用蔡京开始的。宋徽宗赵佶本来就是一个只知享受不问政事的酒色之徒,蔡京钻营上来后,更想方设法引导赵佶玩乐以固宠。他出主意花费22万斤铜,铸造九鼎并饰以黄金,专盖巨大宫殿曰九成宫予以放置。下令全国搜罗奇花异石、树木百草、珍禽异兽、山珍海味运往京师,即有名的“花石纲”。耗费了巨大人力财力物力,折腾得民间卖儿卖女家破人亡。蔡京请客,仅蟹黄馒头一项,就花掉1300贯。钱花光了,就搜刮,就明码标价卖官鬻爵:“二千索(贯),直秘阁;五百索,擢通判。”官场之黑可想而知。

明朝的皇帝们更登峰造极,从宪宗到孝宗到世宗都不上朝。国家大事交太监管。太监们则靠特务控制朝廷。几代皇帝一个比一个混。嘉靖养鹰、犬、虫、鸟,年用肉16000多斤,米5200多石。养一只豹子,用夫役240人,岁廩2800多石。他还迷信道教,宫中每年要用黄蜡20余万斤,白蜡10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于谦抄太监王振家,重堂深院数处,豪华无比,绮丽器服、珍奇珠宝无数;光金银就有六十余库,良马一万余匹。而明神宗朱翊



钩,活着要享受,死后还要享受。他用了6年,花800万两白银建定陵,石料从百里外的房山运,楠木杉木从云贵川采伐。深山老林、毒瘴遍地、野兽出没,死了不知多少人。千里迢迢,开路搭桥,不知累死饿死病死多少人。国库空了就加捐加税:“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明史》)

朝廷腐败必然导致军队腐败。“凡文武擢迁,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当兵的大都是“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军官则是“世胄纨绔,不娴军旅之人”,靠吃空名喝兵血肥己。无能而又狂妄,不懂军事而又侈谈军事。战事将起,纷纷脱掉军服溜之大吉。嘉靖朝,军团籍名册上有兵员38万人,实际上只有14万人。而真正算数的“2万而已”(《明史》)。富者聚敛挥霍无度,贫者无衣无食无立锥之地。皇帝花天酒地不干正事,官员朋党林立互相倾轧杀戮,军队成了社会渣滓聚集之地。腐败到这等境地!焉能不亡?

## 原因背后的原因

一个又一个王朝因腐败而亡,为什么后来的王朝不肯接受教训非要重蹈覆辙,“坚决”走腐败走灭亡之路不可呢?原因的原因在制度!

“天下之大害者,唯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先哲黄宗羲老先生,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得出皇帝独裁制是天下之大害这样一个极为透彻的论断。

无论什么都要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别人说的再好也没用。他要用谁就用谁,他要杀谁就杀谁。关系人民安危的大事,他一人做主,他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怎能不出问题?遇上个“明君”还可以借天象或地震之类以“老天爷”的名义提醒一两句。碰上明世宗朱厚聪那类昏君,他能下令把数以百计提正确意见的大臣,拖到午门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一批批地死去。

腐败的皇帝被腐败的臣子包围着,正人君子连见皇帝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传达下来的“圣谕”,不是无知太监的就是权奸的祸国殃民的私货。良知忠言偶尔能“上达天聪”,在这帮人的控制下也不会被采纳。宋神宗死了,议继位人选,宰相章惇说“端王轻佻不宜为君”。多么正确的意

见,太后不听,还是立了断送大宋的端王也就是宋徽宗。

“用一君子则君子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俱来。”覆亡之国无不与用人有关。蔡京奸邪人所共知,民间称他的团伙为“六贼”,恨之入骨,时有“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的民谚,宋徽宗爱他重用他,别人就没办法。蔡京将亲信41人全任要职。把有民望的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等全打成“邪等”、“奸党”放逐。南宋则前期重用秦桧、后期重用贾似道,忠臣良将,不被害就被闲置。岳飞惨死风波亭,韩世忠被罢兵权,“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乐。”强敌压境,国家正需人才之时,昏君却自毁长城。

腐败越来越严重了,人人都感到国家危在旦夕大祸就要临头了,却毫无办法。为什么?因为那个“天下之大害”依然自我感觉良好,继续我行我素搞他那一套。

腐败还只是表象,“唯君”才是症结所在。

(责任编辑 致中)

## 本刊更正

2005年第6期第7页右栏第6行“1954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应为“1955年3月21日至31日”。第59页右栏第19行“任海军司令员的杨国宇”应为“任海军副司令员的杨国宇”。

2005年第11期第75页右栏第11行“1932年3月8日,溥仪……就任满洲国皇帝”有误,应为:1932年3月8日溥仪到长春,3月9日任“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1日,“登基”当了“满洲帝国”的皇帝。

2005年第12期第4页图片说明有误,应为“胡耀邦在甘肃陇南农村访问农家”。

今年一月号《炎黄春秋》刊登拙文《“实事求是”考源》有误。毛泽东早在1961年就说过“实事求是”一词出自《汉书》(见《毛泽东文集》第八集237页)。我对《毛泽东选集》比较熟悉,以后出版的《文集》,我已入耄耋之年,未认真细读,致有此误。经青岛张殿清同志指谬,不胜感激,并向广大读者致歉。甘惜分

# 清朝四部尚书戴联奎的绝世藏品



戴联奎像

千年古城江苏省如皋市物阜民丰，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2005年12月上旬，如城镇八旬老太叶涛将一只“文革”期间瓶首被毁、瓶身及花纹图案保存完好的清朝四部尚书戴联奎收藏的明朝青花瓶，搬进了儿子戴时祥创建的戴氏家藏文物展览馆，至此，该展览馆展出文物已达960件，其中戴联奎藏品568件。神秘国宝暗藏着怎样的身世？笔者慕名对叶涛和其子戴时祥先生进行了采访。

叶涛出生书香门第，其子戴时祥，系清朝兵、礼、吏、户四部尚书戴联奎第八代嫡孙，如皋市戴氏家藏文物展览馆馆长、中国著名权威汝瓷鉴定专家。2003年初，戴时祥在母亲鼎力相助下筹办家藏文物展览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将分散在戴氏家族内的戴联奎收藏的历代文物整理集中后对外展出。笔者参观展品后，戴氏母子翻开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稿》、《如皋县志》、《戴联奎家谱》，讲述着有关戴氏文物的来源及收藏情况。

## 风雨飘摇，藏品躲过一劫又一劫

戴联奎，字紫垣，1751年生于如皋如城冒家巷一个仕宦之家。幼读诗书，聪慧过人，15岁时已有诗集行世，有“东皋文童”美称。17岁时，戴联奎赴京随叔父戴知相身边读书，中顺天府乡试解元，1774年殿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升为编修。当时和珅当政，权势烜赫，而戴联奎刚正不阿，清节自励，不向和珅屈膝，因而20年没有得到升迁。乾隆去世后，嘉庆严惩了和珅，此后至道光元年（1821年），戴联奎先后担任兵、礼、吏、户四部尚书，是清朝汉人中官阶最高的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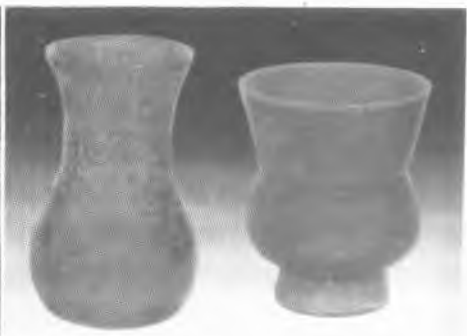
鞠  
九  
江  
  
周  
晓  
燕

戴联奎博学多才，满腹经纶，曾担任过嘉庆、道光皇帝的老师，在职近50年，官至一品。戴联奎酷爱收藏，视藏品为生命，常节衣缩食，拿出薪水银两购买散失在民间的历代瓷器、书画，一次为购一只宋三彩浅笔洗，他竟花去两个月的银两，毕生藏品千余件。道光二年（1822年）二月初四，戴联奎因病在浙江去世，享年72岁。道光帝深感痛失一位贤臣诤臣，宣旨戴联奎葬于如皋东陈张草港，并派大臣致祭，以宰相级葬礼相葬。祭品，戴联奎生前藏品，乾隆、嘉庆、道光帝圣旨及所赐古玩古董，用38条木船运至如皋。

星转斗移，沧海桑田。戴联奎藏品历经战乱、失窃，破损灭失严重，至20世纪初藏品不足600件，由其后代分散保管。戴氏后代为收藏保管先祖留下的遗物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付出了血的代价，其中2人致残，3人丧命。



乾隆皇帝颁给戴联奎的圣旨



戴氏藏品汝瓷

1946年夏的一天,一名国民党军官率20名士兵从泰兴黄桥直扑如皋戴府,企图占有部分戴氏藏品。戴氏家族上到80岁老人下至7岁孩童近百



戴氏藏品汉朝罐、瓶、壶、俑

人闻风而动,肩挑背驮,一夜之间将易被发现的藏品转移至大明、戴庄、东陈等乡村。次日,国民党兵扑了空,便用计将戴联奎第六代孙70多岁的戴文照诳至老松林餐馆。美味佳肴相待后,军官抛出一根金条、10枚银元说道:“戴老先生,只要让我们饱一下戴联奎藏品的眼福,这些都是你的了!”戴文照轻蔑一笑:“长官失望了,那些老陈货早已在鸦片、甲午战争中灭失得无影无踪,即便我活了这一大把年纪,还没见过半片子儿。”

“混账,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是你骨头硬,还是我棍棒硬。”军官一声吼叫,瞬间棍棒交加,老人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幸亏家人火速送来银两才将老人赎回。戴文照虽保住一条性命,却终身瘫痪。

十年浩劫,破四旧立四新,造反派将戴联奎第七代孙戴寿岩揪出来,要他交出四旧物品。关押期间,戴寿岩亲眼目睹红卫兵砸瓷器、毁佛像、焚字画、熔铜器的场面,他心在滴血:“作孽呀,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咋能这样糟蹋!”他暗示叶涛及子女竭尽全力保护好戴氏遗产。

戴寿岩被关押3个月,造反派在戴府抄了3个月。一日,几个红卫兵在戴家院内挖地三尺,搬出一只60公分高的明朝青花瓶,他们认为找到了戴氏家族暗藏四旧物品的证据,责令戴寿岩低头认罪。为保全花瓶,戴寿岩低下了头。岂知,造反派得寸进尺,责令他亲手毁了花瓶,以示悔过自新。戴不从,被体罚三昼夜。

数九寒冬,戴寿岩穿了一层薄薄的单衣,冻得浑身打颤,他自知凶多吉少,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他思忖着,老祖宗藏品有近300件是我藏匿的,我走了,藏品何以重见天日。他忍痛割爱,决计丢卒保车。他小心翼翼捧起花瓶,眼中噙满泪花,迟迟不愿下手。一阵沉默后,他左臂将瓶肚夹在腋下,右手捡起半截瓦片对准瓶口连击数下,“哐啷”,瓶首分离,瓷片坠地。他痛心疾首,捶胸顿足,造反派扬长而去。戴寿岩抱着残瓶发疯似的冲回家。夫妻相见,抱头大哭。因伤心过度,戴寿岩久病不起,1974年4



嘉庆皇帝御赐九龙宝椅

月的一个黄昏,老人口述完戴氏藏品位置后气绝身亡。丈夫去世后,叶涛挑起珍藏保管戴氏藏品的重任。

## 后起之秀,戴氏家族收藏有传人

1949年10月,伴随着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戴联奎第八代孙戴时祥呱呱坠地。童年时代的戴时祥聪明贪玩,爱与邻居小孩玩铜钹(用铜钹投圈,比命中率高),常赢回一小把铜钱。母亲叶涛因势利导,从教他认识铜钱上的汉字图案开始,循序渐进,讲述古币知识和祖国灿烂悠久的历史,在小时祥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的印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小时祥对古币收藏产生了浓厚兴趣,至15岁初中毕业时已收藏古钱币20余种近100枚。进入90年代,戴时祥又拓宽收藏范围,其藏品五花八门,他的案头床下、衣橱木箱内塞满了藏品,其妻称他是个“花花公子”。10多年来,戴时祥搬过三次家,家具家电减了一件又一件,而藏品却有增无减,并占据了室内主要位置。久而久之,邻里送他个“戴藏癖”外号。近年来,戴时祥潜心研究汝瓷艺术,他撰写的学术论文《揭开汝瓷的秘密》在香港《艺术与收藏》杂志发表,引起轰动效应,他成为公认的中国著名权威汝瓷鉴定专家。

戴时祥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老五。母亲叶涛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将儿女拉扯成人,无论多难她也舍不得卖出一件祖传家宝。然而,已到风烛残年的她,一直有个“心病”:戴家老祖宗留下的数百件藏品该怎样处理呢?深思后,她决定将保管戴联奎藏品的重任交给戴时祥。

如皋系千年历史文化名城,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戴联奎故居——戴府的恢复开放工作,将其列为全市的一大工程,并交由有关部门和戴时祥共同负责。整个工程分三步:成立戴氏家藏文物展览馆;成立如皋市戴氏源流研究会;恢复戴联奎故居。叶涛老太一拍即合:“我举双手





叶涛、戴时祥母子现场鉴宝

赞成！”

戴氏藏品中，高档次、重量级的藏品由叶涛老太保管，其余散落在戴氏家族中。老人半年内主持召开5次家庭会议，鼓励大家早日拿出藏品荣光耀祖，为国争光。戴家后人当场表态愿意拿出藏品。

2003年大年初一，春寒料峭，鞭炮阵阵，古城人沉浸在欢度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中。上午8时整，戴氏家藏文物展览馆（租赁市区的地下室）装饰工程开工，叶涛坐镇指挥，戴氏家人与施工人员奋战在一线，个个忙得汗流浹背。2005年3月18日，投资85万元的如皋市戴氏家藏文物展览馆开馆，省、南通市及如皋市有关领导到场祝贺。

## 弥足珍贵，藏品穿越时空二千年

如皋戴氏家藏文物展览馆位于如皋市文峰大世界西侧，占地800平方米，展出自秦汉时期至新中国“文革”期间藏品960件，其中戴联奎藏品568件。秦俑童女像、汉代混釉瓶、三国彩陶罐、唐三彩花果瓶、宋代汝官窑尊、哥窑洗、钧窑水仙盆、定窑瓜棱笔洗，元代鱼草纹酒杯，明朝万历年梅瓶，乾隆皇帝圣旨，嘉庆皇帝的赐品弥足珍贵，戴联奎藏品穿越时空两千余年。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在参观展品后连连称叹：“难得，难得的国宝，不少藏品，我跑了大半个中国都没有见过！”

戴氏家藏展品中，乾隆皇帝的一道圣旨引人注目。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一，乾隆皇帝颁给戴联奎圣旨一道，全文162个字，内容大致为戴氏家人封官。

《戴联奎家谱》记载了皇帝赐品九龙宝椅的来历。嘉

庆十年（1805年），54岁的戴联奎改任兵部尚书。一日，嘉庆皇帝退朝后略感疲惫，便到一妃子宫中歇息。傍晚时分，有人拜见，嘉庆帝还未弄清来龙去脉就被谋反者软禁起来。就在这火烧眉毛之际，一宫女急中生智，化妆成小太监混出宫，直奔兵部尚书戴联奎府中。瞬间戴联奎率御林军赶来，将谋反者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谋反者抵挡不及，缴械投降，嘉庆帝得以获救。因戴联奎救驾立功，嘉庆帝事后即赐其九龙宝椅两张。九龙宝椅是嘉庆帝外出打猎时的坐具，质地紫檀木，其靠背、扶手、椅前沿木、踩脚横木处刻有九条龙，榫封相结处裹以白铜，座底为棕榈绳交织而成，柔软而富有弹性，为宫中艺术珍品。

在戴联奎藏品中，有一份《嘉庆四年正月丁卯抄检和珅相府物品清单》分外引人注目。嘉庆元年（1796年）嘉庆在开始亲政的15天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一代巨贪和珅处了死刑，但对和珅“富可敌国”的说法后人无据可查。戴联奎留下的这份抄检清单让今人窥豹一斑，和珅拥有财产触目惊心，真可谓“华夏第一贪”。清单因长久秘藏和受潮，已是斑斑迹迹，满目疮痍。

嘉庆四年正月丁卯抄检和珅相府物品清单

屋宇：正屋7进33间；徽式1所62间；花园台楼42座；侧室1所52间；钦赐花园1所64座；更楼12座；杂房130间；瓷器库1所；锡器库1所；珍羞房1所16间；铁黎紫檀房6间；玻璃器皿库1所；药材库房1所。

地亩：800顷。

店铺：当铺75家；古玩铺12家；玉器店4家；绸缎店2家；洋货店2家；皮货店1家。

金银铜：古铜鼎22座；汉铜鼎11座；王鼎18座；古剑10柄；金碗碟32桌4288件；银碗碟32桌4288件；金镶牙筷500双；金唾盂120个；金面盆53个；银面盆150个；金脚盆64个；银脚盆683个；金罗汉18尊，每尊高1尺8寸；金镶玉500副；镶金八宝炕屏40架；镶金炕床20架；老金缕丝床帐6顶；金元宝100只，每只100；银元宝940万两；赤金500万两；生沙金200万两；银元58000枚；银号库银400万两。

玉石珠宝古玩：略

衣物布匹皮张：略

这张抄检物品清单让世人看到了和珅的贪得无厌，也印证了当时京城“和珅一倒，嘉庆吃饱”的传说。

宋代汝官窑玛瑙釉尊是戴联奎收藏的一件宫廷贡

品。宋太祖建隆元年,宫廷为筹备赵匡胤生日庆典,特指令汝州(今河南汝州市)精制两只汝官窑玛瑙釉尊作贡品。这两只尊工艺精湛,制作精美,令赵匡胤龙颜大悦,爱不释手。可惜在北宋淳化五年被李顺起义军抢走一只,至今下落不明。剩下的那只由皇室世代相传至清朝。清朝嘉庆皇帝登基后,抄了和珅的家,赏赐了一批藏品给戴联奎,其中就有一只汝官窑玛瑙釉尊。“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件”。据考证,目前汝瓷存世真品仅有数十件,

且分布在世界各国有名气的大博物馆内,而戴氏家藏文物展览馆就有汝瓷3件。

结束采访时,戴时祥兴奋地告诉笔者:前不久,如皋市民政局批复成立“如皋市戴氏源流研究会”,已有美国、加拿大、缅甸、马来西亚等32个国家103名海外戴氏后裔来函报名参加此研究会;戴府的恢复工作已经启动,戴府恢复后,戴氏家藏文物展览馆将迁入府内,成为一大景观。  
(责任编辑 李 晨)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满 妹	39.00	7.00
胡耀邦传	张黎群等	50.00	7.00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丛书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50.40	7.00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亲历一九五七	徐铸成		
《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	徐庆全	48元	7.00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5.00	20.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文化大革命简史	金春明	28.00	6.00
走进怀仁堂(上下)	董保存	55.00	7.00
林彪的这一生	少 华 游 胡	28.00	6.00
国事忆述	陈锦华	48.00	7.00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冯建辉	22.0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6.00
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杜润生	35.00	7.00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	29.00	6.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 洪	28.00	6.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6.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 野	29.80	6.00
农业学大寨始末	宋连生	28.00	6.00
工业学大庆始末	宋连生	30.00	6.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6.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6.00
25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6.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7.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7.00
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7.00
党史札记(一集)	龚育之	28.00	6.00
党史札记(二集)	龚育之	35.00	7.00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	群言出版社	38.00	7.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35.00	7.00
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	龙德成	28.00	6.00

##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 本书是作者在2003年出版的《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的姊妹篇。《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是从政治意义上勾勒新时期文坛回春的脉络,而本书则从史料的角度,以“纪事本末”的体例,梳理新时期文坛拨乱反正过程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诸如“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苦恋风波”等的来龙去脉,解密了诸多早春文坛档案,是一部当代文坛的史料著作。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 本书系大型政治性资料图书,如实反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共1600余人的简历,为国内外读者了解建党八十多年来中共中央历任领导成员的有关情况提供翔实的资料。本书的编纂,注重严肃性和权威性,资料来源可靠,收录内容准确,编纂体例规范。

《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从土改到合作化,再到大包干。作者参与了中国农村重大变革的核心决策。本书记载了亲历、亲闻、亲见,而且语气简练,生活具体,见解深邃,如作者著名的演讲风格,对于想了解中国农村历史的人,本书堪称宝藏。

《红墙大事》 作者从事党史和军史研究近20年,接触了许多当年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本书记述了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的酝酿、争论和展开;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制定和实行。以史实为准绳,以文献为依据,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向读者真实地展示了那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 也谈山西新军领导权

杨剑龙

读了《炎黄春秋》2005年11期《山西新军领导权问题》颇受启发，也就此谈谈我的浅见。

山西新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是共产党人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成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事物，对它的研究必须做具体分析。

山西新军在它的发展过程中，1939年12月阎锡山制造的晋西事变（十二月事变）是一次历史性的突变（质变）。在这以前与以后大不相同。之所以不同，最根本、最本质的就是党对新军的领导权的不同。对此，薄一波同志曾作过科学论断。那是1942年1月，薄老在决死一纵队第一次党代表会上谈到党对决死队的领导权时说：“‘十二月事变’为决死队突变的节日，将反动军官一扫而清，以后纳入了正常建设时期，从和山西资产阶级共同领导过渡到党的单一领导。”

上述历史发展过程是新军（尤其是决死队）中新（党的领导）旧（阎锡山的领导基础，反共顽固军官）两种力量争夺领导权日趋激烈的斗争过程。这种斗争，存在于决死队发展的全过程，不同程度地普遍于新军各部。在晋西事变之前，正如一波同志说的：“当时最紧要的是新军的领导权究竟由谁掌握，斗争十分尖锐。”可见当时党对新军的领导权并未确立。

晋西事变全面加剧和激化了新旧力量、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破坏了“共同领导”的格局，客观上促进了新军向党的单一领导的发展进程。新军挫败了阎锡山的进攻，夺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实现了新军历史的突变，开始了新军历史的新阶段。从此以后的新军，已经不再是原本意义的新军了。从此才可以说山西新军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都是我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只是出于政策的需要保留了一段新军的名义。

说新军中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从而确立了党对山西新军的领导权”。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事实也不是这样。

须知，政治委员制度在新军中并没有普遍实行，以纵队及与之相当部队计，新军中多数部队根本没有实行（战动总会的游击第一路纵队、政卫纵队、三个保安旅），或基本没有实行（政卫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只在支队时期实行过半年左右）。实行了的，政治委员也不“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如工卫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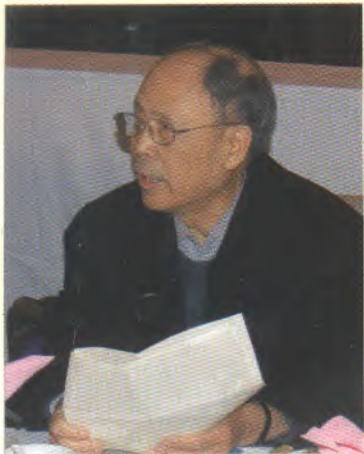
当然，政治委员制度确实很重要，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确实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但是第一，这只是在有成套旧军官把持着的部队军事、行政、财务、物资实权的部队中才很重要，可以以他拥有的最高权力制约旧军官；第二，这也得依靠部队中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政治工作系统和党的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支持。否则政治委员纵然拥有最高权力，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可见，就整个新军说，保证和确立党的领导权的，只有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包括政治委员制度在内的政治工作系统和部队党的组织和党员，才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

至于1979年中央组织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通知》的那个说法，即“‘牺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部队，都是我党发动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武装。”这是为了解决新军人员军龄计算这个具体问题说的。不能把解决军龄计算问题的具体说法当作是对新军性质问题的“政治结论”。

（作者系山西新军老战士、总政治部离休干部）



# 《炎黄春秋》2006年新春联谊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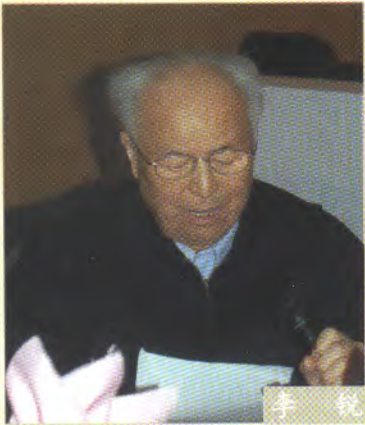
社长杜导正讲话



副社长徐孔主持会议



杜润生



李锐



李宝光



朱厚泽



白介夫



胡翼燕



袁鹰



彭迪



韩钢



李昌平



卢跃刚



陈模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6年第**3**期

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我与李雪峰的交往

改革就是突破垄断

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委、人委、政协

任白戈文革蒙难记

郡县制与美国政体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5.80元